

民主：在希望与危机之间

猪刚鬣

2025 年 6 月 19 日

目录

第一章 引言：两种幻觉的破灭	1
----------------	---

第一部分 旧地图的局限——我们曾如何理解民主化？	9
--------------------------	---

第二章 什么是民主？（一个工具箱，而非神龛）	11
------------------------	----

2.1 破除迷思：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	12
--------------------------------	----

2.2 “民主化”的经典浪潮：希望的年代	19
--------------------------------	----

2.3 旧地图的智慧与局限：我们曾如何解释民主的到来？	25
---------------------------------------	----

2.3.1 现代化理论：“富裕了就会民主吗？”	25
-------------------------	----

2.3.2 转型范式：“精英的谈判桌”	30
-------------------------------	----

第二部分 新大陆的挑战——民主的当代困	
---------------------	--

第三章 民主的“慢性病”：当民主不再是“猝死”，而是“缓慢退化”	41
3.1 “温水煮青蛙”：当民主遭遇“慢性病” . . .	42
3.2 倒退的剧本：民选领袖如何“合法地”侵蚀民主？	45
3.2.1 攻击“裁判员”：控制司法与选举机构	46
3.2.2 压制“对手”：噤声媒体与反对派 . . .	49
3.2.3 重划“游戏规则”：修改宪法与选举法	52
3.3 典型案例：当“民主”成为通往威权的合法路径	56
3.3.1 匈牙利：欧尔班的“非自由民主”之路	56
3.3.2 土耳其：埃尔多安的集权之路	61
第四章 愤怒的政治：民粹主义为何席卷全球？	67
4.1 澄清概念：民粹主义不是“主义”，而是“套路”	68
4.1.1 二元对立、道德化的世界观	69
4.1.2 人民意志至上与反建制姿态	70
4.1.3 模糊性与适应性	71
4.1.4 民粹主义不是什么？	72
4.2 民粹主义的温床：是什么喂养了这头“猛兽”？	73
4.2.1 经济根源：全球化下的“被遗忘者”与不平等的焦虑	73
4.2.2 文化根源：身份的焦虑与“我们”的危机	76

4.2.3	政治根源：当“庙堂之上”不再值得信任	79
4.3	案例分析：形形色色的“人民代言人” . . .	82
4.3.1	美国的特朗普现象：“美国优先”与反建制风暴	83
4.3.2	巴西的博索纳罗：“热带特朗普”的铁腕与争议	84
4.3.3	欧洲的右翼民粹：在多元与主权间徘徊	86
4.3.4	拉丁美洲的左翼民粹：反帝的旗帜与分配的承诺	87
4.3.5	亚洲的民粹身影：强人政治与民族主义的交织	88
4.4	民粹主义对民主的挑战与复杂影响	90
4.4.1	对自由民主规范的侵蚀	90
4.4.2	加剧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	91
4.4.3	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93
4.4.4	民粹主义：民主的警钟还是丧钟？ .	93
4.5	如何回应民粹主义的浪潮？在希望与审慎之间	95
4.5.1	正视根源：回应真实的社会经济诉求	95
4.5.2	重建信任：修复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	96
4.5.3	坚守价值：捍卫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则	97
4.5.4	赋能公民：提升媒介素养与批判精神	98

第五章 数字时代的双刃剑：从“解放的技术”到“监控的利器” 101

5.1	昔日的希望：“解放的技术”叙事的黄金时代	102
-----	----------------------	-----

5.1.1	“阿拉伯之春”的数字序曲：社交媒体的赋权神话	103
5.1.2	早期互联网精神：开放、共享与公民参与的乌托邦	105
5.2	今日的困境：当“连接”变成“隔绝”，“赋权”走向“操纵”	106
5.2.1	信息茧房与政治极化：算法正在“撕裂”我们吗？	106
5.2.2	虚假信息与认知作战：“假新闻”如何毒化舆论场？	109
5.2.3	威权的“数字升级”：“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111
5.3	技术巨头的阴影：平台权力与民主的张力	115
5.3.1	守门人的新角色：科技公司的巨大影响力	116
5.3.2	内容审核的困境：自由、责任与偏见的拉锯	117
5.3.3	“取消文化”与言论边界：数字广场的失序与重建	118
5.4	数字时代的抗争与反思：民主的韧性与未来	119
5.4.1	公民社会的反击：数字工具的再赋权	120
5.4.2	制度层面的探索：寻求监管与创新的平衡	121
5.4.3	个体的觉醒与责任：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	123

第六章 威权的“反击战”：当独裁者们开始“学习” 125

- 6.1 “纸老虎”的进化：威权主义学习与韧性 . 126
- 6.2 “中国模式”的迷思与现实：一个复杂样本的剖析 133
 - 6.2.1 “中国模式”的吸引力：看得见的成就与听得见的叙事 133
 - 6.2.2 光环之下的现实：成就背后的代价与隐忧 135
- 6.3 当独裁者们“抱团取暖”：威权国际的幽灵 . 139

第三部分 寻找新的航线——民主的未来在何方？ 145**第七章 民主的“免疫系统”：公民社会与制度的韧性 147**

- 7.1 公民的抵抗：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 148
 - 7.1.1 白俄罗斯的呐喊：冰封下的不屈抗争 148
 - 7.1.2 波兰的司法保卫战：法袍下的坚守与呐喊 150
 - 7.1.3 台湾的公民科技社群：用代码守护民主的“数字长城” 152
- 7.2 制度的防线：当“刹车”机制开始启动 . . . 154
 - 7.2.1 独立的司法：法槌下的最后守护者 . 155
 - 7.2.2 自由的媒体：“第四权力”的警觉目光 156
 - 7.2.3 强大的地方政府：民主的“毛细血管”与“防火墙” 158

7.3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批评与 容纳反抗	160
第八章 重塑我们的民主：21 世纪的制度创新	163
8.1 超越选举：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形式？	165
8.2 协商民主：坐下来，好好谈谈？	166
8.3 数字民主：技术是敌是友？	170
8.4 地方民主的复兴：从社区开始重塑信任 . . .	174
8.5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自我 更新	178
结论：民主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	181
附录 A 推荐阅读	191
附录 B 名词解释	195

第一章 引言：两种幻觉的破灭

1989年11月9日的夜晚，世界似乎正朝着一个无比光明的终点高歌猛进。当那堵沉重、冰冷、分隔了东西柏林长达28年之久的柏林墙，在无数欢呼的人群手中挥舞的锤子和镐头的敲击下，伴随着混凝土碎块的剥落而轰然倒塌时，整个世界都通过电视屏幕见证了这个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那不仅仅是一堵物理意义上的墙消失，它更像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象征着长久以来压迫的终结、意识形态分裂的弥合，以及一种政治理想——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最终胜利。在那一刻，美国日裔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引发全球热议的著作中所提出的著名论断——“历史的终结”——仿佛不再仅仅是象牙塔内学者的深奥预言，而是变成了掷地有声、回荡在时代上空的庄严宣告。人们普遍沉浸在一种信念之中：自由民主制度不仅是战胜了其主要对手的优越体制，更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最终答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几乎不可阻挡的乐观主义情绪。冷战的阴霾似乎在一夜之间散尽，取而代之的是对一个更加和平、繁荣与民主的未来的无限憧憬。接下来的几年里，这股乐观的浪潮席卷全球：从东欧的布拉格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以其和平与诗意载入史册，波兰团结工会引领国家走向新生；从亚洲的首尔到台北，韩国民众用持续的抗争赢得了民主改革，台湾则逐步解除了戒严，开启了多元政治的序幕；甚至在遥远的非洲大陆和拉丁美洲，一些长期被威权统治的国家也纷纷开启了民主化的大门，举行了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在那个时代，仿佛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具有普世吸引力的时代潮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唯一正途和最终归宿。我们许多人都曾深信不疑，只要一个国家能够顺利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积极拥抱全球化的浪潮，那么民主的甜美果实便会如期而至，自然结出。

现在，让我们将历史的时钟猛地拨快大约三十年，来到2021年1月6日。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电视屏幕上传来的现场直播画面，这一次，事件发生的地点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而画面的主角，则是那个长期以来被誉为“世界民主灯塔”、“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国会山。然而，屏幕上展现的景象却与三十年前柏林的欢欣鼓舞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足以令全世界的观众感到错愕与不安：成群的抗议者，头戴各式奇异的帽子，手持旗帜和棍棒，情绪激动地冲破了国会警察设置的防线，他们砸碎了国会大厦厚重的玻璃窗，如潮水般涌入了这座象征美国民主制度的心脏建筑。议员们，这些本应在庄严的殿堂内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的民意代表，此刻却不得不仓皇撤离，四处躲避。一场本应庄严

有序、象征着民主制度核心——权力和平交接——的法律程序，就这样被突如其来的暴力和混乱粗暴打断。曾经象征着民意至上、法治尊严的国会山，此刻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破坏与狼藉之中，其内部的雕像和陈设遭到亵渎，办公室被占据，走廊里弥漫着催泪瓦斯的气味。

从柏林墙的倒塌到国会山的陷落，从 1989 年响彻云霄的自由欢呼到 2021 年震惊世界的暴力场景，这短短三十余年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曾经被认为坚不可摧、光芒万丈的民主“光环”，为何会褪色得如此之快，甚至在某些地方显得如此脆弱不堪？

如果说 2021 年初发生在美国国会山的事件只是一个孤立的、极端的案例，那么当我们放眼全球，将视线投向世界其他角落时，所看到的景象同样令人深感忧虑，甚至可以说触目惊心。这绝非偶然的孤例，而似乎预示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全球性趋势。相似的剧本，虽然细节各异，但其侵蚀民主根基的内核却惊人地一致，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轮番上演：

在欧洲，一些曾经被视为民主转型“模范生”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民选上台的领导人及其政党，正以“人民的授权”和“国家利益”为名，系统性地、一步步地侵蚀着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这两大民主制度的基石。他们通过修改宪法、控制法官任命、将公共媒体改造为政府喉舌、打压非政府组织等手段，逐渐将权力集中到行政部门手中，削弱对权力的制衡。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一度被认为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强人政治”似乎正在卷土重来。一些民选领导人凭借其个人魅力和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不断挑战宪法

约束，压制反对声音，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制度的个人化威权。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巴西的博索纳罗（在其任内）等案例，都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民主前景的深切担忧。

而在我们日益依赖的数字世界里，曾经被誉为“解放的技术”、被寄予厚望能够推动信息透明和公民参与的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如今却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散播谣言和虚假信息、制造社会分裂、进行政治操纵乃至实施大规模监控的温床。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加剧了政治极化，使得不同观点的人们生活在相互隔绝的“平行宇宙”中，难以达成共识。

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制度稳固、历史悠久的成熟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也普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部挑战：政治极化日益严重，社会共识不断流失，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持续高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排外情绪和种族歧视沉渣泛起；民众对传统政党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对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产生深刻怀疑。英国脱欧公投的意外结果及其后续的政治纷争，法国“黄马甲”运动所暴露的深层社会矛盾，以及美国社会内部围绕种族、枪支、堕胎等议题的持续撕裂，都折射出这些老牌民主国家内部正在经历的深刻危机。

于是，在经历了短短三十余年的历史轮回之后，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和情感，似乎又从一个极端——即 1989 年前的无限乐观与普遍自信——戏剧性地摆荡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当前的普遍悲观、深度焦虑甚至绝望。曾经对民主制度能够战胜一切挑战、引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如今正被一种认为民主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

论调所取代。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充斥着诸如“民主正在死亡”、“威权主义的幽灵在全球徘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崩溃”之类的悲观预言。民主，这个在 20 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并最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强劲对手的政治制度，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仿佛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件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即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过时古董。

我们真的应该如此悲观吗？民主的未来是否真的黯淡无光，注定要被更“高效”、更“稳定”的威权模式所取代？

如果你也对这种从希望的顶峰跌落到失望的谷底的巨大落差感到困惑、迷茫与不安，如果你也想知道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民主理想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本书正是为你而写。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尝试帮助我们打破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占据我们头脑的两种极端却又都失之偏颇的“幻觉”：第一种幻觉，是上世纪末弥漫全球的“民主天堂降临”的幻觉，即认为自由民主是一个完美无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人类社会问题的终极政治方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终点；第二种幻觉，则是当前日益流行的“民主体制崩溃”的幻觉，即认为民主在全球范围内所遭遇的危机是系统性的、不可逆转的，民主制度注定要在与更具“效率”和“决断力”的威权模式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最终走向衰败。

作为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领域研究的学者，我们想通过本书告诉你，上述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看法，其实都犯了过度简单化和线性思维的错误。民主，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和复杂的现实运作中，既非注定高歌猛进、一路坦途，也非必然走向衰败、无可救药。它从来不是一座可以让我们

安然入住、永享太平的宁静神龛，供人顶礼膜拜；而更像是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多样，但需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具体国情不断维护、修缮、甚至进行结构性改造的“工具箱”。它的生命力，恰恰蕴藏在其内在的、永恒的紧张关系、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以及对外部挑战保持开放并作出回应的动态能力之中。

因此，这本书不会是一本简单唱衰民主、贩卖焦虑的“崩溃论”著作，它无意加入那场合唱“民主挽歌”的喧嚣合唱。同样，它更不是一本为其过往成就歌功颂德、为其当前困境强作辩护的宣传册。在旧有的世界地图和导航系统已然失灵，无法准确指引我们理解当前复杂政治现实的今天，本书的承诺是，为你绘制一张尽可能清晰、客观、与时俱进的“新地图”。我们将暂时搁置那些关于历史走向的宏大预言和价值评判，转而深入到当代民主在全球不同地区运作的真实机理之中。我们将借助过去二十年比较政治学领域最前沿、最扎实的研究成果，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你系统解答以下几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核心问题：

-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或“民主侵蚀”（Democratic Erosion），与历史上那些由军人发动的、赤裸裸的军事政变有何本质不同？它是如何常常打着“合法”的旗号，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具体的“剧本”和“套路”又是什么？
- 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Populism）浪潮，这股充满“愤怒”的政治力量，究竟从何而来？它仅仅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政治策略，还是深刻反映了特定社会群体的真

实诉求？它到底是民主制度的敌人，还是民主制度自身病症的一种痛苦表现？

- 在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互联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究竟是促进信息透明、赋权公民的民主盟友，还是加剧社会分裂、强化国家监控的民主对手？那些精明的威权国家，又是如何巧妙地利用新技术实现了自身统治能力的“数字升级”？
- 面对来自内部的侵蚀和外部的挑战，民主制度自身是否拥有某种“免疫系统”？例如，独立的法院、自由的媒体、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及负责任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还能否有效发挥其“刹车”和“纠错”的功能？
- 展望未来，在全球民主实践的“实验室”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可能帮助我们克服当前困境、重塑民主活力的制度创新理念和实践探索？例如，协商民主、数字民主、地方民主的复兴等。

读完本书，你或许不会得到一个关于民主未来走向的简单化、确定性的答案——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我们希望，你将获得一个更清晰、更全面、更具分析性的认知框架，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也最具争议性的政治议题。你将会看到，民主的命运并非由某个抽象的历史规律或少数政治精英所单方面决定，而是由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公民的认知水平、价值选择与实际行动共同塑造。它的未来，并非遥不可及的彼岸，而是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告别那些曾经或正在困扰我们的幻觉，拿起这张凝聚了当代比较政治学智慧的“新地图”，重新审视和勘探民主脚下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更清醒地看清前方那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十字路口。这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探索，更是一场关乎我们共同未来的思想之旅。

第一部分

旧地图的局限——我们曾如何理解民主化？

第二章 什么是民主？（一个工具箱，而非神龛）

“民主”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无论是国际新闻的报道、社交媒体上的热议，还是朋友间的闲谈，它都可能不经意间成为话题的中心。但我们是否真正深入地理解了它的含义？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许多人的初步印象中，民主似乎被简化为几个标签：或许是“一人一票选领导”的简单程序，又或许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崇高理想，象征着自由、平等以及所有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仿佛只要一个国家贴上了“民主”的标签，所有的社会顽疾都能奇迹般地迎刃而解。

然而，这两种看法都可能使我们偏离对民主真实面貌的认知。如果我们把民主想象成一个供奉在神龛之上、无所不能的偶像，对其顶礼膜拜，那么我们很可能在其遭遇挫折或展现不完美时陷入巨大的失望。同样，如果仅仅将其简化为一个周期性的投票仪式，那么我们又会错失其背后复杂而丰富的制度内涵与价值支撑。因此，本章的核心

目标，便是尝试打破这些围绕“民主”的常见迷思。我们将努力把民主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请下来，使其回归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治理工具的本质；同时，我们也要把它从“不过是投票而已”的浅薄误解中解放出来，展现其多维度、多层次的运作机理。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会发现，民主更像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各式各样为了实现良好治理、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正而设计的工具。每一样工具——无论是选举制度、议会辩论、司法独立，还是新闻自由、公民参与——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预设的用途。理解这些工具的特性，学会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并警惕它们可能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远比对“民主”这一标签的盲目崇拜或简单化否定更为重要和富有建设性。

2.1 破除迷思：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

“我们国家是民主国家，因为我们定期举行选举，人民可以投票！”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且理所当然？的确，选举，尤其是允许普通公民通过投票来选择国家领导人或代议士的选举，是现代民主制度中一个最为显眼、也最为基础的特征。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仅仅因为一个国家举行了某种形式的选举，它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吗？

让我们构想几个场景：在一个国家，选举时提供的候选人名单上只有一个政党或一位候选人供你“选择”，或者选票的设计本身就极具诱导性；在另一个国家，选民在前往投票站的路上或在投票间内，都可能感受到来自官方或非

官方力量的监视与压力，担心自己的选择会带来不利后果；再或者，在一个国家，即便你满怀期待地将选票投给了某位深孚众望的反对派候选人，他也可能在选举后因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剥夺资格，甚至锒铛入狱，选举结果也可能被当权者轻易推翻或漠视。在这些情况下，即便形式上每个人都投了票，这样的选举能够带来真正的、有意义的民主吗？恐怕大多数具备常识的人都会对此表示怀疑，甚至明确摇头。历史上，苏联等国家也曾定期举行“选举”，但候选人往往是唯一的，投票率也“高达”99%以上，这显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当代一些被学者称为“选举式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的国家，也会精心组织选举，但其目的更多是为了装点门面、制造合法性幻象，而非真正实现权力的和平竞争与转移。

这些例子清晰地说明了，“一人一票”的投票行为虽然是民主参与的重要环节，但它本身远非民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民主的核心判准。那么，民主的“底线”或者说最起码的要求究竟是什么？政治学家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入探讨和激烈争论，至今也未达成完全统一的定义。然而，一个相对简洁且被比较政治学界广泛接受的“最低限度”定义是：**具有实质意义的竞争性选举（Meaningful and Competitive Elections）**。

这里的“竞争性”是关键。它意味着：

- **真正的选择**：必须有至少两个不同的政党或候选人参与竞争，选民拥有真实的选择权。这意味着不能只有一个选项，也不能所有选项本质上都代表同一利益集团。选民应该能够从代表不同政策纲领、不同意识形

态或不同社会群体的候选人中进行自由选择。如果所有候选人都由执政党筛选和指定，那么选择就失去了意义。

- **公平的赛场：**竞争应该是相对公平的，各方都有机会向选民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不是一方垄断所有资源和话语权。这涉及到诸多方面，例如：各政党和候选人是否拥有平等的权利去争取选民支持？竞选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是否受到合理规范，以防止金钱过度扭曲选举？媒体（尤其是国家控制的媒体）是否能够对所有候选人进行相对平衡和客观的报道，而不是一边倒地为主执政党歌功颂德、同时打压反对声音？执政党是否会滥用国家行政资源、公共财政或安全力量为自身助选，从而对其他竞争者构成不正当优势？一个真正公平的赛场，是确保选举能够反映真实民意的基础。
- **不确定的结果：**选举的结果在投票开始之前是不确定的，执政者有实实在在输掉选举并将权力和平移交给获胜者的可能性。如果选举结果早已内定，或者执政党通过各种手段确保自己无论如何都能“获胜”，那么这样的选举就失去了其作为民主机制的核心意义。这意味着权力必须能够通过定期的、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和平的、可预期的更迭。用政治学家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话来说，民主就是“一种各方力量同意通过特定的规则来处理冲突，并且其结果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下，输家会接受选举结果，并等待下一次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的选举能够基本满足以上这些“竞争性”的条件，我们通常可以认为它至少迈过了民主的最低门槛，或者说具备了“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的基本形态。但这仅仅是“底线”标准。一个健全、优质、能够良好运作并持续发展的民主制度，还需要工具箱里的其他几样核心工具来协同配合，它们共同构成了民主大厦的坚固支柱：

- **自由 (Freedom)：**

- **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这是民主的基石。公民必须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批评政府的政策、讨论公共事务，而不必担心因此受到惩罚或报复。如果选民在投票前不能自由地获取关于候选人和政党的充分信息，不能公开讨论他们的政纲优劣，不能对执政者的表现进行评判，那么选举的选择就可能建立在被误导或不完整的信息之上。缺乏言论自由，会导致自我审查的盛行，使得社会无法形成健康的公共舆论，民主决策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 **新闻自由 (Freedom of the Press)：**一个独立的、多元的、不受政府不当干预的媒体环境，对于民主至关重要。新闻媒体扮演着“第四权力”的角色，负责向公众提供准确、客观的信息，监督政府的行为，揭露腐败和滥权现象。如果媒体被政府完全控制，或者受到严格审查，那么公民

就难以获得做出知情政治选择所需的信息，政府也更容易逃避问责。调查性报道、深度分析以及不同观点的呈现，都是新闻自由保障民主运作的重要体现。

- **集会与结社自由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公民应该有权和平地集会、游行、示威，以表达他们的诉求和不满。同时，他们也应该有权组织和参与各种社会团体，如政党、工会、非政府组织 (NGOs)、社区团体等。这些自由使得公民能够集体行动，对政府施加影响，维护自身权益，并参与到更广泛的公共生活中。限制这些自由，就等于剥夺了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和监督权力的重要途径。

- **法治 (Rule of Law):**

- **法律的至高无上性:** 法治的核心在于，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任何个人或机构，包括政府自身，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法律，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意味着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其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符合正当程序。
- **独立的司法系统 (Independent Judiciary):** 为了确保法律得到公正的实施和解释，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仅依据法律和事实，不受来自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或其他任何外部力量的不当干预和压力。司

法独立是防止权力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通常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如法官的任命程序、任期保障、薪酬待遇以及免受政治报复的机制。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要求法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因其财富、地位、种族、性别或政治立场而有所区别。无论是政府高官还是普通平民，在法律面前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选择性执法或因人设法，都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破坏。

- **权利保障 (Rights Protection)：**

- **保护少数群体：**民主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多数决定，但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多数人的意愿不能成为侵犯少数群体（无论是基于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性取向，还是政治观点上的少数）合法权益的理由。因此，宪法和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并有效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例如，文化遗产权、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母语的权利、以及免受歧视和迫害的权利。
- **保障个体基本人权：**除了少数群体权利，民主制度还必须致力于保障每一个体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这些权利被认为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例如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财产权、隐私权、公平审判权等。这些权利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的根本限制，确保个体尊严不受侵犯。

- **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不受约束的多数权力也可能导致对少数人和个体权利的压迫。因此，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通常会通过宪法、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基本权利的特殊保护机制，来防止“多数人的暴政”的出现，确保民主决策不逾越尊重个体自由和尊严的底线。

综上所述，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一人一票”的选举行为，而是一个更为复杂和精密的系统。这个系统以具有实质意义的竞争性选举为核心，但同时必须辅之以对公民自由的充分保障、对法治原则的严格恪守以及对个体和少数群体权利的有效维护。这四个要素——竞争性选举、公民自由、法治、权利保障——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一个理想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政体的核心特征。它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贴上的简单标签，而是一套需要精心设计、持续维护、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就像一个结构精密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各种为了实现良好治理的工具，少了任何一件关键工具，或者工具本身质量不过关、使用不当，整个系统都可能运转不灵，甚至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2.2 “民主化”的经典浪潮：希望的年代

在对民主的核心构成要素有了初步理解之后，让我们将视线投向历史，看看这种被许多人视为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一步步扩展其影响力的。如果说 20 世纪上半叶主要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法西斯主义的肆虐以及冷战的阴云所笼罩，那么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则无疑是一个相对而言充满希望、见证了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

已故的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在他 1991 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著作《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中，系统地分析了这一历史现象。他将这一时期（大致从 1974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生的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转型，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了理解这个概念，亨廷顿将历史上的民主化进程划分为几波：第一波漫长的民主化浪潮大致从 19 世纪 20 年代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其间也伴随着一些民主的“回潮”；第二波短暂的民主化浪潮始于二战后盟军对战败国的民主改造，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随后也经历了一波回潮。我们这里的焦点，是更为晚近且影响更为广泛的第三波。）

这股汹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通常被认为始于 1974 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 (Carnation Revolution)，这场几乎兵不血刃的军事政变结束了萨拉查-卡丹奴长达数十年

的独裁统治。随后，民主的火种迅速蔓延：首先是南欧的希腊（1974 年军政府垮台）和西班牙（1975 年佛朗哥去世后开启转型）；接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席卷了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等国纷纷摆脱了军事独裁，重建了民主制度；然后，这股浪潮又涌向亚洲，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1986 年）、韩国的“六月民主运动”（1987 年）、台湾地区解除戒严并逐步开放党禁报禁（1987 年起），都是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而将第三波民主化推向最高潮的，无疑是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在东欧和中欧发生的“苏东剧变”。在短短几年内，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前苏联卫星国纷纷摆脱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开启了向市场经济和多党民主的艰难转型。甚至连苏联自身也在 1991 年底宣告解体。这股浪潮的影响力还进一步扩展到非洲大陆，许多长期实行一党制或军事统治的国家，在内外压力下，也开始尝试多党选举和政治开放。

那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时代。一个个曾经被威权或极权统治的国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开启了走向民主的转型之路。让我们回顾几个标志性的故事，感受一下那个年代弥漫的乐观情绪：

- **西班牙的平稳过渡：**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曾长期被独裁统治笼罩。弗朗哥在西班牙实行了近 40 年的铁腕统治。但在他 1975 年去世后，西班牙并没有陷入混乱或内战，而是在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推动和各派政治精英的协商下，平稳地过渡到了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曾经的政治犯被释放，新的宪法保障了公民

的自由和权利，西班牙的经验一度被视为威权转型的典范。

- **国王的关键角色与精英的妥协智慧：**佛朗哥去世后，他指定的继承人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出人意料地没有选择延续独裁，而是积极推动民主改革。他任命了务实的改革派领袖阿道弗·苏亚雷斯（Adolfo Suárez）为首相，开启了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反对派力量的对话。这一时期，西班牙各派政治精英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妥协精神，通过著名的《蒙克洛亚协定》（Pacts of Moncloa），就经济改革、社会政策和政治民主化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为国家的平稳转型奠定了基础。1978 年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议会君主制，保障了基本人权和地区自治。尽管在 1981 年曾遭遇一次未遂的军事政变（23-F 事件），但在国王的坚定立场和民众对民主的支持下，政变迅速失败，反而进一步巩固了新生民主的根基。西班牙的案例，常被视为“协商式转型”（pacted transition）的成功典范。
- **韩国的街头呐喊：**在亚洲，韩国的民主化历程则充满了戏剧性的抗争。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韩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军事强人统治。然而，经济的起飞也孕育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追求自由的年轻一代。1987 年，一场由学生发起的“六月民主运动”席卷全国，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面对巨大的民意压力，执政当局最终做出了让步。韩国

的民主之路，是用汗水甚至鲜血铺就的。

- **经济发展与公民意识的觉醒：**韩国在朴正熙时代虽然实现了“汉江奇迹”般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付出了政治压迫和人权受损的代价。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众对民主权利的渴望日益强烈。1980 年的光州民主化运动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却在韩国民众心中埋下了反抗的火种。到了 1987 年，大学生朴钟哲被酷刑致死、李韩烈在示威中被催泪弹击中身亡等事件，彻底点燃了民众的怒火。
- **“六月民主运动”的巨大声势：**从 6 月 10 日开始，以学生为先导，包括白领、工人、宗教人士在内的各界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持续的示威抗议活动，要求修改由全斗焕军政府制定的间接选举总统的宪法，实现真正的总统直选，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面对数百万民众“打倒独裁，争取民主”的呐喊，以及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压力，执政的民主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卢泰愚最终在 6 月 29 日发表了“六二九宣言”，接受了民众的核心诉求，同意修宪实行总统直选，并释放政治犯、保障新闻自由等。韩国的民主转型，充分展现了公民社会力量在关键时刻的巨大作用。
- **东欧的“天鹅绒”与“推墙”：**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 1989 年东欧的剧变。在波兰，团结工会经过长期

的抗争，最终迫使政府同意举行部分自由的选举；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场被称为“天鹅绒革命”的和平示威，在短短几周内就结束了共产党数十年的统治；而当柏林墙在万众欢呼中轰然倒塌，不仅标志着德国的统一，更被视为冷战结束和民主“历史性胜利”的象征。

- **波兰团结工会的坚韧抗争：**波兰的民主转型之路漫长而曲折。以瓦文萨（Lech Wałęsa）为代表的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就成为反抗共产党统治的重要力量。尽管曾一度被宣布为非法并遭到镇压，但团结工会凭借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天主教会的支持，持续进行抗争。最终在1989年，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持续的社会压力，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被迫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达成了举行部分自由选举的协议。在随后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为波兰的和平转型铺平了道路。
- **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与波兰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转型更为迅速和和平。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学生为纪念反纳粹运动五十周年的和平示威遭到警察镇压，反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更大规模抗议。以剧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迅速组建了“公民论坛”（Civic Forum），领导了这场被称为“天鹅绒革命”（因其过程如天鹅绒般平滑柔顺，

未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运动。在短短几周内，面对持续的群众示威和总罢工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迫放弃一党专政，哈维尔当选为过渡时期的总统。

- **柏林墙的倒塌及其象征意义：** 1989 年 11 月 9 日，分隔东西柏林长达 28 年之久的柏林墙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轰然倒塌，无疑是冷战结束最具标志性的象征。它不仅直接导致了第二年两德的统一，更被广泛视为共产主义阵营瓦解和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不战而胜”的里程碑。电视画面中，人们攀爬在柏林墙上，用锤子和镐头敲击墙体，尽情欢庆自由的到来，这一幕幕场景深深烙印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极大地鼓舞了全球范围内对民主前景的乐观预期。

这些发生在不同大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主转型故事，以及更多未在此详述的案例——例如拉美国家在 80 年代纷纷摆脱军政府统治，恢复文官政府；非洲一些国家在 90 年代初也开始尝试多党制和政治开放——共同汇聚成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壮丽图景。在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年代，许多学者、政治家和普通民众都真诚地相信，民主不仅是一种在道德上更优越、在实践中更有效的政治制度，更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 1989 年发表并于 1992 年扩展成书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更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论断：人类社会在意识形态

2.3 旧地图的智慧与局限：我们曾如何解释民主的到来？25

的演进上，已经抵达了其最终点——即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它可能构成“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种弥漫全球的乐观情绪，为我们理解后来当民主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挫折和挑战时，许多人所感受到的巨大失落感和困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

2.3 旧地图的智慧与局限：我们曾如何解释民主的到来？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社会科学家们自然会提出一系列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民主转型？为什么这些转型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否存在某些普遍的社会经济条件或特定的政治互动模式，能够解释民主的发生和巩固？学者们试图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来绘制出一幅能够解释民主化现象的“认知地图”。在众多的理论尝试中，有两种理论框架曾经非常流行，它们为我们理解当时的民主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也深刻影响了政策制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这些“旧地图”在解释新的现象时，也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智慧与固有的局限性。

2.3.1 现代化理论：“富裕了就会民主吗？”

现代化理论 (Modernization Theory) 是最早也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民主起源的理论之一。其核心观点听起来非常

直观，甚至符合很多人的日常经验：一个国家越是富裕，经济越是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越高，那么它就越有可能建立并维持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简而言之，经济发展是民主的助推器。

-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经济发展通常会带来几个重要的社会变化：

- **教育普及：**经济发展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这会促进教育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公民更容易获取信息，理解复杂的政治议题，形成独立的判断力，对自身权利的意识也会随之增强，从而更倾向于参与政治，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 **中产阶级壮大：**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成熟，会催生出一个规模庞大、经济上相对独立、思想上相对温和的中间阶层（Middle Class）。这个阶层通常被认为是民主的天然盟友。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和闲暇，关心公共事务，倾向于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争取政治权利，要求政治稳定、法治保障和政策的透明度。正如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在其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所提出的著名论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No bourgeoisie, no democracy.）
- **公民社会发育：**经济的多元化和社会的复杂化，会为各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组织（即公民社会组

2.3 旧地图的智慧与局限：我们曾如何解释民主的到来？27

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的成长提供空间。这些组织包括商会、工会、专业协会、非政府组织（NGOs）、社区团体、兴趣小组等。它们不仅为公民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也对政府权力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制衡，培养了公民的合作精神和组织能力，是民主运作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 **价值观变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会更加关注和追求那些与自我表达、个人自由、生活质量和政治参与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这是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重要观点。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使得民众对威权统治的容忍度降低，对民主治理的期望升高。
- **信息传播与交往的便利化：**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这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更加便利。这有助于打破地域隔阂和信息垄断，促进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也使得社会动员和集体行动更容易组织起来，从而对封闭的威权体制构成挑战。

简单来说，现代化理论认为，当一个社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富裕，教育水平更高，信息流通更自由时，传统的、依赖于少数精英垄断权力和信息的威权统治方式就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催生出新的社会力量（如中产阶级、知识分

子、有组织的工人），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被动地接受统治者的命令，而是希望对与自身利益和命运息息相关的公共决策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

- **现实的印证与困惑：**环顾全球，许多老牌民主国家，如西欧、北美、澳大利亚等，确实都是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些国家，如韩国、台湾，也经历了经济起飞后向民主的转型。这似乎印证了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

— **经验证据的支持：**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 1959 年发表的经典文章中，就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收入、工业化程度、教育水平等指标）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后的许多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这一发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一些成功实现并巩固了民主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韩国、台湾等，都在其民主转型前后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然而，这个理论也面临着一些难以解释的“例外”。最常被提及的就是：**为什么一些非常富裕的海湾石油输出国，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却并非民主国家？**这些国家人均 GDP 很高，但政治体制依然是君主制。学者们指出，这些国家依靠石油等自然资源获得巨额财富（所谓的“租赋国家”），政府可以用福利收买民众，而无需依赖税收，从而削弱了民众问

2.3 旧地图的智慧与局限：我们曾如何解释民主的到来？29

责政府的动力和能力。此外，像新加坡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国家，其政治体制也与典型的西方民主有所不同。

- **“租赋国家”的挑战：**正如前文所述，那些依靠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而获得巨额财富的“租赋国家”（Rentier States），如许多中东海湾君主国，往往是现代化理论的明显例外。这些国家的政府无需通过向本国公民征税来维持运作，而是可以直接从资源出口中获取收入。它们可以用丰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政治顺从（所谓的“没有代表权，但有福利”），同时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压制异见。由于国家控制了主要的经济命脉，独立的资产阶级和公民社会也难以发育壮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即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可能阻碍民主化和良好治理。
- **“亚洲价值观”与文化特殊性：**一些学者和政治家，特别是来自东亚地区的，曾提出“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的说法，认为亚洲社会更强调集体主义、社会和谐、尊重权威、重视教育和经济发展，而西方民主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权利制衡和政治竞争可能不完全适用于亚洲的文化土壤。新加坡的李光耀是这一观点的著名倡导者。尽管“亚洲价值观”的内涵和解释力备受争议，但它确实提醒我们，文化因素在政治发展中可能扮演着复杂角色，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向单

一模式的西方民主。

- **威权体制的韧性与适应性：**即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一些威权政体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它们通过制度创新、精英吸纳、选择性压制以及提供经济绩效等方式，成功地延缓甚至阻止了民主化的压力。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常被视为一个复杂的案例，其经济高速增长并未伴随西方预期的政治民主化，反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威权治理”模式。

因此，尽管现代化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但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决定关系。富裕或许为民主的产生和巩固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它既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即富裕了不一定马上就民主，如石油国），也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即一些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也可能实现并维持民主，如印度）。其他因素，如政治精英的选择、政治制度的设计、公民文化的培育、国际环境的影响等，都在民主化的复杂方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2.3.2 转型范式：“精英的谈判桌”

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更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层面来解释民主产生的可能性，那么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兴起的“转型范式”（Transitology，有时也译为“过渡学”

2.3 旧地图的智慧与局限：我们曾如何解释民主的到来？31

或“转型学”)则将研究的焦点转向了民主转型的具体政治过程，特别是政治精英（包括威权统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和反对派精英）在转型关头的互动、策略选择和制度构建。这一研究路径，极大地受到了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劳伦斯·怀特海德（Laurence Whitehead）等人主编的多卷本著作《从威权统治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前景》（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的深刻影响。

- **核心观点：**民主的诞生，往往不是某个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而更像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赌博”，其关键在于威权体制内部以及威权与反对派精英之间的互动、谈判和妥协。

- **强调能动性与不确定性：**转型范式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它不像结构主义理论那样过分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更加突出政治行动者（尤其是精英）的能动性（agency）和策略选择（strategic choice）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关键影响。它认为，民主转型并非某种历史规律的必然产物，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开放性的过程，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关键行动者如何在复杂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博弈和抉择。因此，转型过程充满了偶然性、风险和不可预测性。

- **转型的“剧本”通常如何展开？**

— **威权体制出现裂痕：**往往始于威权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面对经济危机、社会抗议或统治合法性下降等压力，一部分相对开明的“温和派”（soft-liners）可能倾向于通过有限的政治开放来缓解矛盾，而“强硬派”（hard-liners）则主张继续压制。

* **触发因素：**威权体制的内部裂痕可能由多种因素触发，例如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政绩合法性受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或继承危机、来自社会持续的抗议和压力、国际环境的变化（如外部制裁或盟友的抛弃）、或者是统治者自身对政权前景的误判。

* **“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博弈：**当危机出现时，威权统治精英内部通常会分化为“温和派”（或称“改革派”）和“强硬派”（或称“保守派”）。温和派可能认为，通过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liberalization），例如放松言论管制、释放部分政治犯、允许有限的政治参与，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争取民心，甚至延长政权的寿命。而强硬派则担心任何形式的开放都可能失控，最终导致政权垮台，因此主张采取更严厉的压制措施。这两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博弈，往往是启动转型的第一步。

— **反对力量的策略：**与此同时，体制外的反对派力量也在集结。他们内部也可能有“激进派”和“温

和派”之分。

* **反对派的构成与策略：**反对派力量的构成可能非常复杂，包括有组织的政党、工会、学生运动、人权团体、宗教组织等。他们内部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策略取向。一些“激进派”可能主张通过革命或大规模街头抗争来彻底推翻威权体制；而另一些“温和派”则可能更倾向于通过与威权体制内的改革派进行对话和谈判，争取渐进的民主改革。反对派能否形成统一的联盟、采取有效的斗争策略，对其在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 **“精英的谈判桌”：**当威权体制的控制力有所松动，而反对派又不足以彻底推翻旧秩序时，双方的温和派就有可能坐到谈判桌前。他们围绕着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制定新宪法、举行选举等核心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这些谈判充满了变数，结果往往取决于各方的力量对比、策略选择和政治智慧。西班牙的“蒙克洛亚协定”就是这种精英妥协的典型示例。

* **“协商式转型” (Pacted Transition)：**在许多成功的民主转型案例中，精英之间的谈判和妥协扮演了核心角色。当威权统治集团的温和派意识到单纯依靠压制已难以为继，而反对派的温和派也认识到与体制彻底决裂的风险过高时，双方就有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契约”或“转型协议” (pacts)。这些

协议可能涉及诸多敏感问题，例如：为即将离任的威权统治者提供某种形式的特赦或安全保障（以换取他们放弃权力）；就新宪法的制定原则、选举制度的设计、军队在未来政治中的角色等达成一致；以及就如何处理过去的旧账（如人权侵犯问题）等。这种通过精英协商来主导的转型过程，虽然可能因其“密室政治”的色彩而受到一些批评，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往往是避免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实现平稳过渡的有效途径。

- **“摸着石头过河”**：转型过程往往没有现成的蓝图，精英们需要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关键决策，这些决策将深刻影响新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形态和质量。

* **制度选择的关键性**：在转型过程中，关于新民主制度的具体设计，例如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采用何种选举制度（多数制、比例代表制还是混合制）、如何构建司法独立的保障机制等，都至关重要。这些制度选择不仅会影响新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会对未来的政治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精英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决策，往往是在信息不充分、时间紧迫、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其结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民主巩固的前景。

2.3 旧地图的智慧与局限：我们曾如何解释民主的到来？35

- **为何这个模式今天越来越难以复制？**转型范式在解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特别是南欧和拉美的一些案例时，展现了强大的解释力。它提醒我们，人的能动性，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抉择，在历史转折关头至关重要。

— **威权体制的“学习效应”：**许多现存的威权国家从过去的转型案例中吸取了“教训”，它们变得更加精明，更善于分化反对派、控制信息、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巩固统治（我们将在第五章详细讨论）。

* **“威权主义学习”（Authoritarian Learning）：**当代的威权统治者不再是过去那种僵化、信息闭塞的独裁者。他们积极研究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例如，他们学会了如何通过操纵选举来制造合法性假象，同时确保自身权力不受实质性威胁；如何利用法律工具来打压异见，而不是仅仅依靠暴力；如何通过控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引导舆论，防范“颜色革命”；如何通过经济发展和选择性的利益分配来收买部分社会阶层，瓦解反对派的社会基础。

— **国际环境的变化：**冷战结束后那种“民主是唯一选项”的国际氛围有所减弱。一些大国对推广民主的热情下降，甚至出现了“威权复兴”的论调。

* **地缘政治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曾一度被视为民主在全球推广的黄金机遇。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西方国家自身面临的诸多挑战（如金融危机、民粹主义兴起），一些西方大国对外推广民主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一些非民主大国（如中国、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上升，它们不仅为其他威权国家提供了替代性的发展模式和外部支持，也在国际场合积极挑战以西方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观。

- **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当今许多国家面临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身份认同冲突、民粹主义兴起等，可能比以往更加尖锐和难以调和，使得精英之间达成妥协的难度增大。

* **深层结构性矛盾的凸显：**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更深陷于贫富差距悬殊、族群矛盾尖锐、国家治理能力低下、腐败丛生等结构性困境。在这些背景下，即便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也很难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因为政治竞争的激化而加剧社会分裂。民粹主义的兴起，也使得理性的政策辩论和精英之间的妥协更加困难。

- **公民社会与反对派力量的演变：**在一些国家，长期的威权统治可能已经严重削弱了独立的公民社会和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使其难以形成足够的压力来迫使威权统治者进行谈判。而在另一些

2.3 旧地图的智慧与局限：我们曾如何解释民主的到来？37

情况下，社交媒体的兴起虽然为社会动员提供了新的工具，但也可能导致反对运动的碎片化和缺乏统一领导，难以形成持久的、有策略的政治行动。

现代化理论和转型范式，就像我们探索未知大陆时曾经依赖的“旧地图”。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我们理解波澜壮阔的民主化浪潮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指引。现代化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深层联系，而转型范式则聚焦于政治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和不确定性。然而，正如任何地图都有其测绘的年代和特定的适用范围一样，面对 21 世纪全球政治出现的新现象、民主实践遭遇的新挑战——例如民主的“缓慢退化”、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兴起、数字技术对政治的深刻重塑、以及威权体制展现出的惊人韧性——这些“旧地图”的解释力开始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可能误导我们的认知。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经典理论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绘制出能够更准确反映当前复杂现实的“新地图”。而这，正是本书接下来几个部分将要带领读者一同探索的旅程：我们将深入剖析当代民主所面临的种种“新大陆的挑战”，并尝试寻找可能的“新的航线”。

第二部分

新大陆的挑战——民主的当代困境

第三章 民主的“慢性病”： 当民主不再是“猝死”，而是 “缓慢退化”

在上一章，我们一同回顾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曾席卷全球，为世界带来了普遍的乐观情绪，甚至一度让人相信历史已经找到了其自由民主的最终归宿。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似乎言犹在耳。然而，当我们把视线从那些激动人心的宏大历史叙事，拉回到近二十年乃至近十年波谲云诡的全球政治现实时，一种深切的不安与困惑便会油然而生。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优解”的民主制度，似乎并没有如预期般高枕无忧、一帆风顺。更令人警惕的是，民主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诸多威胁，其表现形态与传统认知中的模式已大相径庭。它不再仅仅是过去那种坦克碾过城市广场、军事强人发表电视政变宣言、反对派领袖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的“猝死”模式——尽管这种粗暴的政变在某些地区仍未绝迹，例如缅甸、

马里、苏丹等地的军事夺权。更为普遍且更具挑战性的，是一种难以在第一时间清晰辨认、其过程往往循序渐进、其后果却同样致命的“慢性病”——民主的缓慢退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慢性病”的病理何在？其“病毒”又是如何传播和变异的呢？

3.1 “温水煮青蛙”：当民主遭遇“慢性病”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一夜之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政变所推翻，坦克轰鸣着驶上首都街头，民选总统被软禁，议会被解散，宪法被中止，反对派领袖遭到大规模逮捕。这无疑是一场民主的“急性病变”或“猝死”。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在第一时间聚焦报道，国际社会（至少是民主国家阵营）也会迅速做出反应，予以谴责、施加制裁，或至少表达严重关切。这种传统的威权复辟模式，其目标是明确的——彻底颠覆现有民主秩序；其过程是激烈的——往往伴随着暴力和强制；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制度的骤然中断。它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虽然破坏力巨大，但也因其戏剧性和可见性而相对容易辨认和定义。人们可以清晰地指出“敌人”是谁，以及民主是何时“死亡”的。

然而，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是一种更为隐蔽、更具迷惑性，也因此可能更具长期破坏力的现象。政治学家们近年来频繁使用诸如“**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民主侵蚀**”（Democratic Erosion）、“**行政**

性集权” (Executive Aggrandizement)、“渐进式威权化” (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 等术语来描述它。这些概念的核心，指向的是一种民主质量逐步下降、民主规范与制度被系统性削弱的过程。这与传统的军事政变或公然建立一党独裁统治有何本质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或许就在于其“合法性”的外衣和过程的“渐进性”。民主倒退的操盘手，往往并非来自体制外的军事强人或革命领袖，而是那些最初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人物或政党。他们深谙民主游戏的规则，也懂得如何利用这些规则来逐步达到反民主的目的。他们通常不会在一开始就公然宣布“民主已死”或者要建立独裁统治——那样做无疑会引发国内外强烈的反弹。相反，他们可能会继续高举民主的旗帜，定期组织选举（尽管选举的公平性会越来越值得怀疑），保留议会（尽管议会的权力会被逐渐架空），甚至在口头上依然尊崇宪法（尽管宪法会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和解释）。

但与此同时，他们会像白蚁一般，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一小口一小口地蛀空支撑民主大厦的关键梁柱。这些梁柱包括：确保权力公平竞争的选举制度、制约行政权力的独立司法与立法机构、保障公民知情权与表达权的自由媒体、能够有效组织和发声的公民社会、以及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当这些核心要素被逐一侵蚀、削弱甚至摧毁后，民主即便还保留着选举的外壳，其内核也已荡然无存，蜕变成一种学者们所称的“选举式威权主义”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或“竞争性威权主义”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即一种威权政体利用选举等形式上的

44第三章 民主的“慢性病”：当民主不再是“猝死”，而是“缓慢退化”

民主程序来维系其统治合法性的混合型政体。

这个过程，恰如那则著名的“温水煮青蛙”的寓言。青蛙被放入一锅冷水中，然后慢慢加热。由于水温是逐渐升高的，青蛙在初期可能并不会察觉到致命的危险，甚至会感到舒适。当水温高到足以致命时，它已无力跳出。同样，民主的“慢性病”也是通过一系列看似孤立、影响有限，甚至有时还打着“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腐败”、“回应民意”等冠冕堂皇旗号的措施，逐步积累其破坏效应。每一次小小的制度修改、每一次对反对声音的压制、每一次对司法独立的干预，单独来看，或许并不足以引发公众的强烈警觉或大规模反抗。然而，当这些“小动作”日积月累，量变引发质变，人们蓦然回首时，可能才惊觉民主的根基已被严重动摇，甚至已经名存实亡。

这种“慢性病”式的民主倒退，之所以比“猝死”式的政变更难应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隐蔽性与欺骗性**：由于整个过程往往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甚至通过修改法律来“合法化”其行为，这使得辨别其反民主的本质变得更加困难。当权者会运用各种宣传技巧，将侵蚀民主的行为包装成必要的“改革”或“国家利益”的需要，从而迷惑一部分公众，分化反对力量。
2. **渐进性与常态化**：民主的衰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发生的。每一次微小的权利被剥夺，每一次制度的细微调整，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社会所适应和接受，久而久之，曾经被视为不可接受的状况，也可能被“常态化”。这使得组织有效的、大规模的抵抗变得

3.2 倒退的剧本：民选领袖如何“合法地”侵蚀民主？ 45

更加困难。

3. **国际反应的迟缓与乏力：**相较于公然的军事政变，国际社会对于这种“合法”框架内的民主倒退，往往反应更为迟缓和犹豫。一些国家可能出于地缘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考量，不愿过早介入他国内政，或者难以找到有效的干预手段。当权者也常常利用“主权”原则来抵制外部批评。
4. **国内反对力量的分化与瓦解：**通过精准打击、法律骚扰、利益收买、制造内部分裂等手段，当权者可以有效地分化和瓦解国内的反对派力量，使其难以形成统一战线。同时，通过控制信息和舆论，压制批评声音，使得民众难以充分了解真相，也难以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

那么，这些深谙权术、试图“合法地”侵蚀民主的领导人，他们手中通常都掌握着一本怎样的“操作手册”？他们会遵循什么样的剧本，一步步将国家引向威权的歧途呢？

3.2 倒退的剧本：民选领袖如何“合法地”侵蚀民主？

虽然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但纵观全球范围内近年来发生的诸多民主倒退案例——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非洲到亚洲——我们会发现，那些试图系统性削弱民主的民选领导人，其所采取

46第三章 民主的“慢性病”：当民主不再是“猝死”，而是“缓慢退化”

的策略和步骤，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仿佛暗示着，在他们手中流传着一本不成文的、但却被反复实践和验证的“威权领袖上位与巩固权力操作手册”。这本“手册”的核心目标，就是逐步清除对行政权力的所有实质性制约，同时维持一个看似民主的表象，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内外反弹的风险。

3.2.1 攻击“裁判员”：控制司法与选举机构

想象一场至关重要的足球比赛。如果其中一方球队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当值裁判，甚至可以在比赛进行中随时更改比赛规则，那么这场比赛的公正性何在？其结果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在民主国家的政治游戏中，独立的司法系统（尤其是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和中立的、专业的选举管理机构，就扮演着类似“裁判员”的关键角色。司法系统负责解释和执行法律，确保政府行为不逾越宪法界限，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选举管理机构则负责组织和监督选举过程，确保选举在自由、公平、透明的条件下进行，其结果能够真实反映民意。这两个“裁判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维系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生命线。

因此，在民主倒退的剧本中，那些试图集权的领导人，其首要目标往往就是系统性地削弱甚至完全控制这些“裁判员”。他们深知，一旦“裁判员”不再中立，不再能够做出公正的“判罚”，那么行政权力就将失去最重要的外部制约，为后续更大规模的权力扩张和规则操纵铺平道路。具体的攻击和控制手段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

- **安插政治亲信，改变机构人事构成**：这是最直接也最

3.2 倒退的剧本：民选领袖如何“合法地”侵蚀民主？ 47

常见的手段。当权者会利用其在议会的多数席位，修改法官、检察官或选举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和罢免程序，降低任命门槛，缩短任期，或者将任命权更多地集中到行政部门手中。例如，他们可能通过立法，允许总统或总理直接任命更高比例的最高法院法官，或者设立新的标准，使得只有那些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获得提名。在选举委员会中，他们也可能通过类似方式，确保委员会主席和关键成员由执政党的忠诚者担任。一旦这些关键机构的领导层被“自己人”所占据，其独立性自然大打折扣。

- **“清洗”不合作者，制造寒蝉效应：**对于那些坚持独立、不愿屈从于行政压力的法官、检察官或选举官员，当权者会寻找各种借口将其排挤出局。常见的手段包括：以“反腐败”、“提升司法效率”、“机构改革”等名义，对司法系统或选举机构进行重组，趁机将“不听话”的人员调离关键岗位，或迫使其提前退休。在一些更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动用纪律调查、刑事指控等方式，来清除那些被视为“障碍”的个人。这种做法不仅清除了眼前的“钉子”，更对体制内的其他人起到了强烈的“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制造出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氛围，迫使更多人选择沉默或顺从。
- **削弱机构权限，架空监督职能：**即使无法完全控制人事，当权者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司法机构或选举委员会的权限。例如，他们可能立法剥夺宪法法院对某些特定类型法律（如紧急状态法、国家安全法）

的司法审查权，或者规定法院不能推翻某些行政决策。在选举方面，他们可能将选举争议的最终裁决权从独立的选举法院转移到由执政党控制的议会委员会，或者大幅提高提起选举诉讼的门槛。通过这种方式，即便“裁判员”本身尚存一定的独立性，但其手中的“哨子”和“红黄牌”的威力已被大大削弱。

- **恐吓施压，制造外部压力：**除了制度层面的操弄，当权者还会运用各种非正式手段，对司法和选举机构施加压力。例如，政府高官（包括总统或总理本人）可能会公开发表演讲，点名批评某些法官的判决“不爱国”、“脱离人民”，或者指责选举委员会“效率低下”、“偏袒反对派”。他们还可能通过控制财政预算，来削减司法系统或选举机构的经费，限制其正常运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出现针对法官、检察官或选举官员及其家人的匿名威胁、网络攻击或媒体抹黑，迫使他们在压力之下做出妥协。

一旦这些“裁判员”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那么民主制度的根基就被撬动了。法律将不再是约束权力的准绳，而可能变成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工具；选举也将不再是民意真实表达的渠道，而可能演变成一场精心编排、结果早已内定的政治表演。行政权力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制约之后，便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下一步的权力扩张和对社会资源的攫取。

3.2.2 压制“对手”：噤声媒体与反对派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除了中立的“裁判员”，还需要有强大的“对手”——即能够自由发声、有效监督政府、并为选民提供不同政策选择的反对派力量，以及能够独立调查、揭露真相、促进公共讨论的自由媒体。这两者是确保政府问责、防止权力滥用、维持政治竞争活力的关键要素。然而，在那些试图侵蚀民主的当权者眼中，这些“对手”无疑是其集权之路上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予以压制、削弱甚至清除。他们的策略通常多管齐下，既有硬性的打压，也有软性的收编和操纵：

- **“污名化”与“妖魔化”**：这是成本最低也最常用的舆论战术。当权者会利用其掌控的宣传机器，将独立的、批判性的媒体斥为“假新闻制造者”、“国家利益的背叛者”、“外国势力的喉舌”，将其记者描绘成不负责任、煽动混乱的群体。同样，他们会将合法的反对党和政治异议人士污蔑为“不爱国”、“与外国敌对势力勾结”、“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阴谋集团。通过持续的负面宣传和标签化，试图在公众心目中摧毁独立媒体和反对派的公信力与道义形象，使其失去民众的支持。
- **法律武器化与选择性执法**：在“污名化”的基础上，当权者会动用国家机器，对敢于发声的媒体和反对派人士进行法律骚扰。常见的手段包括：利用模糊的诽谤法、煽动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等，对记者、编辑、媒体所有者以及反对派领袖和活动家进行选择性的调

查、起诉和判刑。他们还可能滥用税法、劳动法、消防安全规定等,对批评性媒体机构或反对党办公室进行频繁的检查和高额罚款,使其疲于应付,甚至被迫关门。这种“法律战”不仅可以直接让批评者噤声,更重要的是制造了广泛的寒蝉效应,让其他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 **控制媒体所有权与广告资源:**除了直接打压,当权者还会通过更隐蔽的方式来控制媒体版图。例如,他们可能通过国有企业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界寡头,收购兼并重要的私营媒体机构,将其转变为亲政府的宣传工具。对于那些尚存的独立媒体,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国家广告投放(在许多国家,政府是最大的广告主之一),或者向私营企业施压,要求其撤回在批评性媒体上的广告,以此来扼杀独立媒体的经济来源。同时,政府会大力扶持那些忠于自己的媒体,为其提供资金、政策优惠和独家新闻,使其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久而久之,媒体生态发生逆转,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而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声音则充斥舆论场。
- **打压与限制公民社会组织:**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s)、工会、人权团体、智库等公民社会组织,是民主社会中监督政府、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因此,它们也常常成为威权化领导人的重点打压对象。常见的手段包括:修改法律,提高 NGO 注册和运作的门槛,要求其接受严格的政府审查和监管;以“国家安全”或“防止外国干涉”为名,限制 NGO 接

3.2 倒退的剧本：民选领袖如何“合法地”侵蚀民主？ 51

受境外资金援助，切断其重要的经费来源；对 NGO 的活动进行骚扰和监控，甚至直接取缔那些被认为具有“政治威胁”的组织。通过这些方式，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其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能力也随之削弱。

- **Generated latex em 操纵信息环境与网络控制**：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传播和公民动员的重要平台。因此，试图集权的领导人也会不遗余力地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控制。他们可能建立“网络防火墙”，封锁境外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配合政府进行内容审查和用户数据监控；培养大量的“网络评论员”（即“水军”或“五毛党”），在网上散布亲政府言论，攻击批评声音，引导网络舆论；甚至在关键时刻采取断网等极端措施。通过对信息流的严密控制，当权者试图塑造一个有利于其统治的“信息茧房”。

当独立的媒体被噤声，敢言的记者被迫沉默或流亡，当反对党领袖身陷囹圄或被边缘化，当公民社会的活力被窒息，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压抑局面。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多元声音的环境下，执政者便可以更加为所欲为，其政策失误难以得到及时纠正，腐败现象也更容易滋生蔓延。民主赖以运作的公共讨论空间被严重侵蚀，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名存实亡。

3.2.3 重划“游戏规则”：修改宪法与选举法

当前两步——即控制“裁判员”和压制“对手”——取得一定成效，行政权力得到初步巩固之后，一些具有长远图谋的领导人并不会就此满足。他们会寻求更“根本性”、更“一劳永逸”的变革，那就是直接修改游戏规则本身——尤其是宪法和选举法这两大根本大法——使其更有利于自己及其政党的长期执政，甚至永久执政。这一步往往是民主倒退过程中最具决定性也最难逆转的一步，因为它直接重塑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竞争的基本框架。常见的操弄手法有：

- **修改宪法，重塑权力架构：**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基本架构、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则。因此，修改宪法是集权领导人改变游戏规则的核心手段。他们通常会利用其在议会中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前述的选举操纵）获得的多数席位，甚至绝对多数（如三分之二）席位，来强行推动宪法修正案。修宪的内容往往针对以下几个方面：
 - **取消或延长领导人任期限制：**这是最赤裸裸也最常见的修宪目标。许多民主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总统或总理的任期限制（例如，不得超过两届），以防止个人长期垄断权力。而试图永久执政的领导人，则会想方设法通过修宪来取消这些限制，为自己“无限连任”铺平道路。
 - **改变国家政体，扩大行政权力：**例如，将原本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通过修宪转变为总统拥有

3.2 倒退的剧本：民选领袖如何“合法地”侵蚀民主？ 53

更大实权的总统制或半总统制。或者，在保留总统制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总统在人事任命、法令颁布、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等方面的权力，同时削弱议会和司法机构对总统的制衡。

- **削弱对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虽然较少直接删除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条款，但当权者可能通过增加限制性条款（如以“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为由进行限制），或者在宪法中引入一些模糊的、有利于行政集权的“义务性”规定，来间接削弱对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 **改变宪法法院的地位和权限：**例如，改变宪法法院法官的产生方式，使其更易受到行政干预；或者限制宪法法院对某些“政治敏感”议题的审查权。

修宪过程往往会打着“顺应民意”、“提升治理效率”、“应对国家危机”等旗号，有时还会通过组织精心策划的全民公投来赋予其“合法性”。然而，其真实目的往往是为当权者量身打造一个更有利于其巩固和行使权力的制度框架。

- **操纵选举法律与制度，确保执政优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即使保留了选举的形式，当权者也可以通过修改选举法律和制度的各种“技术细节”，来巧妙地为自己及其政党创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些操弄手段极其隐蔽，外行往往难以察觉其真实影响，但却

54第三章 民主的“慢性病”:当民主不再是“猝死”,而是“缓慢退化”

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 **不公正的选区划分 (Gerrymandering, 即“杰利蝾螈”现象):** 这是最经典的选举操纵手法之一。执政党利用其对选区划分过程的控制权,通过精心设计选区的边界,将反对党的支持者集中到少数几个选区(使其“浪费”大量选票),或者将反对党的票源分散到多个由执政党占优势的选区(使其难以赢得任何一个议席)。这样,即便执政党的总得票率不高,也能在议会中获得远超其民意支持的席位。
- **修改投票规则与程序:** 例如,突然更改选民登记的要求,增加某些特定群体(通常是反对党的潜在支持者,如年轻人、少数族裔、城市居民)进行选民登记或投票的难度;减少在反对党票仓地区的投票站数量,造成选民排长队而放弃投票;修改邮寄投票或提前投票的规则,使其对自己更有利;或者改变计票和宣布结果的程序,为舞弊留下空间。
- **改变政党法与竞选财务规则:** 例如,提高成立新政党的门槛,限制小党的生存空间;修改政党补助金的分配标准,使执政党获得远多于反对党的财政资源;放宽对竞选资金来源和使用的限制,允许“黑金”流入,从而使财力雄厚的执政党在竞选宣传中占据绝对优势。
- **限制候选人资格:** 通过设立一些模糊的或具有歧视性的候选人资格标准(如财产要求、语言要求、

3.2 倒退的剧本：民选领袖如何“合法地”侵蚀民主？ 55

政治审查)，或者利用司法手段剥夺有实力的反对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这些看似“技术性”的选举制度调整，其累积效应是系统性地扭曲选举的公平竞争环境，使得执政党即使在民意支持度下降的情况下，也能够持续赢得选举，从而将民主选举异化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 **进一步削弱其他独立制衡机构：**除了司法和选举机构，民主国家通常还设有其他一些独立的监督和制衡机构，如审计署（负责监督政府财政支出）、监察专员公署（负责调查行政失当行为）、人权委员会、反腐败委员会等。试图集权的领导人也会逐步削弱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和权限，例如，将其领导人的任命权收归行政部门，削减其预算和人员，限制其调查范围，或者对其调查结果置若罔闻。当这些“啄木鸟”式的监督机构失去作用后，政府的腐败和滥权行为就更难受到有效遏制。

这些对国家根本“游戏规则”的修改，一旦完成，其影响往往是深远而持久的。它们不仅为当权者当前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为其未来的长期执政甚至永久执政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的改变，往往是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的，有时甚至得到了部分民意的“加持”（例如通过公投），这使得其更具欺骗性，也让后续的民主恢复变得异常困难。民主的大厦，就这样在一次次看似合法的“装修”和“改造”中，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结构和功能，最终可能只剩下一个空壳，内里早已被威权所填充。

3.3 典型案例：当“民主”成为通往威权的合法路径

上述的“民主倒退剧本”听起来可能有些理论化和抽象，但遗憾的是，它们并非仅仅停留在政治学家的分析框架中，而是正在世界不同角落以惊人的相似度真实上演。这些案例清晰地揭示了，在 21 世纪，民主的敌人是如何巧妙地利用民主制度自身的程序和合法性外衣，一步步将其引向威权的泥沼。让我们选取两个近年来备受国际关注的典型案例——匈牙利和土耳其——来具体剖析这一过程，感受民主是如何在“合法”的路径下被系统性侵蚀的。

3.3.1 匈牙利：欧尔班的“非自由民主”之路

匈牙利，这个曾经在 1989 年率先推倒与奥地利边界铁丝网、为东欧剧变拉开序幕的国家，一度被视为中东欧地区民主转型的“模范生”。它在 2004 年顺利加入欧盟，似乎已经稳固地融入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行列。然而，自 2010 年，由极具个人魅力和政治手腕的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领导的右翼保守派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 - 匈牙利公民联盟（Fidesz，简称青民盟）——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三分之二多数席位（足以修改宪法）并上台执政以来，匈牙利的民主质量便开始了一段持续的、系统性的倒退之旅。欧尔班政府的一系列举措，精准地演绎了我们前述的“民主倒退剧本”的几乎所有步骤。

第一步：控制“裁判”——司法与选举机构的“青民盟化”

掌握了修宪大权的青民盟政府，首先便将矛头对准了能够对其权力构成最直接制约的司法系统，尤其是宪法法院。

- **削弱宪法法院：**2011年，匈牙利通过了由青民盟主导制定的新宪法（正式名称为《匈牙利基本法》）。新宪法大幅限制了宪法法院的权限，例如，规定其不能再审查与国家预算和税收相关的法律（这使得政府在财政政策上拥有更大自主权），并且取消了宪法法院法官可以连任的规定，同时增加了法官人数，为安插亲信提供了便利。此外，政府还通过立法，允许其在特定条件下绕过宪法法院的裁决。
- **控制法官任命与司法管理：**欧尔班政府推动了司法系统的重大改革，设立了新的国家司法办公室（National Judicial Office, NJO），其主席由国会（即青民盟主导）任命，并拥有对全国法官任命、晋升、调动以及法院预算分配的巨大权力。这使得司法系统的人事和财政大权高度集中，并受到政治干预。大批被认为不忠于政府或持独立立场的法官被迫提前退休或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忠于青民盟的法官。
- **改造检察系统：**总检察长的任命也受到执政党的强烈影响，检察机关在处理涉及政府官员或亲政府人士的腐败案件时，往往显得消极不力，而被用于选择性地起诉反对派人士和批评政府者。

- **重塑选举委员会**：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发生了改变，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广泛质疑。选举相关的立法被频繁修改，往往在临近选举时才仓促通过，使得反对党难以适应。

第二步：压制“对手”——媒体、公民社会与学术界的困境

在司法系统难以构成有效制衡之后，欧尔班政府开始系统性地压缩独立媒体、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的生存空间，以消除批评声音，塑造单一的官方叙事。

- **媒体版图的“国家化”与“寡头化”**：欧尔班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逐步控制了匈牙利绝大部分的媒体市场。
 - **公共媒体的彻底党化**：国家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完全沦为青民盟的宣传工具，其新闻报道充斥着对政府的歌功颂德和对反对派的攻击抹黑，编辑方针受到严格的政治控制。
 - **私营媒体的收购与整合**：通过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界寡头，大批曾经独立的私营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新闻网站被收购，并整合进一个名为“中欧新闻与媒体基金会”（KESMA）的庞大媒体集团。该基金会旗下拥有近 500 家媒体，几乎垄断了匈牙利的媒体市场，其报道口径与政府高度一致。
 - **经济手段的运用**：政府利用其对国家广告资源的控制权，将大量广告投向亲政府媒体，同时对批评性媒体进行广告抵制，使其陷入经营困境。

3.3 典型案例：当“民主”成为通往威权的合法路径 59

- **法律与行政骚扰**：对于少数仍坚持独立报道的媒体，政府则可能通过吊销执照、税务稽查、诽谤诉讼等方式进行打压。
- **打压非政府组织 (NGOs)**：欧尔班政府将许多批评性的 NGOs，特别是那些接受外国资助的人权组织、监督机构和智库，污名化为“外国代理人”、“索罗斯的雇佣军”，指责它们干涉匈牙利内政，威胁国家主权。政府通过了专门针对 NGO 的法律，要求其公开外国捐款来源，并对其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和审查。
- **侵蚀学术自由**：学术界也未能幸免。著名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CEU) 因其自由主义的学术传统和创始人乔治·索罗斯的背景，成为欧尔班政府的重点打压对象，最终被迫将其主要校区迁往维也纳。政府还加强了对大学课程设置、研究经费分配和学术机构领导人任命的控制。

第三步：重划“规则”——宪法与选举法的“定制化”

在控制了司法、压制了媒体和公民社会之后，欧尔班政府利用其在国会的绝对多数，大刀阔斧地修改了国家的根本游戏规则，为青民盟的长期执政量身打造了一套制度体系。

- **新宪法的制定与多次修订**：如前所述，2011 年的新宪法不仅重塑了司法体系，还在国家象征、家庭定义、宗教权利等方面体现了青民盟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并

为后续的集权奠定了基础。此后，该宪法又经历了多次修订，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党的权力。

- **选举法的“杰利蝟螈”式修改：**匈牙利的选举法在青民盟执政期间经历了多次重大修改。其中最受争议的是对选区的重新划分，许多选区被切割和重组，其方式被广泛认为有利于青民盟的候选人，即使其总得票率并非绝对领先，也能在单一选区制中获得更多议席。此外，选举制度从两轮投票制改为一轮多数制，也对小党不利，更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竞选资金的规则、海外选民的投票权等方面的修改，也都被指责为偏袒执政党。
- **削弱议会监督功能：**尽管议会依然存在，但由于执政党占据绝对多数，且议事规则被修改得更有利于快速通过政府提案，议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制衡能力被大大削弱，沦为政府政策的“橡皮图章”。

“非自由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欧尔班·维克托本人并不避讳其对传统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质疑。他曾在2014年公开发表演讲，宣称要在匈牙利建立一个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非自由民主国家”（illiberal democracy），并以俄罗斯、土耳其、新加坡、中国等国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参照。他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个人主义、多元文化、全球化）正在削弱西方国家，而匈牙利需要一种更强调民族认同、基督教文化、传统家庭价值观以及强大国家主导的模式。

3.3 典型案例：当“民主”成为通往威权的合法路径 61

在这种“非自由民主”的框架下，虽然形式上的选举依然定期举行，但由于上述一系列制度性的操弄和对竞争环境的系统性扭曲，选举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已大打折扣。反对党在媒体曝光、竞选资源、组织动员等方面都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受到诸多限制，司法独立和法治精神遭到严重侵蚀。

如今的匈牙利，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国际组织的评估中，已被从“自由”国家降级为“部分自由”国家，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盟内部第一个“选举式威权”国家。欧尔班的“成功”经验，也为其他一些国家试图效仿的民粹主义和威权倾向领导人提供了某种“启示”。匈牙利的案例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曾经的民主转型模范生，是如何在民选领导人的主导下，一步步偏离自由民主的轨道，走向一种“有选举，无民主”或“有民主形式，无民主实质”的混合型政体。

3.3.2 土耳其：埃尔多安的集权之路

土耳其，这个地处欧亚交界、拥有独特世俗化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其民主发展之路也曾一度充满希望，特别是在 21 世纪初，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领导的具有温和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以及与欧盟关系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一度被视为伊斯兰世界民主化的潜在典范。然而，随着埃尔多安执政时间的延长，其个人权力的不断巩固，以及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土耳其的民主也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倒退迹象。尤其是在 2016

62第三章 民主的“慢性病”：当民主不再是“猝死”，而是“缓慢退化”

年7月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之后，这一倒退的步伐显著加快，其手段也更为激烈。

未遂政变后的“大清洗”——司法、媒体与教育界的重创

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军事政变，为埃尔多安政府提供了一个全面清除异己、强化个人集权的“绝佳”契机。政府指责流亡美国的宗教人士费特胡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及其追随者（被政府称为“葛兰恐怖组织”，FETÖ）是政变的幕后黑手，并以此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大清洗”运动。

- **司法系统的“换血”**：数千名被指控与葛兰运动有关的法官和检察官被迅速解职、逮捕或判刑。他们的职位很快被那些被认为忠于政府的人所填补。这使得土耳其司法系统的独立性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法院在审理涉及政府批评者或敏感政治案件时，往往难以做出公正裁决。
- **媒体的全面压制**：大量被指控与葛兰运动有关或批评政府的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新闻网站被强行关闭，其资产被没收。数以百计的记者、编辑和媒体从业人员被逮捕、起诉或判刑，土耳其一度成为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许多独立媒体人被迫流亡海外。政府还加强了对互联网内容的审查和封锁。
- **教育与学术界的整肃**：大批被认为同情葛兰运动或持有异见的大学校长、教授、教师被解雇，学术机构的

3.3 典型案例：当“民主”成为通往威权的合法路径 63

自主权受到严重限制。政府加强了对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控制。

- **军队与公务员系统的清洗：**除了司法、媒体和教育界，军队、警察、情报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也未能幸免，成千上万的军官、警察和公务员因涉嫌参与政变或同情葛兰运动而被清洗。

这场“大清洗”运动，虽然打着“维护国家安全”、“清除恐怖组织”的旗号，但在实践中，其范围被无限扩大，许多并无确凿证据表明参与政变或恐怖活动的人士也受到牵连，包括许多温和的批评者、人权活动家和库尔德政治人物。其直接后果是，土耳其社会中任何可能对埃尔多安权力构成挑战或制约的力量都遭到了严重削弱，为他后续的进一步集权扫清了障碍。

修宪公投——从议会制到总统集权制的根本转变

在通过“大清洗”巩固了权力基础之后，埃尔多安的一个目标，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的国家权力结构，建立一个以总统为核心的强大行政集权体制。2017年4月，土耳其举行了一场极具争议的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在国家仍处于紧急状态、媒体宣传严重不对称、反对声音受到压制的环境下，该修正案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这次修宪的核心内容，是将土耳其从传统的议会内阁制转变为实权总统制。其主要变化包括：

- **废除总理职位：**国家行政权力完全集中于总统一人之手，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

- **扩大总统权力**: 总统获得了直接任命副总统和内阁部长(无需议会批准)、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令、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选举、主导高级别法官(包括宪法法院部分法官和最高司法委员会成员)的任命、以及编制和提交国家预算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
- **削弱议会制衡**: 虽然议会依然存在,但其对总统的制衡能力被大大削弱。例如,议会罢免总统的门槛被提得非常高,几乎不可能实现。总统对立法的影响力也显著增强。
- **延长总统任期**: 总统任期为五年,可以连任一次。但通过一些法律解释,埃尔多安的实际执政时间可能远超传统认知中的两届。

批评者认为,这次修宪严重破坏了土耳其长期以来建立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为埃尔多安的个人集权和长期执政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向威权主义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持续压制异见与反对派力量

在新的总统集权制框架下,埃尔多安政府对国内的异议声音和反对派力量的压制并未放松,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 **针对库尔德政治力量的打压**: 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HDP)及其政治人物持续成为政府打压的重点对象。

许多 HDP 的国会议员、市长和活动家被指控与库尔德工人党（PKK）恐怖组织有关联而遭到逮捕、判刑或剥夺政治权利。

- **限制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批评政府的言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还是公开场合，都可能招致“侮辱总统”、“宣传恐怖主义”、“煽动仇恨”等罪名的指控。和平的集会和示威活动常常遭到警方的强力驱散和参与者的逮捕。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也受到严格限制。
- **利用司法系统进行政治报复：**司法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用于起诉和惩罚那些被政府视为“敌人”的个人和团体，包括记者、学者、人权律师、反对派政治家等。

匈牙利和土耳其这两个案例，尽管在具体路径和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匈牙利更侧重于通过立法和制度操纵进行“温水煮青蛙”式的渐进侵蚀，而土耳其则在未遂政变后采取了更为激烈的“休克疗法”式的集权——但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在 21 世纪，民主的敌人可能并非总是那些手持枪炮、从外部颠覆政权的军事强人，而更可能是那些最初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深谙政治运作规则、并善于利用民粹主义情绪和国家机器的民选领袖。他们利用民主的程序和法律的工​​具，以“合法”甚至“民意”的名义，一步步地、系统性地瓦解民主的制度根基和核心价值。这个过程往往是渐进的，每一步单独来看可能并不那么触目惊心，甚至会被一些人辩解为“必要的改革”或“特殊国情下的选

66第三章 民主的“慢性病”：当民主不再是“猝死”，而是“缓慢退化”
择”。然而，当这些步骤累积起来，其最终结果却足以让一个国家彻底偏离民主的轨道，滑向威权主义的深渊。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一丝寒意，甚至有些沮丧。原来，民主的消亡，除了那种轰轰烈烈、一目了然的“猝死”之外，还有这样一种如“慢性病”般难以察觉、逐步恶化的缓慢退化。这种退化因其隐蔽性、渐进性和“合法性”外衣，而更难防范，也更难逆转。它深刻地提醒我们，仅仅拥有形式上的选举和议会，并不等同于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稳固的、高质量的民主。维护和深化民主，需要持续的警惕、积极的参与以及对那些看似微小但却可能侵蚀民主根基的“蚁穴”的高度关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民主“慢性病”的滋生和蔓延？为何在一些国家，部分民众会选择甚至拥护那些一步步削弱民主制度的领导人？这背后是否潜藏着更为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社会阶层固化、文化认同焦虑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冲击等复杂动因？在下一章，我们将聚焦探讨一个与当前全球民主倒退现象密切相关，并且常常成为其重要催化剂和表现形式的政治议题——民粹主义的崛起。这股“愤怒的政治”浪潮，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席卷开来，它又将如何进一步搅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格局，并对民主的未来构成怎样的挑战？

第四章 愤怒的政治：民粹主义为何席卷全球？

“人民”这个词，在政治的语汇中，既承载着千钧的重量，也散发着温暖的光芒。它象征着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石。然而，当这面神圣的旗帜被某些政治力量巧妙地裁剪和挥舞，声称一群“腐败堕落的精英”正在系统性地背叛“纯洁善良的人民”，而唯有“我”——那个魅力超凡、敢于打破常规的领袖——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发声，并带领他们夺回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力时，你是否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热血沸腾，抑或是一丝清醒的警惕？

欢迎来到民粹主义（Populism）的世界。这并非一个遥远而抽象的学术概念，而是近年来如海啸般席卷全球，深刻搅动各国政治版图，让无数人为之着迷，也让无数人为之忧心的复杂现象。你或许在每日的新闻推送中频繁遭遇这个词汇，它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与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掀起的政治风暴、雅伊尔·博索纳罗在巴西的强势崛起、

欧洲大陆上勒庞等右翼人物的声势浩大，乃至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出现的“强人政治”紧密相连。

但民粹主义究竟是什么？它仅仅是一套哗众取宠的竞选口号，一种精明政客玩弄人心的手段？还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政治病毒，正在侵蚀着民主制度的根基？它为何能在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遍地开花，展现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到底是民主的“修正液”，还是民主的“腐蚀剂”？

这一章，我们将尝试拨开围绕在民粹主义周围的重重迷雾，深入其内核，细致剖析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多样的表现形态、复杂的崛起根源，以及它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政治所构成的深刻挑战。这不仅是对一种政治现象的解读，更是对我们所处时代集体情绪和社会脉搏的一次重要探寻。

4.1 澄清概念：民粹主义不是“主义”，而是“套路”

在 深入探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为民粹主义“正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厘清它的真实面目。许多人一听到“主义”(-ism)这个后缀，便习惯性地将其与那些拥有复杂理论体系、明确政策纲领和清晰意识形态的“大词”相提并论，例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然而，将民粹主义简单归入此类，可能会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偏离正确的理解轨道。

政治学家们普遍认为，民粹主义并非一种内容充实、逻辑自洽的“完整意识形态”(full ideology)。它更像是一种

4.1 澄清概念：民粹主义不是“主义”，而是“套路” 69

独特的政治话语风格、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或者说一套反复上演的“剧本”和“套路”。已故的著名政治学者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甚至认为，民粹主义本身是“空的”，它可以被各种不同的政治内容所填充。荷兰政治学家卡斯·穆德（Cas Mudde）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稀薄的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它本身只有几个核心的观念支点，但可以轻易地附着在其他更“浓厚”的意识形态之上，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

那么，这个“稀薄”的民粹主义，其核心支点究竟是什么？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4.1.1 二元对立、道德化的世界观

这是民粹主义话语的基石。民粹主义者倾向于将复杂多元的社会，极度简化地描绘成两个同质化（homogeneous）且在道德上尖锐对立的阵营：

- **“纯洁的人民”（The Pure People）**：这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勤劳、善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朴素智慧的道德共同体。他们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是所有美德的化身。然而，这个“人民”的边界往往是模糊且具有排他性的，具体指代哪些群体，会因民粹主义者的政治需要而变化。
- **“腐败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与“人民”相对立的，则是一个被指控为自私自利、道德败坏、脱离群众、窃取国家权力和财富的“精英”集团。这个

“精英”同样是一个可以被灵活定义的概念，它可以指涉政治当权派、经济寡头、文化名流、主流媒体、司法系统，甚至是国际组织或“外国势力”。

在这种叙事中，社会矛盾不再是可以通过协商、妥协来解决的利益冲突或政策分歧，而被上升为一场“善”与“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道德决战。民粹主义者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的唯一捍卫者，肩负着带领“人民”向“精英”宣战，夺回本应属于他们的一切的神圣使命。

4.1.2 人民意志至上与反建制姿态

民粹主义者坚称，政治的核心要义在于直接、不打折扣地表达和实现“人民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 of the people）。他们认为，这种“普遍意志”是单一的、不容置疑的，并且在道德上高于一切现存的法律、制度和程序。

- **对代议制民主的怀疑：**民粹主义者往往对复杂的代议制民主程序（如议会辩论、委员会审议、司法审查）表现出不耐烦甚至鄙夷，认为这些程序只是“精英”用来阻挠“人民意志”实现的工具。他们更倾向于诉诸直接民主的形式，如全民公投，或者强调领袖与“人民”之间的直接情感联系。
- **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立场：**由于将现有体制视为“精英”操控的工具，民粹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展现出强烈的反建制姿态。他们将自己塑造为体制的“局外人”、“挑战者”或“颠覆者”，承诺要“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砸烂旧世界”。

4.1 澄清概念：民粹主义不是“主义”，而是“套路” 71

- **领袖的中心地位：**在民粹主义的动员中，领袖人物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通常被描绘成具有超凡魅力、能够洞察并体现“人民意志”的唯一代言人。这种对领袖的强调，有时会使其与“人民”之间形成一种近乎神秘的直接联系，绕过所有中间机构。

4.1.3 模糊性与适应性

如前所述，“人民”和“精英”的定义在民粹主义话语中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这使得民粹主义能够像“变色龙”一样，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议程。

- **左翼民粹主义：**通常将“人民”定义为受压迫的劳动阶级、贫苦农民或边缘化的少数族裔，而将“精英”指向大资本家、金融寡头、跨国公司或帝国主义势力。其核心诉求往往围绕经济平等、社会公正和国家主权。例如，拉丁美洲历史上的一些民粹主义运动就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
- **右翼民粹主义：**则更倾向于将“人民”定义为“本土的”、“土生土长的”国民，强调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优先性。其所针对的“精英”，除了腐败的政治建制派外，还常常包括支持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文化精英”，以及被视为威胁国家认同和安全的移民、少数族裔或国际组织。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多带有右翼或极右翼的底色。

这种模糊性使得民粹主义能够有效地吸纳和整合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怀有各种不满和怨气的人群，形成看似广泛

的“人民联盟”。

4.1.4 民粹主义不是什么？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民粹主义的本质，我们还需要澄清几个常见的误区：

- **民粹主义不等于“受人民欢迎”**：一个政策或一位政治家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它/他就是民粹主义的。民主政治本身就追求民众的认可和选票。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其特定的“人民 vs 精英”的二元对立叙事和对“人民意志”的绝对化解读。
- **民粹主义不等于“为人民服务”**：尽管民粹主义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但其政策的实际效果是否真正惠及广大民众，则需要具体分析。有时，民粹主义政策可能带来短期的虚假繁荣，但长期来看却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
- **民粹主义不等于直接民主**：虽然民粹主义者偏爱公投等直接民主形式，但直接民主本身是一种古老的民主参与方式，其运用是否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取决于其背后的动员逻辑和对少数权利、程序正义的尊重程度。
- **民粹主义不等于所有反建制运动**：并非所有对现有体制的批评和反抗都属于民粹主义。例如，以争取更广泛公民权利、推动制度改革为目标的公民运动，如果其核心逻辑不是建立在“纯洁人民 vs 腐败精英”的

简单对立之上，并尊重多元主义和法治原则，那么就不能轻易将其归为民粹主义。

总而言之，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动员能力的政治风格和话语策略。它通过简化社会矛盾、塑造道德化的敌我阵营、并宣称代表“真正的人民意志”，来挑战现有的政治秩序。理解了它的核心“套路”，我们才能更好地分析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并探究其在全球范围内兴盛的深层原因。

4.2 民粹主义的温床：是什么喂养了这头“猛兽”？

民粹主义的幽灵并非在真空中游荡，它的兴起和蔓延，如同植物生长需要适宜的土壤、水分和阳光一样，也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文化心理氛围和政治制度环境。当这些因素以某种方式组合并相互作用时，便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温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来探寻究竟是什么在喂养这头看似难以驾驭的“猛兽”。

4.2.1 经济根源：全球化下的“被遗忘者”与不平等的焦虑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名言，在某种程度上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全球化带给世界的复杂影响。一方面，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促进了

商品、资本、技术和信息的流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提升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它也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深刻地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催生了广泛的经济不安全感和相对剥夺感，这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最直接、也最普遍的经济动因。

全球化的结构性冲击与“被遗忘的角落”

自 20 世纪末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业纷纷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导致了本土制造业的空心化和传统工业区的衰落。曾经以工厂为中心、拥有稳定工作和社区认同的蓝领工人阶层，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他们面临失业的威胁、工资增长的停滞、社会地位的下降，以及对未来的迷茫。这些“铁锈地带”的居民，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被主流政治所忽视，成为了“被遗忘的人民”。他们昔日的骄傲和尊严受到侵蚀，对那些在全球化中获益的金融精英、科技新贵以及倡导开放市场的政治家们充满了怨恨。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总体上从全球化中受益，但也可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痛苦、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以及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一些未能有效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或者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环节的地区，其民众也可能感受到被边缘化的失落。

不平等的加剧与“赢者通吃”的焦虑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 世纪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趋势。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得财富越来越向少数顶层精英集中，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局面。中产阶级的萎缩、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使得许多人感到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改变自身命运，更无法企及父辈曾经拥有的稳定生活。

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收入和财富上，也体现在机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与衰败的乡村小镇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看得见的差距，以及对“精英们制定了只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规则”的普遍认知，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公平感和凝聚力，为民粹主义者将矛头指向“贪婪的 1%”或“脱离群众的建制派”提供了口实。

经济不安全感的蔓延：从稳定到摇摆

除了失业和贫富差距，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还带来了更为广泛的经济不安全感。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兴起、非标准就业的增加、人工智能对传统岗位的替代威胁，使得许多人，即便是那些拥有稳定工作的人，也对未来感到忧虑。养老金体系的压力、医疗费用的上涨、住房成本的飙升，进一步加重了普通家庭的生活负担。这种弥漫性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更容易受到那些承诺提供简单解决方案、恢复经济确定性的民粹主义叙事的诱惑。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信任的崩塌与愤怒的催化剂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被许多学者视为当代民粹主义浪潮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场危机暴露了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和监管的严重缺失，导致了大规模的失业、企业破产和经济衰退。然而，在危机中，许多造成危机的金融机构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而普通民众却不得不承受危机带来的痛苦后果。这种“大而不倒”的现实，以及后续问责的乏力，极大地摧毁了民众对金融精英、政治精英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信任。人们普遍感到，这个体系是不公正的，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这种深植于心的愤怒和幻灭感，为民粹主义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动力。

4.2.2 文化根源：身份的焦虑与“我们”的危机

如果说经济因素是民粹主义崛起的“硬驱动”，那么文化因素则是其不可或失的“软环境”。在全球化、大规模移民、社会价值观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人感受到自身所珍视的文化传统、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由此产生的焦虑、失落甚至恐惧，为特定类型的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移民潮与文化多元的挑战：谁是“我们”？

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大规模移民带来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的深刻变化。一方面，移民为社

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多元文化。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本土居民而言，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担忧：

- **对国家认同和文化同质性的忧虑：**一些人担心，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会稀释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改变长期形成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甚至威胁到国家的主体认同。他们怀念过去那种相对单一、同质的社会环境，对日益多元的文化景观感到不适甚至排斥。
- **对社会资源和福利体系的竞争感：**在经济不景气或社会福利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一些人会将移民视为就业岗位、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的竞争者，认为移民“抢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资源。
- **安全感的缺失与“他者化”叙事：**特别是在发生恐怖袭击或社会治安事件后，一些右翼民粹主义者会刻意将移民（尤其是来自特定宗教或文化背景的移民）与犯罪、恐怖主义等负面标签联系起来，将其“他者化”，煽动排外情绪和仇外心理，以此来凝聚“本土人民”的危机感和团结意识。

价值观的断裂与“文化战争”

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不仅体现在人口结构上，也体现在价值观层面。围绕性别平等、性少数群体权利、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堕胎、环保等议题，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常常存在深刻的认知分歧和价值冲突，有时甚至演变成所谓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

- **传统价值观的失落感：**那些坚守传统家庭观念、宗教信仰和社会规范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在日益世俗化、自由化的社会中被边缘化，甚至受到嘲笑和攻击。他们感到自己熟悉的世界正在远去，对新兴的、挑战性的价值观感到困惑和不安。
- **对“政治正确”的反感：**一些人认为，过于强调“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和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反而限制了言论自由，造成了“逆向歧视”，或者使得社会对一些重要问题不敢坦诚讨论。这种反感，也容易被民粹主义者利用，他们常常以“打破禁忌”、“说出皇帝新衣真相”的姿态出现。

民粹主义者往往将自己定位为“沉默的大多数”或“普通人的常识”的代言人，激烈抨击那些倡导进步价值观的“文化精英”（如大学教授、媒体记者、艺术家），指责他们脱离群众、推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念，从而加剧了社会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对立。

怀旧的政治：对“失落的黄金时代”的向往

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焦虑感的时代，人们很容易产生怀旧情绪，向往一个想象中的、更加美好、更加纯粹、更加有序的“过去”。民粹主义者非常善于捕捉和利用这种怀旧心理。他们常常通过美化历史、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和伟大传统，来构建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的叙事。

- **“让国家再次伟大”：**无论是特朗普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还是其他国家民粹主义者类似的口号，

都蕴含着对昔日荣光的追忆和对现状的不满。这种叙事能够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集体认同，同时也暗示着当前的困境是由于“精英”的背叛或外部的侵蚀所导致的。

- **对确定性的渴望：**怀旧不仅是对过去的理想化，也是对现实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种逃避。民粹主义者所承诺的“恢复秩序”、“回归传统”，迎合了人们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对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心理需求。

4.2.3 政治根源：当“庙堂之上”不再值得信任

经济的困顿和文化的焦虑，如同干柴，而点燃民粹主义大火的“火星”，则往往来自于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政治精英和主流政党的普遍失望和信任危机。当“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被认为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再值得托附和信赖时，寻求体制外的“颠覆者”和“救世主”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传统政党的“空心化”与代表性的危机

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曾经能够有效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主流传统政党（如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右翼的保守党），在 20 世纪末以来，其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色彩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 **意识形态的趋同与“共识政治”的弊端：**为了争取中间选民，许多主流政党在政策主张上日益趋同，左右翼之间的分野变得模糊。这种“共识政治”或“极端中

间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带来政治稳定，但也使得许多对现状不满的选民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忽视，缺乏真正的政策选择。

- **政党的精英化与脱离群众：**传统政党日益演变成由职业政客、政策专家和竞选顾问主导的“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ies)，它们更像是在争夺国家资源和执政权力，而不是真正植根于社会、回应民众诉求。党员人数的下降、基层组织的萎缩，都反映了政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正在弱化。
- **代表性失灵：**当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回应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社会不平等以及文化焦虑时，那些感到被“背叛”或“遗忘”的选民，自然会转向那些承诺打破现状、挑战建制的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

精英的疏离与信任的流失

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度持续下降，是当代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关键背景。这种不信任感源于多种因素：

- **腐败丑闻与特权现象：**政治献金、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腐败丑闻的频发，以及政治精英被认为享有过多特权、生活方式与普通民众严重脱节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政治的公信力。
- **政策失误与治理低效：**面对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国际冲突等重大挑战时，如果政府显得束手无策、反应迟缓，或者出台的政策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困境，民众的失望和不满就会累积。

- **“精英的傲慢”与民意的隔阂：**一些政治精英在面对民众的质疑和批评时，可能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将民众的诉求斥为“非理性”或“民粹”，这种傲慢进一步加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

当民众普遍认为政治精英是“一个鼻孔出气”、只关心自身利益、无法代表“我们”时，民粹主义者所宣扬的“人民 vs 精英”的对立叙事就极具说服力。

媒体生态的剧变：从守门人到扩音器

传统主流媒体（报纸、电视、广播）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信息“守门人”的角色，对政治信息的传播和公共议程的设置具有重要影响力。然而，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媒体生态，也为民粹主义的传播和动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 **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与传统媒体权威的削弱：**公民可以直接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和发布信息，绕开了传统媒体的编辑和审查。这使得民粹主义者能够更直接地向其支持者传递信息，塑造自身形象，而不必担心受到主流媒体的“负面过滤”或“歪曲报道”。
- **“回音室效应”与“信息茧房”的形成：**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容易将用户困在符合其既有观点和偏好的“信息茧房”中，强化其原有认知，加剧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的叙事在这种环境中更容易得到共鸣和传播。（这部分内容与第四章《数字时代的双刃剑》有所呼应）

- **虚假信息与情绪化表达的泛滥：**社交媒体也成为虚假信息、阴谋论和极端言论滋生和传播的温床。民粹主义者常常利用耸人听闻的标题、煽动性的语言和简单化的口号，来激发民众的情绪，而不是进行理性的政策辩论。
- **“网红政治家”的崛起：**一些民粹主义领袖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打造个人品牌，通过发布生活化的内容、与网民直接互动等方式，营造“亲民”、“接地气”的形象，从而积累大量的“粉丝型”支持者。

当经济的失落感、文化的焦虑感和政治的无力感这三股强大的潜流汇聚在一起，并借由新的媒体技术放大和传播时，民粹主义的浪潮便汹涌而至，席卷全球。它像一面扭曲但又部分真实的镜子，照见了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裂痕、普遍的不安以及对变革的复杂渴望。

4.3 案例分析：形形色色的“人民代言人”

民粹主义的逻辑框架虽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纯洁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并强调领袖对“人民意志”的直接体现——但其在全球各地的具体表现形式却千差万别，如同穿上了不同地域文化和政治现实的“外衣”。它会根据当地的社会矛盾、历史传统、政治制度以及领袖人物的个人特质，呈现出不同的议题焦点、动员策略和政策倾向。通过剖析一些典型的案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

到民粹主义这只“变色龙”是如何在不同环境中展现其形形色色的面貌的。

4.3.1 美国的特朗普现象：“美国优先”与反建制风暴

唐纳德·特朗普在 2016 年的当选及其后续的执政，无疑是近年来全球民粹主义浪潮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冲击力的案例。他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响亮口号，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被遗忘的美国人”(the forgotten men and women)的代言人，猛烈抨击“华盛顿的沼泽”(Washington swamp)、“假新闻媒体”(fake news media)、全球化精英、非法移民以及“不公平的”国际贸易协定。

- **核心叙事与动员对象：**特朗普的核心叙事，是将美国社会划分为勤劳爱国的“真正美国人”（主要是白人蓝领阶层、部分中产阶级以及生活在中小城镇和乡村的保守派选民）与腐败自私的“建制派精英”（包括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当权派、主流媒体、支持全球化的商界领袖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他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对文化多元化感到不安、对传统政治彻底失望的群体的集体怨气。他承诺要打破政治常规，将权力从“精英”手中夺回，并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利益。
- **政策特点：**其政策带有强烈的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色彩。例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对中国等国商品加征关税、修建美墨边境墙、限制移民等。在国内，他试图削弱环保法规，任命保守派法官，并频繁攻击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

- **沟通风格与策略：**特朗普的沟通风格极具个人特色，他偏爱使用简单直接、甚至粗俗的语言，频繁举行大型集会，并通过 Twitter 等社交媒体直接与支持者互动，绕开传统媒体的过滤。他的言论常常充满争议和煽动性，善于制造话题，吸引眼球，但也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他将对他的批评者一概斥为“人民的敌人”，进一步强化了“我们 vs 他们”的对立。
- **对民主制度的冲击：**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质疑、对司法部门的攻击、对媒体的持续贬低，以及在国会山事件中的角色，都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规范和韧性构成了严峻考验。

4.3.2 巴西的博索纳罗：“热带特朗普”的铁腕与争议

雅伊尔·博索纳罗在 2018 年当选巴西总统，常被媒体冠以“热带特朗普”的称号，这不仅因为他与特朗普在政治风格和部分主张上的相似性，也因为他同样代表了对传统政治秩序的颠覆。他以强硬的“反犯罪”、“反腐败”、“反共产主义”和“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姿态上台，赢得了对巴西长期存在的暴力犯罪、经济停滞、大规模腐败丑闻（如

“洗车行动”）以及左翼政治深感不满的选民的支持。

- **核心叙事与动员对象：**博索纳罗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畏强权、敢说真话、能够恢复秩序的“硬汉”形象。他所定义的“人民”主要是指那些渴望安全、厌恶腐败、信奉保守价值观的“好公民”，而“精英”则指向腐败的政客、左翼知识分子、人权活动家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的推动者。他的支持者基础广泛，包括部分中产阶级、福音派基督徒、军警力量以及对传统政治失去信心的年轻选民。
- **政策特点：**他主张放松枪支管制以应对犯罪，支持市场化改革但又带有国家主义色彩，对亚马孙雨林的环境保护持消极态度，并在外交上积极向美国特朗普政府靠拢。他在社会文化议题上极为保守，公开反对堕胎、同性婚姻，并多次发表歧视性言论。
- **沟通风格与策略：**与特朗普类似，博索纳罗也高度依赖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动员，其言论常常充满挑衅和争议。他推崇军人政治，并公开怀念巴西历史上的军政府独裁时期，引发了对其民主承诺的担忧。
- **对民主制度的冲击：**博索纳罗多次攻击巴西的司法系统和选举制度，指责媒体进行不实报道，并试图削弱国会的权力。他对异议声音的压制和对威权手段的偏好，使得巴西的民主前景蒙上阴影。

4.3.3 欧洲的右翼民粹：在多元与主权间徘徊

欧洲大陆是当代右翼民粹主义兴盛的另一个重要舞台。从法国的国民联盟（玛丽娜·勒庞领导）、德国的选择党（AfD）、意大利的联盟党（马泰奥·萨尔维尼曾领导）和兄弟党（焦尔吉娅·梅洛尼领导），到匈牙利的青民盟（欧尔班·维克托领导）、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这些政党虽然在具体纲领和影响力上有所差异，但其核心关切和动员逻辑却有诸多相似之处。

- **核心叙事与动员对象：**欧洲右翼民粹普遍将矛头指向欧盟的超国家权力、大规模移民（尤其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以及多元文化政策。它们强调国家主权、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优先性，将自己定位为“沉默的大多数”或“普通欧洲人”的代表，对抗布鲁塞尔的“官僚精英”、支持移民的“人道主义精英”以及“背叛国家利益”的传统政党。它们成功地利用了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对社会福利被“滥用”的担忧、以及对国家身份认同模糊化的焦虑。
- **政策特点：**这些政党通常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强化边境控制、限制欧盟的权力、捍卫基督教传统文化，并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它们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即主张本国公民优先享有社会福利。一些执政的右翼民粹政党，如匈牙利和波兰的政府，还采取了削弱司法独立、控制公共媒体、打压公民社会等被指责为“民主倒退”的措施。

- **多样性与复杂性：**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以及面临的具体挑战不同，其右翼民粹的表现也各有侧重。例如，东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更多地与摆脱苏联影响后的民族复兴、对俄罗斯扩张的警惕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有关；而西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则更直接地聚焦于移民融合、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地位以及欧盟一体化的未来等问题。

4.3.4 拉丁美洲的左翼民粹：反帝的旗帜与分配的承诺

民粹主义并非右翼的专利。在拉丁美洲，左翼民粹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远的影响。从 20 世纪初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到 21 世纪初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等人掀起的“粉红浪潮”（Pink Tide），都带有鲜明的左翼民粹色彩。

- **核心叙事与动员对象：**拉美左翼民粹通常将“人民”定义为历史上受剥削的底层民众、贫苦农民、城市贫民以及被边缘化的原住民群体。它们所针对的“精英”则主要是指国内的寡头势力、与外国资本勾结的买办阶层、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外部势力。其核心叙事围绕着反抗压迫、争取社会公正、实现财富再分配和捍卫国家主权。
- **政策特点：**这些政权通常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尤其是在能源、矿产等战略性行业）、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提高最低工资、进行土地改革等，试图改善底

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在外交上，它们往往采取强硬的反美立场，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以对抗外部干涉。

- **领袖魅力与直接动员：**拉美左翼民粹领袖往往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和演讲才能，善于通过直接对话、群众集会等方式与支持者建立情感联系，营造一种领袖与人民心意相通的氛围。
- **挑战与争议：**尽管拉美左翼民粹在特定时期内可能在减贫、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常常面临经济管理不善、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通货膨胀、腐败滋生以及对民主制度（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权力制衡）的侵蚀等问题。一些政权最终陷入经济困境和政治危机，甚至走向威权化。

4.3.5 亚洲的民粹身影：强人政治与民族主义的交织

亚洲的政治图景同样复杂多样，民粹主义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虽然可能不像欧美那样形成标签鲜明的“民粹主义政党”，但一些政治领袖的崛起和执政风格，也明显带有民粹主义的印记，并常常与强人政治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交织在一起。

- **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以其“反毒战争”中的铁腕手段和口无遮拦的言论著称。他将自己定位为普通民众的保护者，严厉打击毒贩和犯罪分子，同时也猛烈抨击国内的“寡头精英”、人权组织和

批评他的西方国家。他的支持者主要是那些对国内治安恶化和传统政治腐败深感不满的民众。

- **印度的莫迪：**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带有强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莫迪本人则成功地塑造了出身平民、勤政廉洁、致力于国家复兴的“强人”形象。他将自己与“普通印度人”联系起来，批评国大党等传统政治精英的“王朝政治”和“精英主义”，并承诺带领印度走向繁荣富强。他的政策一方面推动经济改革，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文化层面强化印度教特性，引发了关于世俗主义和少数族裔权利的担忧。
- **共同特征：**亚洲的一些民粹主义表现，往往强调国家团结、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领袖人物常常展现出不容挑战的权威姿态。它们可能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凝聚支持，同时对内部的异议声音和外部的批评采取强硬立场。

通过这些跨越不同大洲和意识形态光谱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民粹主义如同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社会内部的深层矛盾和民众的复杂心态。它既可能是对真实问题的扭曲反映，也可能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的严厉拷问。理解其多样性和地域特殊性，是把握这一全球现象的关键。

4.4 民粹主义对民主的挑战与复杂影响

民粹主义的兴起，无疑对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态和制度运作构成了深刻的挑战。它像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在特定情况下暴露出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促使其进行反思和改革，但在更多时候，其内在的逻辑和实践方式，却可能侵蚀民主的核心价值和规范，甚至为威权主义的复苏打开方便之门。评估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影响，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褒贬，进行细致的辨析。

4.4.1 对自由民主规范的侵蚀

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不仅仅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更包含了一系列对权力的限制、对个体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多元主义的尊重。而民粹主义的核心逻辑，在很多方面都与这些自由民主的基本规范相冲突。

- **“人民意志”对少数权利的压制：**民粹主义者声称代表“真正的人民”的“统一意志”，并认为这种意志应高于一切。这种观念很容易导向对少数群体（无论是种族、宗教、性别还是政治上的少数派）权利的忽视甚至压制。如果“人民的意志”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那么那些持有不同意见或属于少数的人，就可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或“异类”，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就可能受到侵害。这与自由民主强调保护少数、尊重个体差异的原则背道而驰。
- **对权力制衡机制的攻击：**自由民主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如独立的司法系统、自由的媒体、强

大的议会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以防止任何单一权力中心的滥用。然而，民粹主义者往往将这些制衡机制视为“精英”用来阻挠“人民意志”实现的障碍。因此，当民粹主义者上台后，他们常常会试图削弱这些机构的独立性：例如，通过安插亲信来控制司法部门，将独立的媒体斥为“假新闻”并加以打压，限制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或者边缘化议会的监督功能。这种行为直接破坏了民主制度的“免疫系统”。

- **对法治精神的漠视：**民粹主义领袖常常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认为只要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就可以便宜行事，不必拘泥于繁琐的法律程序。他们可能倾向于绕过正常的立法和司法程序，通过行政命令或煽动群众的方式来推行政策。这种对法治的轻蔑，为权力的滥用和人治的回归打开了大门。
- **对政治对手的妖魔化：**民粹主义的“人民 vs 精英”二元对立逻辑，很容易将政治竞争理解为一场不可调和的道德斗争，而不是不同政策立场之间的合法博弈。政治对手不再被视为可以对话和妥协的伙伴，而被妖魔化为“人民的叛徒”或“国家的敌人”。这种做法毒化了政治氛围，使得理性的政策辩论和建设性的政治合作难以为继。

4.4.2 加剧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

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往往依赖于制造和放大社会内部的对立与分裂，从而加剧政治极化，侵蚀社会信任，破坏

社会凝聚力。

- **“我们 vs 他们”的身份政治：**无论是基于阶级、民族、宗教还是文化认同，民粹主义者都善于划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并强化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对外部群体的排斥感。这种身份政治的操弄，使得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变得更加困难，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
- **情绪化与非理性政治的蔓延：**民粹主义的宣传往往诉诸民众的恐惧、愤怒、怨恨等负面情绪，而不是进行理性的说服和论证。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情绪化的表达更容易获得传播和共鸣，但也使得公共讨论的质量急剧下降，阴谋论和极端言论大行其道。
- **信任的侵蚀：**民粹主义对“精英”和“建制”的持续攻击，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赢得部分民众的喝彩，但长期来看，却可能导致民众对所有机构（包括政府、议会、法院、媒体甚至科学界）的普遍不信任。在一个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中，合作难以达成，社会共识难以形成，民主治理的成本会急剧上升。
- **潜在的政治暴力风险：**当政治分歧被上升为不可调和的道德冲突，当政治对手被视为“敌人”时，政治暴力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不乏民粹主义煽动导致社会骚乱甚至暴力冲突的案例。

4.4.3 对国际秩序的冲击

当代民粹主义浪潮，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往往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情绪相结合，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多边合作机制构成了挑战。

- **国家主权优先与反全球化：**民粹主义者通常强调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对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等）的约束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认为这些外部力量侵犯了本国的主权和利益。他们倾向于奉行“本国优先”的政策，对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持负面看法。
- **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在经济领域，民粹主义常常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主张通过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等方式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反对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做法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
- **对多边主义的削弱：**民粹主义政府可能倾向于退出国际组织、撕毁国际协议，或者消极对待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等需要多边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议题。这无疑会削弱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

4.4.4 民粹主义：民主的警钟还是丧钟？

尽管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规范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一些学者也指出，不应将其完全视为洪水猛兽。在某些情况

下，民粹主义的兴起，也可能是对现有民主制度缺陷的一种“警示信号”。

- **“民主的修正”？**：民粹主义的出现，往往反映了社会中确实存在着被忽视的群体、未被解决的矛盾以及对精英政治的普遍不满。从这个角度看，民粹主义的压力可能迫使主流政治力量反思自身的不足，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议题和人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主的包容性和回应性。它可以像一剂苦药，刺激民主肌体进行必要的调整 and 改革。
- **“不自由的民主”的风险**：然而，即便民粹主义在某些方面起到了“警示”作用，其内在的反多元主义、反建制和领袖崇拜倾向，使其很容易滑向“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甚至威权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体制下，虽然可能保留选举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但公民的自由权利、法治精神和权力制衡却受到严重侵蚀。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就是一个常被提及的案例。

因此，关键在于区分民粹主义的“症状”与其“药方”。民粹主义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如不平等、代表性危机）是真实存在的，需要认真对待；但民粹主义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如排外、削弱制衡、强人统治）则往往是危险的，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性。

4.5 如何回应民粹主义的浪潮？在希望与审慎之间

面对汹涌而来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它对民主制度和
社会和谐带来的多重挑战，我们既不能陷入束手无策的悲观绝望，也不能简单地将其斥为非理性的噪音而置之不理。一个更具建设性的态度是，在深刻理解其根源和复杂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效的应对之道，在希望与审慎之间寻求平衡。这需要政府、政党、公民社会、媒体、学界乃至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努力。

4.5.1 正视根源：回应真实的社会经济诉求

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真实的社会经济困境和民众对不平等、不公正的深切感受。因此，任何有效的应对策略，都必须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

- **推动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政府需要制定和实施能够惠及更广泛人群的经济政策，而不仅仅是追求 GDP 数字的增长。这包括：
 - **减少不平等：**通过累进税制、遗产税等手段调节财富分配，加大对公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 **投资于人力资本：**为适应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再培训，帮助劳动者提升竞争力，应对失业风险。

- **支持“被遗忘的角落”：**针对那些在全球化和产业转型中受损的地区和社群，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扶持措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 **构建更强韧的社会安全网：**完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等制度，为面临困境的个体和家庭提供必要的缓冲和支持，减少经济不安全感。
- **反思全球化的治理模式：**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使其更加关注劳工权利、环境保护、金融稳定和社会公平，而不是仅仅服务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中，应充分考虑其对国内就业和社会分配的影响。

4.5.2 重建信任：修复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民众对政治精英和现有制度的信任流失，是民粹主义滋生的重要政治土壤。因此，重建信任，修复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治理能力：**
 - **反腐倡廉：**以更大的决心和更有效的制度来防治腐败，确保权力的廉洁运行，严惩以权谋私的行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 **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推动政务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健全对政府官员和民选代表的问责机制。

- **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回应性：**鼓励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广泛听取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回应民众关切。

- **主流政党的革新与反思：**

- **重新联系基层：**主流政党需要摆脱精英化和官僚化的倾向，重新深入基层，倾听普通党员和民众的声音，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和困境。
- **提出清晰的愿景和可行的方案：**面对民粹主义者简单化的口号和承诺，主流政党需要提供更具说服力、更负责任的政策愿景和解决方案，清晰地阐释其政策将如何改善民众的生活。
- **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对于过去的政策失误或治理不当，主流政治家应勇于承认并承担责任，而不是一味辩解或推诿，这样才能重新赢得民众的尊重。

4.5.3 坚守价值：捍卫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则

在应对民粹主义挑战的过程中，决不能以牺牲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为代价。恰恰相反，更需要坚定地捍卫和弘扬这些原则。

- **维护法治与权力制衡：**坚决抵制任何试图削弱司法独立、攻击媒体自由、破坏权力制衡机制的行为。独立的法院、自由的媒体、强大的议会和活跃的公民社会，是防止民粹主义走向威权主义的关键防线。

- **保护少数权利与促进社会包容：**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排外言行，保障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不同族裔、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构建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
- **倡导理性对话与建设性辩论：**努力营造一个能够进行理性对话和建设性辩论的公共空间，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而不是放任情绪化的攻击和妖魔化的指责。

4.5.4 赋能公民：提升媒介素养与批判精神

在信息爆炸和社交媒体主导的时代，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抵御民粹主义宣传和虚假信息侵蚀的根本途径。

-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就应系统地培养学生辨别信息真伪、理解媒体运作、识别宣传技巧的能力，使其能够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
- **支持独立、专业的新闻业：**优质、深入、客观的新闻报道，是公民获取可靠信息、理解复杂议题的重要保障。需要探索新的模式来支持独立新闻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 **鼓励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培养公民不盲从、不轻信、敢于质疑、勇于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其能够穿透民粹主义者华丽的辞藻和简单的承诺，看到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和潜在风险。

结语：愤怒退潮之后

民粹主义的浪潮，如同一次全球性的政治“发烧”，它暴露了我们社会肌体内部的诸多病灶。简单地压制或忽视这种“愤怒的政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矛盾进一步积累。

真正的出路在于，正视民粹主义所反映的真实民情与合理诉求，通过负责任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来缓解社会经济矛盾，修复政治信任，弥合文化裂痕。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粹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坚守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

这无疑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没有一蹴而就的灵丹妙药。它需要长期的努力、持续的反思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当愤怒的潮水逐渐退去，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公正、更具包容性、也更富韧性的民主未来。而这，取决于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和回应这场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风暴。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探讨另一个与民粹主义的传播和民主的挑战密切相关的议题——数字时代的双刃剑，它如何既可能成为解放的技术，也可能沦为监控的利器。

第五章 数字时代的双刃剑： 从“解放的技术”到“监控 的利器”

——十一世纪的晨曦曾被数字技术的万丈光芒所照亮。当智能手机如星辰般散落寻常百姓家，当——社交媒体的触角延伸至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憧憬弥漫在全球。人们普遍相信，一个全新的赋权时代已经来临：信息将如水银泻地般自由流动，冲垮专制的高墙；普通公民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声平台，他们的声音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洪流，推动民主的浪潮奔涌向前。独裁者似乎将在人民雪亮的眼睛和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中瑟瑟发抖，一个更加透明、参与和负责任的治理新纪元仿佛触手可及。

然而，历史的指针无情地摆动。十数载光阴倏忽而过，当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数字技术与民主这对曾经被誉为“天作之合”的伙伴时，心情却变得异常复杂，甚至带有一丝苦

涩。那把曾被寄予厚望、用以斩断专制锁链的“解放之剑”，在现实的磨砺下，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地带来普世的民主福音，反而显露出了它令人胆寒的另一面——它同样可以被锻造成禁锢思想、操纵民意、强化监控的“潘多拉魔盒”。从最初的无限乐观到如今的审慎反思，甚至悲观论调的出现，我们对数字技术与民主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过山车。

本章的探索，正是要深入这片迷雾笼罩的领域，细致剖析这把数字时代的双刃剑。它的一面，曾闪耀着解放与赋权的光辉，点燃了无数人对民主未来的希望；而它的另一面，则潜藏着隔绝、操纵乃至压迫的阴影，对民主制度的根基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将回顾昔日的希望是如何燃起的，审视今日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并尝试探讨在技术浪潮的裹挟下，民主的航船应如何校准方向，继续前行。这不仅是对技术演进的观察，更是对我们时代民主命运的深刻叩问。

5.1 昔日的希望：“解放的技术”叙事的黄金时代

在数字时代的初期，一种强烈的技术乐观主义情绪主导了公共讨论。人们相信技术本身具有某种内在的、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属性。这种信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激动人心的现象和理论基础之上。

5.1.1 “阿拉伯之春”的数字序曲：社交媒体的赋权神话

谈及数字技术对民主的早期积极影响，2010 年底至 2012 年间席卷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无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标志性事件。这场大规模的街头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社交媒体力量的集中展现，也一度将“解放技术”的叙事推向了顶峰。

- **案例回顾：突尼斯、埃及的烽火如何被点燃与传递**在突尼斯，年轻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抗议警察的粗暴执法和羞辱而自焚。这一悲剧性事件的视频和文字描述，通过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平台迅速传播，如同燎原的星火，点燃了突尼斯民众长期以来对失业、腐败和政治压迫积压的怒火。原本孤立的个体悲剧，在社交网络的放大和连接下，迅速转化为全国性的抗议浪潮，最终导致了本·阿里政权的垮台。在埃及，类似的场景接踵而至。年轻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青年，娴熟地运用社交媒体组织和协调抗议活动。例如，谷歌公司时任中东和北非市场部主管瓦埃勒·戈宁（Wael Ghonim）匿名创建的“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Facebook 页面，为纪念一位被警察殴打致死的年轻人，迅速聚集了数十万关注者，成为动员民众参与解放广场大规模示威的关键平台。抗议者通过 Twitter 实时分享现场信息、图片和视频，突破了受到严格控制的官方媒体的封锁，将解放广场的呼声传

递给全世界。一时间，社交媒体似乎成为了对抗威权统治的“瑞士军刀”——既是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是组织动员的工具，更是凝聚共识的广场。

- **关键特征：去中心化、匿名性、即时性带来的颠覆潜力**“阿拉伯之春”的经验，似乎印证了早期互联网观察家们的预言。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传统的、易受控制的媒体节点，任何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个体都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其**相对匿名性**（尽管后来被证明并非绝对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参与者面临的直接风险，鼓励了更多人勇敢发声。而信息的**即时性**，则使得抗议活动能够快速响应、灵活调整，令习惯于信息管控和缓慢决策的威权政府措手不及。这些特性共同构成了对传统威权统治模式的颠覆性挑战。

- **全球的乐观回响：技术决定论的短暂胜利**“阿拉伯之春”的冲击波迅速扩散到全球。西方媒体和学界纷纷将社交媒体誉为“革命的扩音器”、“民主的助推器”、“21 世纪的解放广场”。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只要普及这些新技术，民主的种子就能在专制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美国国务院甚至将推广“互联网自由”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认为这是促进全球民主化的有效途径。这种乐观情绪，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天真，但在当时却拥有广泛的市场，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技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Generated latex

5.1.2 早期互联网精神：开放、共享与公民参与的乌托邦

除了“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戏剧性事件，早期互联网的整体生态和精神气质，也为“解放技术”的叙事提供了支撑。

- **博客、论坛的兴起：个体表达与公共讨论的新空间**在社交媒体大规模兴起之前，博客（Blog）和网络论坛（BBS）的出现，已经为个体表达和公共讨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的思考、评论时事，或者分享专业知识，成为“自媒体”的雏形。网络论坛则围绕特定主题聚集了兴趣相投的人们，形成了虚拟社区，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多元观点的呈现。这些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权，使得边缘群体的声音更容易被听见。
- **开源运动与维基协作：知识民主化的早期尝试**与此同时，计算机领域的开源运动（Open Source Movement）和维基百科（Wikipedia）等协作项目的成功，也体现了互联网的开放、共享和协作精神。开源软件允许用户自由使用、修改和分发代码，挑战了商业软件的封闭模式。维基百科则依靠全球志愿者的共同编辑，构建了一个庞大、动态更新且免费的在线百科全书，成为知识民主化的典范。这些实践似乎预示着，互联网不仅能促进政治民主，也能推动知识、文化等更广泛领域的民主化进程。

在那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数字技术的光环是如此耀眼，以至

于人们对其潜在的阴暗面缺乏足够的警惕。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乌托邦的幻梦很快就将面临现实的严峻考验。

5.2 今日的困境：当“连接”变成“隔绝”，“赋权”走向“操纵”

理想的丰满往往遭遇现实的骨感。“解放技术”的叙事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就迎来了复杂的现实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演进，我们逐渐发现，数字技术对民主的影响远比最初想象的要盘根错节，甚至在许多方面，它开始显露出令人忧虑的负面效应，从曾经的“赋权工具”悄然滑向“操纵利器”。

5.2.1 信息茧房与政治极化：算法正在“撕裂”我们吗？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打开常用的社交媒体或新闻聚合应用，推送给你的信息、观点和产品，似乎总是与你既有的兴趣和偏好高度一致？你点赞过的内容类型会更多地出现，你互动过的用户观点会优先展示。这背后，正是无处不在的“算法”在悄悄塑造你的信息环境。

- **算法的“投喂”逻辑：个性化推荐与用户黏性的商业驱动**现代互联网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其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用户的注意力，并将其转化为广告收入或用户付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平台投入巨资研发复杂的算法推荐系统。这些算

5.2 今日的困境:当“连接”变成“隔绝”,“赋权”走向“操纵”107

法通过追踪分析用户的海量数据——浏览历史、点击行为、点赞评论、停留时长、好友关系、地理位置等等——构建用户画像,并据此“精准”地向用户推送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这种“个性化推荐”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提升用户体验,让用户更快找到所需信息。但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算法的目标函数往往被设定为最大化用户在线时长和互动频率(点赞、评论、分享)。

- **回音室效应与群体极化:心理机制的解读**当用户持续被算法“投喂”符合其既有观点和偏好的信息时,就如同住进了一个由算法精心打造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或“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在这个封闭的循环里,用户不断听到与自己相似的声音,而相异的、挑战性的观点则被算法过滤在外。这种现象会触发并强化一系列心理机制:

- **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 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和回忆那些证实自己已有信念的信息,而忽视或贬低与之矛盾的信息。算法推荐恰好迎合了这种偏误。
- **回音室效应 (Echo Chamber Effect):** 在封闭的社群或信息环境中,观点和信念通过重复传播得到强化,仿佛在回音室中一样,使得群体成员对自身观点的正确性更加深信不疑。
- **群体极化 (Group Polarization):** 当观点相似的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时,他们最终的观点往往会比最初更加极端。在网络环境中,由于缺乏面对

面交流的微妙制约，以及匿名性带来的“去抑制效应”，这种极化现象尤为显著。

- **“过滤气泡”的社会后果：共识的瓦解与部落的形成**信息茧房和政治极化的后果是深远的。首先，它侵蚀了社会共识的基础。如果不同群体接触到的信息完全不同，对基本事实的认知都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就很难就重要的公共议题达成一致。其次，它加剧了社会分裂。人们更容易将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体视为“他者”，甚至“敌人”，而不是可以对话和协商的同胞。政治讨论往往演变成不同“部落”之间的攻讦和谩骂，理性对话的空间被严重挤压。近年来，许多国家选举期间出现的社会高度撕裂、家庭内部因政治观点反目等现象，都与此不无关系。政治不再是寻求共同福祉的努力，而更像是一场零和博弈。
- **案例：从选举撕裂到社会议题的极端化**以美国为例，2016 年及之后的总统选举，被广泛认为是政治极化急剧加深的体现。研究表明，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算法推荐，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用户之间的信息区隔和观点对立。在欧洲，关于移民、气候变化、疫苗接种等敏感议题的讨论，也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出高度极化的态势，不同阵营之间几乎没有交集，只有相互指责。这种现象不仅限于西方民主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交媒体也可能成为煽动族群矛盾、加剧社会对立的工具。

5.2.2 虚假信息与认知作战:“假新闻”如何毒化舆论场?

如果说信息茧房是无形中塑造了我们的认知框架,那么虚假信息的泛滥,则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直接攻击。在数字时代,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门槛之低、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 **“后真相时代”的来临:情感优先于事实“后真相”(Post-truth)** 被《牛津词典》选为 2016 年的年度词汇,它指的是“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社会现象”。在社交媒体主导的信息环境中,耸人听闻的标题、煽动性的言辞、满足特定群体情感需求的叙事,往往比枯燥但准确的事实更容易获得传播。真相的价值似乎在贬值,而立场和情绪则占据了主导。
- **虚假信息的分类:从无心之失到恶意操弄虚假信息并非铁板一块**,根据其意图和准确性,可以大致分为:
 - **错误信息 (Misinformation):** 指的是不准确的信息,但其传播者并无恶意,可能是因为误解、记忆偏差或无意中分享了未经核实的内容。
 - **虚假信息/ d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指的是故意制造和传播的、旨在欺骗或误导他人的虚假信息。这是最具危害性的一种,常常与政治宣传、商业欺诈或网络攻击相关联。
 - **恶意信息 (Malinformation):** 指的是基于真实

信息，但其传播方式或语境被恶意利用，旨在对个人、组织或国家造成伤害。例如，泄露个人隐私、断章取义地使用他人言论等。

- **认知作战的手段：水军、机器人账户、深度伪造(Deep-fakes)** 虚假信息的传播，早已超越了个人恶作剧的范畴，演变成有组织、有策略的“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其手段也日益复杂和隐蔽：

- **网络水军 (Troll Farms/Paid Posters)**：受雇佣的个人或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发布、评论或转发特定内容，以制造虚假舆论、引导话题走向或攻击特定目标。
- **机器人账户 (Bot Accounts)**：自动化的社交媒体账户，能够模拟人类行为，大规模地传播信息、点赞、关注，放大特定叙事的影响力。
- **深度伪造 (Deepfakes)**：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深度学习）制造的虚假音视频内容。例如，将目标人物的面部替换到他人身上，或者合成其声音说出从未说过的话。这种技术的逼真度越来越高，对辨别真伪构成了极大挑战，可能被用于制造政治丑闻、诽谤他人或煽动暴力。
- **微定向宣传 (Microtargeting)**：利用从用户数据中分析出的个人特征和心理弱点，向特定小群体精准推送定制化的宣传信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其态度和行为。

5.2 今日的困境：当“连接”变成“隔绝”，“赋权”走向“操纵”¹¹¹

- **全球案例：选举干预、疫苗恐慌、地缘政治宣传** 虚假信息 and 认知作战的案例在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例如，关于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其中就包括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分裂性内容和虚假新闻。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关于病毒起源、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各种谣言和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严重干扰了公共卫生防疫工作。在地区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中，交战各方或相关国家也常常利用虚假信息来妖魔化对手、争取国际同情或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 **对信任的侵蚀：媒体、机构与个体之间的信任危机** 虚假信息的泛滥，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侵蚀了社会信任的基石。当人们难以分辨信息的真伪时，他们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会下降，对政府机构发布的官方信息也可能持怀疑态度，甚至对专家学者的意见也失去信心。在一个普遍猜疑的社会氛围中，阴谋论更容易滋生，社会凝聚力被削弱，民主赖以运作的理性对话和知情参与变得异常困难。“假新闻”如同一剂慢性毒药，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和民主制度的根基。

5.2.3 威权的“数字升级”：“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如果说信息茧房和虚假信息是民主社会内部面临的“慢性病”，那么数字技术在威权国家手中的运用，则更像是一把锋利无比、寒光闪闪的“监控之剑”。我们曾经天真地以

为,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全球连接性会自然而然地瓦解威权统治的根基。但现实却给出了残酷的答案:一些威权政府不仅没有被数字技术削弱,反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学会了利用这些技术来巩固权力、压制异见、塑造思想,实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数字升级”。

- **“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崛起与特征**“数字威权主义”这一概念应运而生,用以描述威权国家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来监控公民、审查信息、操纵舆论、压制反对派,从而维持和强化其统治的现象。其主要特征包括:

- **全方位监控**:利用各种数字技术收集公民的线上线下数据,构建庞大的个人数据库。
- **精细化审查**:从过去简单粗暴的封锁网站,发展到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关键词过滤、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实现对网络内容的实时、自动化审查。
- **主动性舆论引导**:不再仅仅满足于删除“有害信息”,更通过培养官方“网红”、组织“网络评论员”、投放正面宣传内容等方式,积极塑造和引导网络舆论。
- **技术赋能的社会控制**:将数字技术嵌入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例如用于追踪特定人群、限制其活动、甚至进行“预测性警务”。
- **法律与技术的结合**: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数字监控和审查提供“合法性”外衣。

5.2 今日的困境:当“连接”变成“隔绝”,“赋权”走向“操纵”113

- **监控技术的“军备竞赛”：人工智能、大数据、面部识别、社会信用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威权国家不遗余力地投入到监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形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军备竞赛”：
 - **人工智能 (AI)**：被广泛应用于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语音模式分析、情感识别、自动化内容审查和舆情分析等领域。
 - **大数据 (Big Data)**：通过整合来自政府部门、互联网公司、公共场所摄像头、金融交易等多渠道的海量数据，对个体行为进行深度分析和预测。
 - **面部识别 (Facial Recognition)**：结合遍布城乡的监控摄像头网络（如中国的“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实现对人群的实时追踪和身份识别。
 - **社会信用体系 (Social Credit System)**：一些国家正在探索或实施的社会信用体系，试图通过对公民的各种行为（包括线上言论、消费习惯、交通违章、甚至邻里关系）进行打分和评级，并据此进行奖惩，从而引导和规范社会行为。这种体系因其对个人自由的潜在巨大威胁而备受争议。
 - **生物识别技术**：除了面部识别，还包括指纹、虹膜、声纹、DNA 等生物特征的收集和数据库建设。
- **精细化的审查与舆论引导：从被动删除到主动塑造**传统的网络审查主要依赖人工和简单的关键词过滤，效

率低下且容易规避。而数字威权主义时代的审查则更为精细和智能。AI 驱动的审查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海量信息，自动识别和删除敏感内容，甚至能够理解隐喻、谐音等规避审查的表达方式。同时，政府也投入巨大资源进行“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官方媒体、合作的商业平台、以及庞大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在社交媒体上制造支持政府的声浪，稀释和淹没批评性意见，塑造“可控的”网络环境。

- **“防火墙”的迭代与“数据主权”的滥用**为了控制跨境信息流动，一些威权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防火墙”（Great Firewall），对境外互联网内容进行大规模封锁和过滤。近年来，随着“数据主权”（Data Sovereignty）概念的兴起，一些国家要求科技公司将其公民数据存储在国内，并接受政府监管，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数据的控制能力，但也可能被滥用于侵犯隐私和压制异见。
- **案例剖析：不同威权体制如何运用数字监控**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试点和“天网工程”是数字威权最受关注的案例之一，其目标是利用技术实现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全面评估和引导。俄罗斯则通过立法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存储用户数据于境内，并配合当局提供用户信息，同时积极发展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传播能力，以干预他国政治和塑造国际舆论。一些中东国家则利用从西方或以色列购买的先进监控软件，来追踪记者、活动家和政治异议人士。

- **“数字丝绸之路”与监控技术的全球输出：模式与隐忧**更令人警惕的是，一些在数字监控技术方面“领先”的威权大国，正在积极地将其技术、设备和“治理经验”打包成“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国家安全解决方案”等，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治理能力较弱或同样具有威权倾向的政府推广和输出。这种“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一方面可能帮助这些国家提升一定的治理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助长其国内的监控和压迫，形成“数字威权联盟”，对全球民主前景构成新的、严峻的挑战。

5.3 技术巨头的阴影：平台权力与民主的张力

在数字技术与民主的复杂互动中，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扮演着一个日益重要且充满争议的角色。这些掌控着全球主要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和云计算服务的巨头，如谷歌、Facebook（现 Meta）、亚马逊、苹果、腾讯、阿里巴巴等，已经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力。它们既是数字时代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也是信息流动的塑造者，其商业决策和平台治理政策，对民主社会的运作方式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5.3.1 守门人的新角色：科技公司的巨大影响力

- **从渠道到内容：平台算法决定我们看什么**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机构的编辑扮演着“守门人”（Gatekeeper）的角色，决定哪些信息能够进入公众视野。而在数字时代，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科技公司的算法手中。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向用户推送新闻和信息，搜索引擎通过算法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这意味着，少数几家科技公司的算法设计，深刻影响着数十亿人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内容、观点分布和议程设置。它们不再仅仅是中立的技术渠道，而实质上成为了强大的内容策展者和舆论塑造者。
- **商业模式的驱动：注意力经济与数据资本主义**大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的基础之上。它们免费向用户提供服务，通过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分析其行为偏好，然后向广告商出售精准投放广告的机会。这种模式激励平台不惜一切代价最大化用户的在线时长和互动频率（点赞、评论、分享）。正如前文所述，这直接导致了信息茧房、情绪化内容泛滥等问题。用户的每一次点击、点赞、分享，都在为这些“数据资本家”贡献养料，而用户自身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算法操纵，其隐私权也面临持续的威胁。

5.3.2 内容审核的困境：自由、责任与偏见的拉锯

随着平台上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网络暴力等有害内容的泛滥，要求科技公司承担更多“平台责任”、加强内容审核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内容审核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难题。

- **“平台责任”的争论：出版者还是布告栏？**一个核心的法律和伦理争论在于，这些平台究竟应该被视为像报纸一样的“出版者” (Publisher)，需要对其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还是仅仅像一个提供空间的“布告栏” (Platform/Distributor)，对用户发布的内容享有豁免权（如美国《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所赋予的）。不同的定位，意味着截然不同的责任边界和监管方式。
- **全球内容审核的挑战：规模、语言、文化与政治压力**大型科技平台面临着海量的内容审核任务。例如，Facebook 每天需要处理数百万条用户举报。要对如此规模的内容进行有效审核，既需要先进的技术工具（如 AI 识别），也需要庞大的人工审核团队。然而，人工审核面临诸多挑战：
 - **语言和文化障碍：**全球化平台需要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习俗、俚语和政治敏感点，这对于审核团队来说极其困难。
 - **审核标准的一致性与公正性：**如何制定清晰、公正且能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审核标准，本身

就是一个难题。标准的模糊或执行不当，很容易引发“双重标准”或“偏袒特定立场”的指责。

- **审核员的心理健康：**审核员长期暴露在暴力、色情、仇恨等负面内容中，容易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
- **政府压力：**各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可能向平台施压，要求其删除特定内容或配合提供用户信息，这使得平台在维护言论自由与遵守当地法律之间常常陷入两难。

5.3.3 “取消文化”与言论边界：数字广场的失序与重建

在社交媒体时代，一种被称为“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或“网络公开羞辱”（Online Public Shaming）的现象日益普遍。当某个人（通常是公众人物，但也可能波及普通人）发表了被认为具有冒犯性、歧视性或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后，可能会在网络上遭到大规模的声讨、抵制，甚至导致其失去工作、声誉扫地。

- **网络暴力的蔓延与对个体的伤害**“取消文化”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让有权势者为其不当言行负责、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但批评者则指出，它常常演变成失控的网络暴力和“私刑”，缺乏正当程序，对个体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并可能压制正常的意见表达，造成“寒蝉效应”。

- **平台封禁与言论自由的边界争议**当平台自身介入，对某些用户（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 Twitter、Facebook 等平台永久封禁）采取封号、禁言等措施时，关于言论自由边界的争论就更加激烈。平台是否有权决定谁可以说什么？这种权力是否应该受到监管？这些问题触及了现代民主社会中言论自由的核心原则，也暴露了大型科技平台在公共领域扮演的准治理角色与其私营企业属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技术巨头的崛起，无疑为数字时代带来了便利和创新，但也使其成为了影响民主运作的关键变量。如何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规范其权力、防范其风险，是摆在所有民主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

5.4 数字时代的抗争与反思：民主的韧性 与未来

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挑战——信息茧房、虚假信息、威权监控、平台垄断——民主制度并非束手无策，其内在的韧性和适应能力正在经受考验，同时也催生了多方面的反思与行动。公民社会、研究机构、部分政府以及负责任的个体，都在积极探索应对之策，试图在技术浪潮中重新校准民主的航向。

5.4.1 公民社会的反击:数字工具的再赋权

尽管数字技术被滥用的风险真实存在,但它依然是公民社会进行倡导、监督和赋权的重要工具。许多组织和个人正在创造性地运用数字技术来反击负面影响,捍卫民主价值。

- **事实核查与媒体素养运动的兴起**针对虚假信息的泛滥,全球涌现出大量独立的事实核查组织(Fact-checking Organizations),如 Poynter Institute 的 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PolitiFact、Snopes 等。它们致力于对可疑信息进行专业核查,并向公众发布核查结果,帮助提升信息环境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与此同时,推广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和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教育项目也日益受到重视,旨在培养公民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辨别信息真伪、理解算法影响、负责任地参与网络互动。
- **开源情报与公民调查:揭露真相的新途径**开源情报(Open-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技术的发展,使得记者、研究人员甚至普通公民能够利用公开可得的数字信息(如卫星图像、社交媒体帖子、船舶追踪数据、泄露文件等)进行深度调查,揭露战争罪行、环境破坏、腐败行为和侵犯人权事件。Bellingcat 等公民调查组织的成功案例,展示了数字时代公民监督的强大潜力。
- **加密通讯与反监控技术:保护隐私与异见空间**为了对抗无处不在的数字监控,保护通信安全和个人隐私,

加密通讯工具（如 Signal, Telegram 的部分功能）和匿名化技术（如 Tor 浏览器）被广泛应用于记者、人权活动家、异议人士以及普通网民之中。这些技术为他们在高压环境下安全交流、组织活动和传递信息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 **数字时代的社会运动新形态：组织与动员的挑战与机遇** 尽管面临监控和操纵的风险，数字平台依然是社会运动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场域。从 #MeToo 运动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再到全球各地的环保抗议和劳工维权，社交媒体在议题设定、意识提升、行动协调和跨国连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数字时代的社会运动也面临新的挑战，如如何将线上热度转化为持久的线下行动，如何应对网络水军的干扰和政府的数字压制，以及如何避免运动内部的碎片化和极化。Generated latex

5.4.2 制度层面的探索：寻求监管与创新的平衡

认识到数字技术对民主的潜在威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也开始探索制度层面的应对方案，试图在鼓励技术创新与防范其负面影响之间取得平衡。

- **数据隐私保护立法：如 GDPR 及其全球影响** 欧盟于 2018 年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被视为全球数据隐私保护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它赋予了用户对其个人数据更大的控制权（如访问权、被遗忘权、数据可携权），并对企业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施加了

更严格的义务和高额的罚款。GDPR 的理念和框架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隐私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数据保护标准的提升。

- **反垄断与平台治理：限制科技巨头权力的尝试**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垄断地位和市场势力，一些国家（如美国、欧盟）开始启动反垄断调查和诉讼，并探讨新的平台治理框架。这些措施旨在促进市场竞争，限制科技巨头滥用其数据和市场优势，并可能要求平台在算法透明度、数据共享、内容审核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然而，如何有效监管这些跨国、创新迅速且影响力巨大的科技公司，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全球性议题。
- **数字民主的创新实验：在线审议、电子投票等**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城市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创新和深化民主实践。例如，通过在线平台进行政策咨询、公民审议（如爱尔兰的公民大会部分环节利用了数字工具）、预算参与；在确保安全和公正的前提下，尝试电子投票或在线投票，以提升选举的便捷性和参与度。这些“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或“电子治理”（E-governance）的探索，旨在利用技术更好地连接公民与政府，提升决策的包容性和回应性。

5.4.3 个体的觉醒与责任：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

面对数字时代的复杂挑战，仅仅依靠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每一个身处数字浪潮中的个体，都需要提升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承担起作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Responsible Digital Citizen）的责任。

- **提升媒介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这意味着要主动学习如何辨别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警惕算法推荐可能带来的偏见，对耸人听闻或极端化的信息保持审慎态度，不轻易相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内容。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分析的能力，是抵御信息操纵的第一道防线。
- **参与建设性的网络讨论，抵制网络暴力**在参与网络讨论时，应努力保持理性、尊重的态度，即使面对不同意见，也应尝试理解对方的逻辑和立场，避免使用攻击性、侮辱性的语言。同时，要勇敢地对网络暴力、仇恨言论等有害行为说“不”，支持和保护受害者。
- **保护个人数据，维护数字权利**提高个人数据保护意识，了解自己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使用和分享的，谨慎授予应用权限，使用强密码，警惕网络钓鱼和诈骗。同时，要了解并积极维护自己在数字时代应有的权利，如隐私权、言论自由权（在法律框架内）、知情权等。

结论: 在技术浪潮中校准民主的航向

数字技术,这头曾经被视为纯洁无瑕的“独角兽”,如今展现出其作为“利维坦”的潜能。它既是前所未有的赋权工具,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控制工具。它既能连接世界,促进理解,也能撕裂社会,制造仇恨。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性,决定了它对民主的未来影响,并非单向的、确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它、塑造它、驾驭它。

从“阿拉伯之春”的短暂欢欣,到信息茧房、虚假信息和数字威权的严峻现实,再到公民社会、制度层面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反击,我们看到了一幅复杂而动态的图景。民主的命运,并非简单地由技术本身决定,而是由人类社会在与技术的持续互动中,通过不断的价值选择、制度构建和行动实践来共同塑造。

放弃对技术乌托邦的幻想,也拒绝陷入技术悲观论的泥沼,或许是我们应有的态度。重要的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把双刃剑的锋芒所向,理解其运作的深层逻辑,并积极寻求趋利避害的路径。这需要智慧、勇气,更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广泛的合作。

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探讨一个与数字时代挑战密切相关的议题: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老牌”威权国家,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发展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韧性”,从而对全球民主化前景构成持续挑战的。数字技术的某些面向,恰恰成为了它们强化自身韧性的重要助力。

第六章 威权的“反击战”： 当独裁者们开始“学习”

如果我们视线从民主国家内部令人忧虑的种种困境暂时移开，转向全球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会发现一个同样深刻且不容忽视的现象：那些在冷战结束后一度被认为摇摇欲坠、甚至不堪一击的威权政体，似乎并没有像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终结论”中所大胆预言的那样，纷纷走向历史的垃圾堆，被民主化的浪潮所吞没。恰恰相反，它们中的一些，尤其是那些资源相对雄厚或组织能力较强的政权，不仅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更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生命力”与“适应性”，甚至在某些方面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老练”和“自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些独裁者们一夜之间都集体“开窍”，变得更聪明、更难以对付了吗？抑或是我们以往对威权主义的理解本身就存在某种盲点？理解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对于把握 21 世纪全球政治的真实图景至关重要。

答案，或许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今天的威权政体，其运作逻辑和统治手段，早已不是几十年前那种仅仅依靠领袖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的僵硬灌输以及秘密警察的粗暴镇压就能概括的简单模式。它们在与民主世界长达数十年的共存、竞争乃至直接博弈中，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认知升级”和“技术迭代”。这些政权不再是过去那种信息闭塞、反应迟钝、手段单一、看似强大实则脆弱的“纸老虎”。相反，它们中的佼佼者学会了如何更精巧、更隐蔽、也更具迷惑性地运用各种手段来巩固权力、化解挑战、并有效地维持其统治。要深入理解这场威权的“反击战”及其对全球民主前景的深远影响，我们首先需要掌握并剖析两个在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的核心概念：“威权主义学习”（Authoritarian Learning）与“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6.1 “纸老虎”的进化：威权主义学习与韧性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国家治理比作一场永无止境的复杂考试，那么过去的许多独裁者可能更像是那些依赖直觉、临时抱佛脚、甚至偶尔耍些小聪明的考生，他们的策略往往简单粗暴，缺乏长远规划。然而，进入 21 世纪，我们面对的威权领导者们，则更像是一群异常勤奋且精于算计的“学霸”。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研究自己的“错题本”，更会投入大量精力去仔细分析和解构“优等生”（这其中既包括成功的民主国家，也包括其他表现“优异”的威权

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他们甚至会毫不避讳地互相“抄作业”、借鉴彼此的“最佳实践”，并组织“学习小组”共同“补课”，以期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政权生存几率。

这就是“**威权主义学习**”(Authoritarian Learning)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它指的是威权政体有意识地通过观察、分析、模仿乃至直接引进其他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其他威权国家)的治理手段、政策工具、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宣传技巧乃至意识形态策略，并结合自身所处的具体国情与面临的独特挑战，进行选择性的调整、嫁接和创新的过程。这种学习几乎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

- **学习如何“装点门面”与“合法化包装”**：许多威权政体认识到赤裸裸的强权统治在现代社会难以持久，也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孤立。因此，它们学会了模仿民主制度的某些形式特征，例如定期举行选举(即便这些选举的自由度和公平性受到严格控制)、设立议会(即便议会只是“橡皮图章”)、颁布宪法(即便宪法可以被随意修改或解释)。它们通过操纵候选人资格、限制竞选活动、控制媒体报道、压制独立观察员等方式，确保选举结果始终在统治精英的掌控之中。这种“选举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的策略，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内营造一种虚假的“合法性”表象，缓解部分民众对政治参与的诉求，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减少直接的批评，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它们还学习如何运用法律工具来打压异见，例如以“国家安全”、“反恐”、“打击虚假信息”等名义出台严苛法律，

- **学习如何“精细管理”与“绩效输出”**：一些威权政体，特别是那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政权，开始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西方公共行政的经验，试图更有效地提供部分公共服务，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控制通货膨胀、打击部分腐败（通常是选择性的）等。通过在特定领域展现出治理绩效，它们试图换取民众的默许、支持甚至某种程度的认同，这便是所谓的“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这种策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国家尤为常见，政府试图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政治权利的缺失引向物质生活的改善。
- **学习如何“与狼共舞”与“风险控制”**：21 世纪初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之春”，给全球的威权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他们投入大量资源研究这些案例，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反对派的组织方式、社交媒体的运用、以及外部力量的介入等因素，以防止类似的街头政治和政权更迭在本国上演。它们也学习民主国家在危机管理、公共关系、舆论引导方面的技巧，例如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培养官方“意见领袖”、运用“软宣传”等方式，来维护自身政权的稳定，并试图将任何形式的社会不满都扼杀在萌芽状态。
- **学习如何“科技赋能”与“数字监控”**：与人们最初的乐观预期相反，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并未必然成为威

权主义的掘墓人。相反，许多威权政体积极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社交媒体分析等新兴数字技术，但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赋权于民或提升治理透明度，而是为了构建更高效、更全面、更隐蔽的社会监控体系，更精准地审查信息、引导舆论、识别和压制潜在的异议人士。这种“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的兴起，标志着威权统治手段的一次重大升级。

- **学习如何构建“支持性联盟”与“分化对手”**：老练的威权政权懂得，单靠强制力难以长久维持统治，必须建立一个足够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或至少是分化潜在的反对力量。它们学习如何通过利益输送、政策倾斜、政治吸纳等方式，将社会中的关键群体（如商界精英、部分中产阶级、军队和安全部门、甚至某些知识分子）整合进自己的统治联盟。同时，它们也擅长利用社会既有的矛盾（如城乡差异、族群矛盾、宗教分歧），或者制造新的分裂，来瓦解可能的反对派联盟，使其难以形成统一的挑战力量。

通过这种持续的、多维度的“学习”和“进化”，这些威权政体展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所谓韧性，并不仅仅指政权的“持久性”或“稳定性”，更强调其在面对内外巨大压力（例如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严厉的国际制裁、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甚至是自然灾害或疫情等突发事件）时，能够有效调适自身策略、吸收部分冲击、化解迫在眉睫的危机、并最终维持其核心统治结构和权力垄断的能力。这种韧性并

非来自铁板一块的僵硬和顽固，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动态的、灵活的适应能力和策略调整能力。这些政权懂得在某些非核心领域做出一定的让步和调整，比如在经济民生领域推出一些惠民政策、在反腐败方面采取一些（尽管往往是选择性的）行动以平息民愤、甚至在某些社会议题上展现出一定的“开明”姿态，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争取民心。然而，在涉及其核心权力（如一党执政地位、对军队和媒体的控制、对司法独立的否定等）的根本性问题上，它们则往往寸步不让，甚至会利用危机进一步强化控制，变本加厉。

这种“威权韧性”的来源是复杂且多方面的，绝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学者们通常认为，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支柱：

1. **强制与镇压能力 (Repressive Capacity)**：这是威权统治的基石。强大的、忠诚的军队、警察、安全和情报机构，以及严密的法律体系（服务于政权而非公民），确保了政权能够有效压制任何对其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反对力量。近年来，这种镇压能力也随着技术进步而“升级”，变得更加精准和隐蔽，例如通过网络监控、大数据分析来预防和瓦解抗议活动。
2. **合法性建构策略 (Legitimation Strategies)**：除了强制，威权政权也需要寻求某种形式的合法性，以降低统治成本，争取民众的服从乃至认同。常见的合法性来源包括：
 - **绩效合法性**：如前所述，通过提供经济增长、社

会福利、公共服务和秩序稳定来证明其执政的有效性。

- **意识形态合法性**：通过构建一套具有吸引力或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叙事，如强烈的民族主义、复兴传统文化、宣扬特定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强调外部威胁以凝聚内部团结。
- **程序合法性（有限的）**：通过举行有控制的选举、建立形式上的代议机构、进行有限的政策咨询等，来营造一种“按规则办事”的表象，增加政权运作的可预测性。
- **个人魅力型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领导人个人的超凡魅力或历史功绩也能成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这通常难以制度化和持久。

3. **精英凝聚与权力分享机制(Elite Cohesion and Power-sharing)**：一个威权政权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精英内部是否团结。一些更具韧性的威权政体，往往发展出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分享、利益分配和冲突解决机制，以防止致命的内部分裂。例如，一党制国家内部的派系平衡、军事强人政权中的军官团利益、君主制国家中的王室共识等。当精英层出现严重分裂时，政权往往会变得非常脆弱。
4. **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控制 (Co-optation and Control of Societal Forces)**：老练的威权政权不会将所有社会力量都视为敌人，而是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

策略。它们一方面会严厉打压独立的、具有挑战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也会积极吸纳和收编那些愿意合作的社会精英、商界人士、知识分子等，将他们纳入体制的轨道，使其成为政权的支持者或至少是沉默者。例如，设立官方控制的工会、妇联、商会等（所谓的 GONGOS），或者为亲政府的学者提供研究经费和晋升机会。

5. **国际环境的利用与适应 (Adapta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text)**：威权政权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它们也受到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一些政权能够巧妙地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或者从其他威权大国那里获得经济、军事或外交支持，以抵御来自民主国家的压力。它们也会学习如何利用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来维护自身利益，例如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场合抱团取暖，反对针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

正是这种复杂的、多管齐下、并且不断动态调整的策略组合，使得一些威权政体能够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环境中得以“长盛不衰”，从而有力地打破了那种认为“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必然方向”的简单化论断。理解威权主义的这种学习能力和韧性，是客观看待当今世界政治复杂性的前提。

6.2 “中国模式”的迷思与现实：一个复杂样本的剖析

在探讨威权主义的“学习能力”与“制度韧性”时，有一个国家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它既是这些特性的一个突出体现者，也是全球范围内关于威权主义未来走向讨论的焦点，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模式”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速度惊人的经济奇迹，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被一些人（尤其是部分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一些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甚至奉为主臬的治理经验和发展叙事。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既有赞叹、羡慕、渴望效仿者，也有质疑、警惕、严厉批判者，从而引发了无数的学术讨论和政策争议。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拨开迷雾，客观看待这个极端复杂且仍在快速演变中的样本呢？

6.2.1 “中国模式”的吸引力：看得见的成就与听得见的叙事

对于许多仍在贫困、动荡和发展困境中挣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模式”所展现出的吸引力，至少在表面上是显而易见且难以抗拒的：

- **经济发展的耀眼样板：**最直观的吸引力无疑来自于其惊人的经济成就。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不仅让数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还在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港口、高速公路）、科技创新（如 5G、人工智能、移动支付）、以及城市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对于那些长期深陷贫困泥潭、基础设施落后、或因内部纷争而发展迟缓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让他们看到了快速实现国家崛起的希望。

- **政治稳定的“压舱石”承诺：**与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可能经历的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政策反复甚至暴力冲突相比，“中国模式”似乎提供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替代方案。对于那些饱受战乱、政变、社会撕裂之苦，或者仅仅是厌倦了无休止的政治争吵、渴望社会秩序和政策连续性的民众和领导人而言，这种强调威权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控制的模式，无疑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他们可能会认为，先有稳定，后有发展，民主可以缓行。
- **“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选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根据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选择发展道路，警惕并拒绝全盘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走自己的路”的姿态，以及由此取得的经济成功，极大地迎合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后殖民时代摆脱外部势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控制、维护国家主权、追求民族自强的普遍心理。它似乎提供了一种“非西方”的、可供选择的现代化路径，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唯一神话。

6.2 “中国模式”的迷思与现实：一个复杂样本的剖析135

- **“务实合作”的国际伙伴形象：**在对外经济合作与援助方面，中国往往不像传统的西方捐助国或国际机构那样，附加许多关于民主改革、人权改善、良政治理等方面的政治条件。这种“不干涉内政”、“互利共赢”的姿态，使得那些自身政治体制也存在威权倾向，或者不愿接受西方价值观“说教”的政府，更愿意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获取投资、贷款和技术援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些国家受到欢迎，部分原因也在此。
- **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吸引力：**中国模式展示了一种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资源，制定并执行长期的产业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对于那些希望快速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但又缺乏强大私营部门或成熟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6.2.2 光环之下的现实：成就背后的代价与隐忧

然而，当我们拨开“中国模式”耀眼的光环，深入其内部肌理时，会发现一幅更为复杂甚至矛盾的图景：

- **经济成就与政治高度集权的共生关系：**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领导和高度集权的一党制政治框架内实现的。党不仅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而且其组织和影响力渗透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媒体等几乎所有领域。这种高度集权模式

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或许可以通过高效动员社会资源、快速做出战略决策、强力推行改革措施来推动经济增长。但其根本性的弊端在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权力滥用、腐败滋生、决策失误（一旦方向错误，纠错成本极高），并系统性地压制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 **“数字列宁主义”的全面兴起与社会控制的精细化：**中国在拥抱数字技术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其独特的创新在于将列宁主义的严密组织原则、群众动员能力与现代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物联网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结合，一些学者将其称为“数字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或“技术赋能的威权主义”（Tech-Enhanced Authoritarianism）。这具体表现为：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社会监控系统（如“天网工程”、“雪亮工程”）；实施了严格的网络审查和舆论引导机制（如“网络防火墙”、内容审查、实名制、网格化管理）；并积极探索和推广备受争议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些技术在提升某些社会治理效率（如城市管理、犯罪预防）的同时，也成为了强化政治控制、压制异见、侵犯公民隐私和自由的强大工具，引发了国内外对其可能走向“奥威尔式”高科技极权主义的深切担忧。
- **“绩效合法性”的内在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持续提供经济高速增长和民生改善的能力。然而，当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如人口红利、大规模投资、

6.2 “中国模式”的迷思与现实：一个复杂样本的剖析¹³⁷

出口导向)逐渐减弱,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放缓,甚至面临下行压力时;当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不公、高房价、青年失业等问题日益突出,并引发民众不满时,仅仅依靠经济表现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可持续。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众(尤其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权利意识、环保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诉求,也可能会水涨船高,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往往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层面。

- **“中国模式”输出与复制的内在局限性：**“中国模式”的形成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其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如大一统观念、国家主义思想)、超大规模的人口与市场、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如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西方国家对华接触政策等)所遇到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全球化机遇。这些因素的组合是高度特异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即使真心想要模仿和复制,也往往会因为国情差异巨大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更何况,这种模式对政治权力的极度集中、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系统性压制、对法治精神的漠视,本身就与现代政治文明所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背道而驰。
- **模式内部的深刻矛盾与张力：**细究之下,“中国模式”内部也充满了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张力。例如：

- **创新活力与思想控制的矛盾**：国家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但真正的科技创新和文化繁荣往往需要思想的自由、开放的讨论、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对权威的挑战精神，这与现行体制下严格的言论审查、意识形态控制和对异见的压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深刻的紧张关系。
- **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矛盾**：虽然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党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无处不在，国有企业在许多关键领域占据垄断地位，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壁垒和不确定性。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特定时期可能有效，但也可能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寻租腐败以及不公平竞争。
- **反腐败运动与制度建设的矛盾**：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心，清除了部分腐败官员。但如果反腐败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而缺乏独立的司法监督、自由的媒体监督和真正的制度性权力制约（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独立的廉政机构等），那么反腐败的效果就难以持久，甚至可能演变成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清除异己、巩固个人威权的工具。
- **社会稳定与权利保障的矛盾**：过度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为此不惜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可能会在短期内压制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却可能积累更深层的不满和怨恨，侵蚀社会信任，最终反而可能危及真正的长治久安。

客观地说，“中国模式”是一个仍在演变中的复杂现象，它既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就，也潜藏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外部争议。简单地赞扬或否定，都无法把握其全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批判性地借鉴其在特定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经验，同时警惕其在政治控制和权利限制方面的负面影响。

6.3 当独裁者们“抱团取暖”：威权国际的幽灵

如果说“威权主义学习”更多的是指威权政体在个体层面上的“认知升级”与“能力进化”，那么一个更值得警惕、也对全球民主前景构成更严峻挑战的趋势是：这些“学有所成”并且实力日益增强的威权国家，正在逐渐摆脱过去那种在国际舞台上相对孤立、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状态，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形成某种形式的“国际合作”网络与“战略协同”态势。它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充当被动的适应者或规则的接受者，而是日益展现出成为主动的议程设置者、规则挑战者乃至新秩序塑造者的雄心。它们试图在国际上推广其治理理念和发展模式，削弱甚至改写那些不利于其统治的国际规则和价值观（尤其是关于人权、民主和主权的传统理解）。一个虽然组织松散、形态模糊，但影响力不容小觑的“威权国际”（Authoritarian International）或“威权轴心”（Authoritarian Axis）的幽灵，似乎正在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地平线上悄然浮现。

这种威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与联动，并非像北约（NATO）或欧盟（EU）那样，拥有明确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组织架构、成文条约和常设机构。更多的时候，它表现为一种基于相似的政治制度（非民主）、共同的战略利益（如抵制西方压力、维护政权安全）、趋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如强调国家主权、集体主义、秩序优先）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某些方面共同不满的非正式的、灵活的、多层次的协调与互助。它们“抱团取暖”、“互通有无”、“相互策应”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 **共享“政权保卫”与“社会维稳”的经验和策略：**通过双边互访、官员培训、安全部门交流、多边论坛（如上海合作组织）等渠道，威权国家之间会积极交流和分享其在如何应对国内社会抗议、管理和控制非政府组织（NGOs）、监控和引导互联网舆论、进行“合法化”的选举操纵、防范“颜色革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其定义往往被泛化以包含政治异见）等方面的“实用技巧”和“成功经验”。例如，一些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公开表示要学习俄罗斯或中国在信息控制、社会管理和压制异见方面的“先进做法”。
- **输出监控技术、设备与“数字威权”解决方案：**一些在数字监控技术和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取得“领先”地位的威权大国（尤其是中国），正在积极地将其研发和应用的监控系统（如城市大脑、人脸识别摄像头网络）、网络审查工具（如防火墙技术）、舆情分析软件、乃至社会信用体系的理念和技术打包成“智慧城

市”、“平安城市”、“安全国家”等解决方案，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同样具有威权倾向的政府）推广和出口。这些技术在帮助当地政府提升某些方面的治理能力（如打击犯罪、交通管理）的同时，也极易被滥用于强化对社会的全面监控、压制公民权利和巩固威权统治。

- **协同进行国际宣传、叙事构建与虚假信息攻势：**在日益重要的全球舆论场和认知空间，一些主要的威权国家会投入巨资，利用其官方媒体（如 CGTN, RT）、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如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TikTok）上培养和扶持“网红”与“意见领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雇佣“水军”和公关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协同进行有利于其政权的叙事构建和宣传攻势。它们共同推广的叙事往往包括：强调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批评西方国家“干涉内政”的虚伪性、美化自身发展模式的成就与优越性、贬低和唱衰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端与危机、以及将普世人权观念污名化为“西方价值观渗透”等。它们还会针对特定事件（如国际冲突、他国选举、人权议题）联手散布虚假信息或选择性信息，以混淆视听，制造分裂，影响目标国家的公众舆论。
- **在国际组织中采取“一致行动”以削弱规范压力：**在联合国（UN）及其下属机构，特别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负责社会、人道和文化事务）等场合，威权国家常常会相互协调立场，抱团投票，共同反对那些针对其（或其盟友）人

权记录的批评、调查或决议，试图以此来削弱国际人权机制的有效性和道义压力。它们还会积极推动一些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国际规则和理念，例如强调“发展是最大的人权”（以此淡化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鼓吹“网络主权论”（以此来合法化国家对互联网信息流动的全面控制和审查）、以及主张“文明多样性”（以此来抵制普世标准观念）。

- **提供关键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支持以维系“友好”政权：**在某些关键时刻，一个威权大国可能会向另一个面临内外压力的“友好”威权政权提供重要的经济援助（如优惠贷款、债务减免）、能源供应、军事装备、安全保障甚至直接的政治声援，以帮助后者抵御来自民主国家的制裁或孤立，稳定其国内局势，从而维持其政权的生存。这种支持网络的存在，使得一些孤立的小型威权政权也能够获得外部的“生命线”。
- **构建平行的或替代性的国际机制与平台：**除了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进行博弈，一些威权大国也在尝试推动建立一些由其主导的、能够更好地反映其利益和价值观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合作机制与平台，例如上海合作组织（SCO）在安全领域的扩展、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的深化、以及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构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网络等。这些机制虽然不一定直接以意识形态划线，但在客观上可能为威权国家提供绕开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和机构的替代性选择。

这个正在隐然形成的“威权国际”或“威权合作网络”，无

论其组织化程度如何，都对全球民主的前景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它不仅为各国国内的威权势力提供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合法性资源和“最佳实践”借鉴，也在系统性地侵蚀着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与之相关的普世价值（如民主、人权、法治）。它们试图将世界拉向一个更加强调国家权力、更少关注个体自由、更加“多元化”（实则是为威权主义辩护和使其合理化）的未来。在这个它们所设想的未来图景中，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社会稳定压倒个人自由，集体意志凌驾于个体选择，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则被用来消解对普世标准的追求。

总而言之，当我们谈论民主的未来时，绝不能忽视这股来自威权阵营的强大“反作用力”。独裁者们不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那些愚蠢、落后、不堪一击的统治者。他们也在“学习”，在“进化”，在“合作”。他们正利用全球化的成果、新技术的便利以及民主世界自身的弱点，来巩固和扩展他们的权力。看清他们的策略，理解他们的韧性，揭示他们之间的联动，是我们思考如何应对这场挑战、捍卫民主价值的必要前提。而这，也正是我们下一部分将要深入探讨的议题：在重重迷雾之中，民主的希望究竟在何方？

第三部分

寻找新的航线——民主的未来在何方？

第七章 民主的“免疫系统”：公民社会与制度的韧性

在 前面的章节里，我们一起审视了民主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的种种挑战：从“慢性病”式的内部侵蚀，到民粹主义的汹涌浪潮，再到数字时代的技术双刃剑，以及威权体制如何“学习”与“进化”，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一丝沉重，甚至有些悲观：难道民主真的像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已经步入了黄昏，即将被更“高效”或更“稳定”的模式所取代吗？

先别急着下结论。如果我们把民主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它在遭遇病毒和细菌（也就是各种内外部挑战）侵袭时，并非束手无策。一个健康的生命体拥有强大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威胁、动员防御、甚至在受损后进行修复和进化。同样，民主制度，尤其是那些经历了长期发展、拥有深厚公民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民主体，也内建了一套复杂的“免疫系统”。这个系统或许并不完美，有时反应迟缓，有时甚至会“失灵”，但它的存在，恰恰是民主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这一章，我们将暂时把目光从“病症”转向“疗愈”，从“危机”转向“韧性”。我们将聚焦于全球各地那些为捍卫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看看普通的公民、有组织的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制度本身，是如何在逆境中展现出惊人的抵抗力、适应性和创造力的。这些“黑暗中的光芒”，或许不足以立刻驱散所有阴霾，但它们提醒我们，民主的故事远未结束，它的未来，依然在无数人的行动与坚守中被不断塑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民主“免疫系统”的奥秘，看看它是如何在全球各地的“战场”上发挥作用的。

7.1 公民的抵抗：当“沉默的大多数” 不再沉默

历史反复证明，当权力的天平过度倾斜，当公民的权利受到系统性威胁时，看似无力的个体和松散的社会，往往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公民社会——这个由各种非政府组织、社群团体、独立媒体、学术机构以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个人所构成的广阔领域——正是民主“免疫系统”中最为活跃、也最具能动性的组成部分。它们如同身体里的“白细胞”，在感知到“病原体”入侵时，会迅速行动起来，发起抵抗。

7.1.1 白俄罗斯的呐喊：冰封下的不屈抗争

提起白俄罗斯，很多人的印象可能是一个长期由“欧洲最后独裁者”卢卡申科统治的东欧国家，政治上似乎波澜不

惊。然而，2020 年的总统大选，却像一块巨石投入了看似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涟漪。

风暴的序曲：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自 1994 年以来一直牢牢掌控着白俄罗斯的权力。在 2020 年 8 月的总统选举前，他像往常一样，清除或压制了所有有实力的潜在竞争对手。然而，这一次，民众积压已久的不满——对经济停滞、对缺乏自由、对当局应对新冠疫情不力（卢卡申科曾轻蔑地称其为“精神病”，建议用伏特加和桑拿治疗）——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三位原本并不被看好的女性候选人或其代表（斯维特兰娜·季哈诺夫斯卡娅、维罗妮卡·谢普卡洛和玛丽亚·科列斯尼科娃）意外地走到了一起，她们的出现，点燃了许多白俄罗斯人对变革的渴望。

“拖鞋革命”与鲜花的力量：当官方宣布卢卡申科以超过 80% 的得票率“压倒性”胜选时，许多白俄罗斯人彻底愤怒了。他们认为选举结果被大规模篡改，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随之爆发。这场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很多时候是通过加密社交软件 Telegram 等平台自发组织。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走上街头，他们手持象征反对派的红白相间旗帜，高喊“下台！”、“我们相信！我们能赢！”等口号。

这场抗议的标志性场景之一，是女性的突出作用。她们身着白衣，手持鲜花，组成人链，和平地对抗着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这种以柔克刚的策略，在初期有效地消解了部分暴力冲突的烈度，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人们甚至戏称这场运动为“拖鞋革命”（因为有抗议者将拖鞋扔向警察，象征着对卢卡申科这位“蟑螂”的鄙夷）。

残酷的压制与不灭的火种：面对如此规模的抗议，卢卡

150 第七章 民主的“免疫系统”：公民社会与制度的韧性

申科政权的回应是残酷的。数万名抗议者被逮捕，许多人遭受酷刑和虐待。主要反对派领导人或被迫流亡，或身陷囹圄。互联网被频繁切断，独立媒体受到严厉打压。一时间，白俄罗斯似乎又回到了冰封状态。

然而，这场抗争真的失败了吗？从短期来看，政权似乎稳住了阵脚。但从长远来看，它在白俄罗斯社会内部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卢卡申科的统治合法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民众心中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已经被唤醒。无数普通的白俄罗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亲身参与或见证了这场运动，他们的政治意识和公民勇气得到了锤炼。流亡海外的反对派力量仍在积极活动，争取国际支持，并尝试通过各种渠道与国内保持联系。白俄罗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压制最严酷的环境下，公民的抵抗精神也难以被彻底扼杀。它可能暂时转入地下，但只要时机合适，便会以新的形式重新燃起。这颗不屈的火种，正是未来变革的希望所在。

7.1.2 波兰的司法保卫战：法袍下的坚守与呐喊

如果说白俄罗斯的抗争是民众对公然选举舞弊的直接反抗，那么在欧盟成员国波兰，一场围绕司法独立的“保卫战”则展现了公民社会如何在一个相对成熟的民主体制内部，抵御执政者对核心制度的侵蚀。

“司法改革”的争议：自 2015 年法律与公正党（PiS）上台以来，波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被广泛批评为旨在削弱司法独立、将法院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的“司法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强行改变宪法法院法官的任命和运作方式，赋予司法部长（同时也是总检察长）对普通法院院长更大的任免

权，设立新的纪律审查庭来惩戒“不听话”的法官，以及降低最高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龄以清除资深法官等。

执政党声称，这些改革是为了清除共产主义时期的遗毒，提高司法效率，让法院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批评者——包括波兰国内的许多法官、律师、学者、非政府组织以及欧盟机构——认为，这些举措严重破坏了三权分立原则，威胁到法治的根基，其真实目的是确保司法系统对执政党“忠诚”。

法官们的抵抗：面对来自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巨大压力，波兰的法官们并没有选择沉默。他们成为了这场司法保卫战的中坚力量。许多法官公开批评政府的改革措施，组织抗议活动（例如，身着法袍静默游行），并通过他们的专业协会（如“Iustitia”和“Themis”）发声，向国内外揭示司法独立受到的威胁。

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坚持独立判案或公开批评政府而遭到了纪律处分、降职甚至停职。例如，法官伊戈尔·图莱亚（Igor Tuleya）因其对政府不利的裁决和直言不讳的批评，被剥夺了司法豁免权并被停职。然而，这些打压并没有让所有法官退缩，反而激发了更多同行的声援和更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民社会的支援与欧盟的角色：波兰的司法保卫战并非孤军奋战。大量的普通公民走上街头，支持独立的法官，捍卫宪法。非政府组织（如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提供了法律援助，监测司法改革的进展，并向国际社会发出警报。独立的媒体也持续报道相关事件，揭露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干预。

欧盟机构，特别是欧洲法院（CJEU），在这场博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欧洲法院多次裁定波兰的某些司法改革措施违反了欧盟法律，要求波兰政府暂停或修改相关法律。尽管波兰政府有时对欧盟的裁决置若罔闻，甚至公开挑战欧盟法律的优先地位，但欧盟的介入无疑为波兰国内的抵抗者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持和法律依据。

波兰的案例表明，在一个民主制度面临内部侵蚀的风险时，专业的法律社群、活跃的公民社会以及区域性的超国家机构，可以形成多层次的防线。这场斗争远未结束，其结果将深刻影响波兰乃至整个欧洲的民主未来。它也提醒我们，法治并非一劳永逸的成就，而需要持续的警惕和捍卫。

7.1.3 台湾的公民科技社群：用代码守护民主的“数字长城”

在数字时代，对民主的威胁不仅来自传统的权力滥用，也来自虚假信息、网络攻击和认知作战。面对这些新型挑战，台湾的公民科技（Civic Tech）社群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展示了技术如何被用来赋权公民、提升透明度、对抗虚假信息，从而巩固民主。

挑战的背景：台湾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但同时也长期处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其中包括持续不断的虚假信息攻击和认知作战，试图分化社会、操纵舆论、破坏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

g0v 的诞生与理念：2012 年，一群工程师、设计师和社运积极分子发起了“g0v 零时政府”（发音为 gov-zero）项目。它的核心理念是“用开放数据、开放源码的方式，让政

府更透明，让公民更容易参与公共事务”。g0v 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社群，任何人都可以发起项目、贡献代码、参与讨论。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鼓励公民主动行动起来，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

对抗虚假信息的“数字武器”：面对虚假信息的泛滥，g0v 社群和台湾其他公民团体开发了一系列创新的工具和平台：

- **Cofacts 真的假的：**这是一个协作式的在线事实查核平台。用户可以将可疑的信息（通常来自 LINE 等即时通讯软件）提交给平台，由志愿者编辑进行查证，并给出查核结果和解释。这个过程完全透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贡献或审查。
- **美玉姨 (Auntie Meiyu)：**这是一个 LINE 聊天机器人，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识别常见的谣言。用户将可疑信息转发给“美玉姨”，它会自动比对数据库中的已知谣言，并给出提醒。
-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Taiwan FactCheck Center)：**这是一个专业的、独立的事实查核机构，致力于查证公共领域信息的真伪，提升媒体素养。
- **开源情报与追踪：**一些公民黑客和研究者利用开源情报 (OSINT) 技术，追踪虚假信息网络的来源和传播路径，揭露幕后操纵者。

超越技术：公民素养与社群力量：台湾公民科技社群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技术的先进性，更在于其背后强大的

154 第七章 民主的“免疫系统”：公民社会与制度的韧性

社群动员能力和对提升公民数字素养的重视。他们定期举办“黑客松”(hackathon)，鼓励跨界合作，共同开发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他们也积极推广媒体识读教育，帮助民众提高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

台湾的经验表明，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公民社会可以主动出击，利用技术的力量来捍卫民主。这种自下而上的、由公民驱动的创新，不仅有效地反击了虚假信息，也增强了社会的韧性，促进了更深层次的公民参与。它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台湾模式”。

从白俄罗斯的街头鲜花，到波兰法袍下的抗争，再到台湾键盘上的代码，我们看到的是公民社会在全球不同角落，以多样的形式，为捍卫民主的核心价值而进行的努力。这些故事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胜利”，但它们展现了普通人身上蕴藏的巨大潜能，以及公民社会作为民主“免疫系统”第一道防线的关键作用。

7.2 制度的防线：当“刹车”机制开始启动

公民的自发抵抗固然重要，但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其韧性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其内部的制度设计和权力制衡机制上。这些机制就像汽车的“刹车系统”和“安全气囊”，虽然平时可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在关键时刻，它们能够有效地减缓权力的失控，保护公民的权利，为民主的自我修复争取时间和空间。

7.2.1 独立的司法：法槌下的最后守护者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独立的司法系统都被视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它不仅负责裁决个体之间的纠纷，更肩负着解释宪法、审查法律、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神圣职责。当行政或立法权力试图越界，侵蚀民主根基时，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系统能够，也应该，勇敢地敲响法槌，说“不”。

何为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核心在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来自外部（包括政府、政党、舆论甚至个人私情）的不当干预和压力。这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例如：法官的任命和罢免程序要公正且独立于政治操纵，法官的薪酬和任期要有保障，法院的预算要充足且不受行政部门随意克扣，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享有豁免权等。

司法审查的力量：司法独立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就是司法审查权。这意味着法院有权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或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如果发现违宪，法院可以宣布其无效。这一权力，使得司法系统成为制约多数暴政、保护少数权利、维护宪法至上地位的关键力量。

在美国历史上，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在推动民权、保障言论自由、限制总统权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年）中，确立了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1954年）中，宣布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宪，成为民权运动的重大转折点。即便在当代，面对一些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或立法，独立的法院也常常成为重要的“刹车片”。

挑战与脆弱性：然而，司法独立并非坚不可摧。它时刻面临着来自政治权力的侵蚀风险。正如我们在波兰案例中看到的，民选上台的政府，完全可能通过修改法律、安插亲信、施加政治压力等方式，逐步削弱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法官也是人，他们也可能受到个人偏见、政治倾向或外界压力的影响。因此，维护司法独立，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更需要司法人员自身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勇气，以及公民社会持续的监督和支持。

当法官们能够顶住压力，依据法律和良知做出公正的判决时，他们不仅是在守护个案的正义，更是在守护整个民主制度的根基。他们的每一次独立思考和勇敢发声，都是对民主“免疫系统”的一次重要激活。

7.2.2 自由的媒体：“第四权力”的警觉目光

如果说独立的司法是民主的“盾牌”，那么自由的媒体就是民主的“探照灯”和“报警器”。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媒体被誉为“第四权力”（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它通过信息的自由流动、对公共事务的深入调查、对权力运作的持续监督，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促进公共讨论，并追究当权者的责任。

媒体的核心功能：

- **守望者 (Watchdog)：**这是自由媒体最核心的功能之一。通过调查性报道，媒体揭露政府腐败、权力滥用、政策失误、企业不当行为等问题，将隐藏在暗处的“污垢”暴露在阳光下，从而起到监督和问责的作

用。从“水门事件”到“巴拿马文件”，历史上无数案例证明了媒体作为“守望者”的巨大力量。

- **信息提供者：**媒体向公众提供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议题、社会动态的各类信息，帮助公民做出知情的判断和决策。一个信息多元、透明的社会，是民主有效运作的前提。
- **公共论坛：**媒体为不同观点和声音提供表达和交流的平台，促进社会就重要议题展开理性讨论和辩论，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或至少是相互理解。
- **议程设置者：**通过选择报道哪些议题、如何报道，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的焦点和公共议程的走向。

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在数字时代，媒体的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传统主流媒体对信息传播的垄断，为更多元的声音提供了出口，也降低了公民记者和独立调查的门槛。这为媒体发挥其民主功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数字时代也给自由媒体带来了严峻挑战。虚假信息和“信息疫情”的泛滥，严重侵蚀了媒体的公信力。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加剧了社会极化，使得理性对话更加困难。传统媒体面临着广告收入下滑、受众流失的经济压力，一些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而牺牲新闻的质量和深度。此外，针对记者和媒体机构的网络攻击、法律骚扰和人身威胁也日益增多。

捍卫新闻自由的努力：尽管面临重重困境，全球仍有无数记者和媒体机构在坚守新闻专业主义，致力于提供准确、深入、负责任的报道。各种非营利新闻组织、事实核查机构、记者保护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支持独立调查，打击虚假信息，为受迫害的记者提供援助。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氧气。当媒体能够自由地呼吸，勇敢地发声，敏锐地洞察时，民主的“免疫系统”才能保持警觉，及时发现并应对潜在的威胁。保护记者，支持独立媒体，提升公民的媒体素养，是我们这个时代捍卫民主的重要课题。

7.2.3 强大的地方政府：民主的“毛细血管”与“防火墙”

当我们谈论民主制度时，目光往往聚焦于国家层面的总统、议会和最高法院。但事实上，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系，其根基往往深植于地方。强大的、拥有实质自治权的地方政府，不仅是国家治理的“毛细血管”，将政策和服务输送到基层，更是民主的“实验室”和抵御中央集权侵蚀的“防火墙”。

地方自治的价值：

- **更贴近民意：**地方政府离民众更近，能够更直接地了解和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关切。公民参与地方事务的门槛相对较低，更容易产生政治效能感。
- **政策创新的“实验室”：**地方层面可以进行更多样化、更灵活的政策试验。一个地区成功的创新经验，可以

为其他地区乃至国家层面提供借鉴。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有助于提升整体治理水平。

- **培养公民意识和政治人才：**参与地方治理是培养公民责任感、公共精神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有效途径。许多国家层面的政治领袖，其政治生涯也是从服务地方社区开始的。
- **权力制衡的节点：**在一个中央集权倾向较强的国家，拥有实质自治权的地方政府可以成为制衡中央权力的重要力量。它们可以抵制来自中央的不合理指令，保护地方的特殊利益和文化多样性，防止“一刀切”的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 **重建社会资本与信任：**在社区层面，人们更容易建立面对面的联系，参与共同的公共事务，解决共同的问题。这种互动有助于重建社会资本，增进邻里之间的信任，而社会资本和信任是民主健康运作的重要基础。

地方政府的“刹车”作用：当国家层面的民主机制出现失灵或倒退的迹象时，强大的地方政府有时能够扮演“刹车”的角色。例如，在美国，一些州和市政府在气候变化、移民政策、枪支管控等议题上，采取了与联邦政府相左甚至相对抗的立场，形成了事实上的政策制衡。在一些欧洲国家，地方政府在维护文化多元性、保护少数群体权利、抵制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面临的挑战：当然，地方自治也并非完美无缺。地方政府也可能出现腐败、低效、被地方精英俘获等问题。中央政府也常常试图通过财政控制、立法干预等手段，削弱地方的

160 第七章 民主的“免疫系统”：公民社会与制度的韧性
自治权。如何在保障国家统一和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活力和自主性，是一个需要精细平衡的课题。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权力更加分散，当决策更加贴近基层，当公民拥有更多在地的参与渠道时，民主的根基会更加稳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更强。关注地方，赋权地方，或许是在思考如何加固民主“免疫系统”时，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维度。

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强大的地方政府，这些制度性的安排，如同民主大厦的承重墙和防火带。它们的存在和有效运作，为公民的抵抗提供了支撑，为权力的滥用设置了障碍，为民主的自我纠错和更新迭代创造了可能。

7.3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批评与容纳反抗

走 笔至此，我们一同回顾了全球各地公民社会为捍卫民主而进行的多样化抗争，也审视了民主制度内部那些扮演着“刹车”和“防线”角色的关键机制。这些故事和分析，并非意在描绘一幅民主必胜的乐观图景，因为现实中的斗争往往充满了曲折、反复甚至暂时的失败。然而，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的观点：**民主的真正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它能够容纳和回应批评与反抗的能力之中。**

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不是一个没有问题、没有冲突的“乌托邦”，而是一个能够通过公开的辩论、合法的博弈、持续的改革来处理问题、化解冲突的动态过程。公民的批评、媒体的监督、反对派的挑战、甚至街头的抗议，这些在威权

7.3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批评与容纳反抗¹⁶¹
体制下被视为“不稳定因素”甚至“颠覆力量”的现象,在民主体制中,却可能成为促进制度自我完善、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催化剂。

- **批评是“体检报告”**：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对政府政策和权力运作的批评，就像一份份“体检报告”，指出了民主肌体中可能存在的“病灶”和“隐患”。一个自信的民主制度，不会害怕这些批评，反而会将其视为改进工作的契机。压制批评，如同讳疾忌医，只会让小病拖成大患。
- **反抗是“免疫应答”**：当民主的核心原则（如法治、自由、公平竞争）受到侵蚀时，公民的抵抗和制度的防卫，就像是免疫系统被激活后产生的“应答反应”。这种反应过程本身可能伴随着痛苦和代价，但它对于清除“病毒”、修复损伤、甚至产生更强的“抗体”至关重要。一个能够从危机和挑战中学习并做出调整的民主，会更具韧性。
- **容纳是“力量之源”**：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它能消灭所有不同意见，而在于它能为不同意见提供合法的表达渠道和和平的博弈空间。这种对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容纳，使得社会内部的张力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得到释放和调节，从而避免了矛盾的极端化和暴力化。一个能够容纳反对声音的政府，通常比一个只允许赞歌的政府更稳定，也更能赢得长久的民心。

当然，民主的“免疫系统”并非永远有效，它也可能因为长期的忽视、错误的“治疗”或者过于强大的“病毒”攻击而

162 第七章 民主的“免疫系统”：公民社会与制度的韧性

变得虚弱甚至崩溃。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以为只要有了这些机制，民主就能高枕无忧。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民主倒退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威权主义的诱惑也从未远去。

但关键在于，民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种通过公民参与和制度革新来不断应对挑战、修正错误、走向更完善境界的可能性。这与其他那些宣称掌握了“终极真理”、拒绝任何质疑和改变的封闭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此，当我们审视当今世界民主的处境时，与其沉溺于“民主衰退”的悲观论调，不如更积极地去思考：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激活和强化民主的“免疫系统”？如何让公民的声音被更有效地倾听？如何让独立的司法和媒体更有力地发挥作用？如何让我们的制度更具包容性和回应性？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是有待于每一个珍视自由、认同民主价值的公民，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持续的关注、理性的思考和积极的行动，共同去探索和创造。民主的生命力，最终源于每一个“我们”的生命力。而这，或许正是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依然可以抱有希望的理由。

第八章 重塑我们的民主：

21 世纪的制度创新

在 前面的章节里，我们一同穿越了当代民主所面临的重重迷雾。我们看到了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主化浪潮如何遭遇“慢性病”式的侵蚀，了解了民粹主义这股“愤怒的政治”如何撕裂社会，剖析了数字技术这把双刃剑如何既能赋权于民也能沦为监控利器，更认识到那些看似僵化的威权政体如何在学习和进化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甚至开始“抱团取暖”。读到这里，你或许会感到一丝沉重，甚至会问：面对如此复杂的挑战，民主还有未来吗？我们是否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内外部的压力下步履蹒跚，甚至走向衰败？

先别急着下定论。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探讨民主“免疫系统”时所看到的，民主并非一个脆弱不堪、一触即溃的体系。它拥有内在的韧性，能够容纳批评，也能在公民社会的抵抗和制度的防线中寻求自我保护和修复。然而，仅仅依靠现有的“免疫系统”或许还不足以应对 21 世纪前所未有的

的挑战。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模式，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日益复杂的议题和普遍的信任危机时，也显露出其固有的局限性。政治极化导致议会僵局，政策制定难以回应民意，公民感到被边缘化，这些都削弱了民主的活力和合法性。

那么，我们能否在继承自由民主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民主制度进行必要的“升级”和“改造”，使其更能适应我们所处的时代？能否在选举之外，探索更多元、更深入、更具包容性的公民参与方式？能否利用新技术的力量，而非仅仅警惕其风险，来赋权于民，提升治理的透明度和效率？能否将目光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转向那些更贴近公民日常生活的基层，在那里寻找民主复兴的土壤？

本章，我们将把目光投向全球各地那些正在进行的、充满勇气 and 智慧的民主创新实践。这些创新，有的源于对传统模式的反思，有的得益于新技术的赋能，有的则是在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的探索。它们或许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们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尝试，一种在迷雾中寻找新航线的努力。它们提醒我们，民主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雕塑，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浇灌、修剪、甚至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活的”有机体。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批判性地认识其困境的同时，勇敢地探索和实践新的可能性。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 21 世纪民主创新的“实验室”，看看那些正在被试验和构建的“新工具”，它们能否帮助我们重塑民主，使其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8.1 超越选举：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形式？

我们已经知道，竞争性选举是现代民主的基石，是区分民主与威权政体的最低门槛。它赋予了公民定期选择和更换领导人的权利，为权力的和平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仅仅依靠四年或五年一次的投票，是否足以应对当今社会面临的所有复杂挑战？是否足以让公民真正感到自己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

传统的代议制民主，虽然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面临着日益凸显的局限性：

1. **政治极化与议会僵局：**在许多国家，政治光谱两端的对立日益严重，不同政党之间缺乏合作意愿，导致议会效率低下，难以就重要议题达成共识和通过有效政策。这种僵局让民众感到沮丧和无力。
2. **“赢者通吃”与少数声音的边缘化：**多数票获胜的选举制度，可能导致少数群体的声音和利益被忽视。一旦选举结束，落败一方的支持者可能会感到自己的意见在未来几年内都无法得到有效表达和代表。
3. **政策制定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当代社会面临的议题，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基因编辑等，往往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深入的知识和跨领域的讨论。简单的政治口号和党派立场难以提供周全的解决方案。

4. **公民的疏离感与信任危机：**许多公民感到政治离自己的日常生活太远，政治家似乎只关心选举和权力斗争，而未能真正理解和回应他们的需求。这种疏离感导致了对政治体制的普遍不信任。
5. **短期主义的压力：**政治家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可能更倾向于关注短期利益和眼前效应，而忽视那些需要长期投入和跨代合作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如环境问题、财政可持续性）。Generated latex

这些局限性表明，仅仅依靠选举来聚合民意和制定政策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探索和发展更多元、更具深度、更能促进公民持续参与的民主形式，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代议制体系。这些创新，旨在将民主从一个周期性的“事件”（选举）转变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参与和审议），让更多的公民有机会在投票之外，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中来。

8.2 协商民主：坐下来，好好谈谈？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在面对一个极具争议、撕裂社会、甚至连政治家都束手无策的议题时，不是任由不同阵营在媒体上相互攻讦，不是让议会在党派斗争中陷入僵局，而是邀请一群随机抽取的普通公民，让他们坐在一起，听取各方专家的意见，倾听不同背景人士的经历和感受，进行深入、理性、尊重的讨论，最终形成一份基于共识或多数意见的建议报告，这份报告甚至能够影响国家的立

法和政策走向。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理想化，但这正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核心理念和实践目标。

协商民主并非要取代选举或代议制，而是旨在通过创造特定的空间和流程，让公民有机会进行高质量的公共审议（public deliberation）。这种审议不仅仅是简单地表达个人观点或偏好，更强调在获取充分信息、听取不同视角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交流、质疑、反思，来形成更具公共理性的判断和集体意志。

协商民主的“套路”：虽然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但通常包含以下几个关键要素：

1. **代表性：**参与审议的公民群体，应尽可能地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地理区域、甚至政治观点等方面，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多元构成。随机抽样是实现这一目标常用的方法，以避免参与者被特定利益群体所操控。
2. **信息充分性：**参与者在开始讨论之前，应获得关于议题的全面、客观、易于理解的信息。这通常包括由不同立场专家撰写的背景材料、数据分析、以及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陈述。
3. **平衡性：**审议过程中，应确保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代表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并得到认真倾听。专家证人也应涵盖不同的专业视角。
4. **审议性：**讨论的核心在于“审议”（deliberation），而非简单的辩论或投票。参与者被鼓励倾听他人、提问、反思自己的立场、并尝试理解不同观点的合理性。主

持人通常会接受专业培训，以确保讨论的公平、尊重和富有成效。

5. **与决策过程的连接：**协商民主的最终目标是影响公共决策。因此，审议过程的成果（如建议报告）需要以某种方式被纳入到正式的政治决策流程中，例如提交给议会、政府部门或作为全民公投的参考。

典型案例：爱尔兰的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

爱尔兰在处理一些极具争议、长期困扰社会的议题时，成功地运用了公民大会这一协商民主形式，其经验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 **背景：**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堕胎和同性婚姻等议题长期以来在社会和政治层面都存在巨大分歧，议会难以直接推动改革。
- **公民大会的运作：**为了打破僵局，爱尔兰政府和议会决定设立公民大会。
 - **组成：**公民大会由随机抽取的 99 名普通公民组成，另加一名主席（通常是法官）。其成员构成力求反映爱尔兰社会的人口特征。
 - **流程：**大会通常会持续数月，在周末举行多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公民成员会听取来自法律专家、医学专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如支持堕胎权和反堕胎的团体、LGBTQ+ 权益组织等）的证词和陈述。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小组讨论和全体会议审议，提出问题，挑战

观点，并反思自己的立场。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媒体可以报道，公众可以提交意见。

— **成果：**在完成审议后，公民大会会就议题形成一份详细的报告和一系列建议。例如，关于堕胎议题的公民大会，其报告建议废除宪法中禁止堕胎的条款，并允许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堕胎。关于同性婚姻的公民大会，其报告则强烈支持修改宪法，允许同性伴侣结婚。

- **影响：**公民大会的报告和建议，对爱尔兰后续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议会根据公民大会的建议，就是否修改宪法举行了全民公投。在关于同性婚姻和堕胎权的两次公投中，爱尔兰民众都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了公民大会的建议，最终修改了宪法。

爱尔兰的经验表明，在处理复杂和分裂性议题时，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协商机构，在获得充分信息和进行高质量审议后，能够形成比党派政治更具公共理性和社会共识基础的建议。这种形式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重建对政治过程的信任，并为艰难的政治决策提供新的合法性来源。

协商民主的潜力与挑战：协商民主的潜力在于其能够深化公民参与，提升决策质量，促进社会理解。然而，它也面临诸多挑战：

- **代表性问题：**随机抽样能否真正捕捉到社会的所有细微差异？如何确保参与者不会被少数强势声音所主导？
- **影响力问题：**协商机构的建议是否会被政治决策者认

真对待并采纳？如果其建议被忽视，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公民的幻灭感？

- **成本与效率：**组织大规模、长时间的协商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它是否适用于所有议题？
- **专业性与公共理性：**普通公民能否在短时间内理解复杂的专业议题？审议过程能否真正超越个人偏见和情绪化表达，达到公共理性的高度？ Generated latex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补充和深化代议制民主的创新形式，其价值日益受到认可。它提醒我们，民主不仅仅是“数人头”（投票），更是“听人头”（审议）。在寻求共识、弥合分歧、提升决策质量方面，协商民主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径。

8.3 数字民主：技术是敌是友？

在第四章，我们详细讨论了数字技术对民主构成的严峻挑战：信息茧房、虚假信息、政治极化以及威权国家的数字监控。这些阴影似乎让曾经的“解放技术”叙事黯然失色。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因此全盘否定数字技术在民主领域的应用？抑或是我们应该反思，如何才能更好地设计和运用技术，使其重新成为赋权公民、提升治理、巩固民主的有力工具？

“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或“电子治理”（E-governance）的探索，正是旨在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来增强民主过程的透明度、参与度、回应性和有效性。这并非

简单地将线下活动搬到线上，而是要创造性地利用技术的特性，来解决传统民主模式面临的问题。

数字技术在民主创新中的应用场景：

1. 提升透明度与问责制：

- **开放数据平台：**政府将公共数据（如财政支出、立法记录、环境监测数据等）以开放、可机器读取的格式发布，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监督和分析，揭露腐败和低效。
- **在线追踪系统：**建立在线平台，允许公民追踪政府项目的进展、公共资金的使用、立法草案的审议过程等，使政府运作更加透明。
- **电子请愿与意见征集：**建立官方在线平台，方便公民提交请愿书、对政策草案发表意见，政府需要对收到的意见进行回应。
- **案例：台湾的 g0v 零时政府**（在第六章有所提及，这里可以展开其在透明度方面的贡献）。g0v 社群开发了许多工具，例如“立委行为透明化”网站，追踪立法委员的提案、质询和投票记录；“预算可视化”工具，将复杂的政府预算数据以图表形式呈现，方便公众理解。这些都是利用技术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公民监督能力的典范。

2. 促进公民参与与政策讨论：

- **在线政策咨询平台：**政府或议会建立在线平台，就特定政策议题向公众征求意见。平台可以设计

第八章 重塑我们的民主：21 世纪的制度创新

多种互动方式，如提交书面意见、参与在线投票、进行结构化讨论等。

- **数字化的公民审议：**将协商民主的理念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例如利用在线平台进行信息共享、专家问答、小组讨论和意见聚合。这可以克服线下协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扩大参与范围。
- **参与式预算的数字化：**将传统的参与式预算（公民决定部分公共资金如何使用）过程搬到线上，公民可以在线提交项目提案、讨论、投票，使得更多人能够便捷地参与到社区资源的分配决策中。
- **案例：台湾的 vTaiwan 平台：**这是一个由政府 and g0v 社群合作建立的在线政策咨询平台。政府在制定涉及互联网和技术的新法规时，会邀请公民、专家、企业代表等在 vTaiwan 上进行在线讨论。平台利用 Pol.is 等工具，帮助识别不同意见之间的共识和分歧点，并将讨论结果提交给政府作为决策参考。这种模式成功地处理了一些棘手的数字政策议题。

3. 改善选举过程：

- **电子投票与在线投票：**在确保高度安全和可信的前提下，探索使用电子投票机或允许公民通过互联网投票。这可以提高投票的便捷性，特别是对于海外公民、残疾人士或居住偏远地区的选民。

然而，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身份验证、防止黑客攻击和舞弊等问题。

- **区块链技术在选举中的应用潜力：**一些人认为，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特性，可能为构建更安全、透明的电子投票系统提供新的思路。但这仍处于非常早期的探索阶段。

数字民主的潜力与挑战：数字民主的潜力在于其能够降低公民参与的门槛，扩大参与范围，提升信息透明度，促进更便捷的沟通。然而，它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许多挑战恰恰是第四章讨论的数字技术负面影响的体现：

- **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并非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获取互联网和数字设备，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等可能被排除在外，加剧社会不平等。
- **信息质量与虚假信息：**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如何防止虚假信息和恶意宣传对公共讨论的干扰？
- **政治极化与网络暴力：**如何设计平台和引导讨论，以促进理性对话和相互理解，而不是加剧“回音室效应”和网络暴力？
- **隐私与安全：**如何在收集和使用公民数据以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充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防止数据被滥用或泄露？
- **算法的偏见与透明度：**平台算法如何影响信息的呈现和讨论的走向？如何确保算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 **政府的滥用风险：**在威权或有威权倾向的国家，数字技术更容易被用于强化监控、压制异见，而非赋权公民。如何防止数字民主工具被政府反过来用于巩固威权统治？

因此，发展数字民主并非简单地拥抱技术，而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制度和社会工程。它需要审慎的设计、严格的监管、持续的评估以及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关键在于将技术视为服务于民主价值和目标的工具，而不是让技术本身主导民主的走向。一个成功的数字民主，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并辅之以强大的公民社会和高度的公民数字素养。

8.4 地方民主的复兴：从社区开始重塑信任

当 我们感到国家层面的政治遥远而失灵时，或许应该将目光投向我们身边的社区和城市。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承担着提供教育、医疗、交通、环境、公共安全等与公民日常生活最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地方政治的运作，往往比国家政治更具体、更直接、更贴近民众的需求和感受。正因如此，地方层面也可能成为民主创新和复兴的重要试验田和坚实基础。

为何地方民主至关重要？

1. **贴近性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离公民最近，更容易了解和回应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具体问题。公民参与地

方事务的门槛相对较低，更容易产生政治效能感。

2. **政策创新的“实验室”**：地方层面可以进行更多样化、更灵活的政策试验。一个城市或社区成功的创新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乃至国家层面提供借鉴。这种自下而上的创新，有助于提升整体治理水平。
3. **培养公民意识与政治人才**：参与地方治理是培养公民责任感、公共精神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有效途径。许多成功的政治家都是从地方政治起步的。
4. **抵御中央集权与威权趋势的“防火墙”**：在一个面临中央集权或威权趋势的国家，拥有实质自治权和活力的地方面主，可以成为制衡中央权力、保护地方多样性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力量。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来自中央的不合理指令，为公民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这呼应了第六章关于地方政府作为制度防线的作用）
5. **重建社会资本与信任**：在社区层面，人们更容易建立面对面的联系，参与共同的公共事务，解决共同的问题。这种互动有助于重建社会资本，增进邻里之间的信任，而社会资本和信任是民主健康运作的重要基础。

地方民主创新的形式与案例：地方层面的民主创新实践多种多样，旨在提升公民参与度、透明度和治理效率：

- **参与式预算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这是最广为人知的地方民主创新形式之一。它允许社区居民直接参与决定政府预算中一部分资金的使用。公

民可以提交项目提案（如修建公园、改善街道照明、支持社区活动等），然后通过社区会议、在线平台等方式进行讨论、评估和投票。

- **案例：巴西的阿雷格里港 (Porto Alegre)：**阿雷格里港是参与式预算的起源地，其经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通过参与式预算，该市的公共投资决策更加透明和公平，优先考虑了贫困社区的需求，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也增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感。
- **全球推广：**参与式预算的模式已被全球数千个城市和地区所采纳，并根据当地情况进行了调整和创新，例如利用数字平台进行在线参与式预算。
- **社区议会与邻里委员会：**在城市或乡镇内部设立更小尺度的社区议会或邻里委员会，赋予其一定的决策权或咨询权，使其能够更直接地处理社区层面的具体事务，如社区规划、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活动组织等。
- **城市层面的公民大会或陪审团：**将协商民主的形式应用于城市层面，就城市规划、交通政策、环境保护等议题组织市民大会或市民陪审团进行审议，为市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 **地方层面的开放数据与电子治理：**许多城市积极推动地方政府数据的开放，开发移动应用和在线平台，方便市民获取信息、报告问题、与政府互动。
- **社区土地信托 (Community Land Trusts, CLT)：**

这是一种旨在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的创新模式。社区土地信托拥有土地，并将土地的使用权以长期租赁的方式提供给居民，居民只需购买或建造地上的房屋。这种模式将土地从市场投机中剥离，确保住房长期可负担，并由社区居民共同管理。它体现了一种基于社区合作和共同利益的民主治理理念。

地方民主的潜力与挑战：地方民主的复兴为重塑民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路径。它能够让民主变得更具体、更贴近、更有效。然而，地方民主也面临挑战：

- **资源限制：**地方政府的财政和人力资源通常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民主创新项目。
- **权力范围：**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受到国家法律 and 政策的限制，许多重大议题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国家层面。
- **地方精英俘获：**地方政治也可能被少数地方精英或利益集团所操控，导致决策不公正。
- **公民参与的持续性：**如何激发和维持公民对地方事务的持续参与热情，避免“一阵风”式的参与？
- **与国家层面的联动：**如何将地方层面的民主创新经验和成果，有效地传递和影响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政策？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地方民主的复兴仍然是 21 世纪民主创新中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域。它提醒我们，民主的根基深植于基层社会，从社区开始构建信任、赋能公民、解决实际问题，或许是应对国家层面民主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8.5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自我更新

协商民主、数字民主、地方民主的复兴……这些仅仅是 21 世纪民主创新图景中的几个突出面向。全球各地还有更多形式多样的探索，例如公民预算、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社会创新实验室、新的选举制度改革讨论等等。这些创新实践，无论规模大小、影响深远与否，都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的观点：**民主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拥有持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民主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终极状态，而是一个永无终点的过程。它不是一座可以供奉的神龛，而是一个需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具体国情不断维护、修缮、甚至进行结构性改造的“工具箱”。当旧的工具不再适用，当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时，我们就需要勇敢地发明和使用新的工具。

这些创新，并非要否定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价值，而是旨在对其进行补充、深化和完善。它们试图解决传统模式在透明度、参与度、回应性、审议质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使其更能适应一个更加复杂、多元、快速变化的社会。

然而，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一种民主创新形式，都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们在实践中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和风险，需要审慎的设计、严格的评估和持续的改进。数字民主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和监控风险，协商民主可能面临代表性和影响力不足的问题，地方民主可能受制于资源和权力限制。

8.5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自我更新 179

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创新必须与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公民社会的活力相结合。再精巧的制度设计，如果缺乏公民的积极参与、批判性思维和公共精神，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民主的韧性，最终源于每一个公民的觉醒、行动和坚守。

结论：民主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

掩卷沉思，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探索之旅，始于柏林墙轰然倒塌的漫天欢呼与“历史终结论”的乐观高歌，也目睹了三十余年后国会山陷落的惊心动魄与民主“光环”的黯然失色。这趟旅程，正如本书在引言中所承诺的，并非意在简单唱衰民主的“崩溃论”挽歌，亦非为其过往成就粉饰太平的辩护词，而是试图为您绘制一张尽可能清晰、客观、与时俱进的“新地图”，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纷繁复杂、充满变数的民主图景。

在旅程的起点，我们首先审视了那些曾经指引我们认知方向的“旧地图”及其局限性。在**第一章《什么是民主？（一个工具箱，而非神龛）**》中，我们努力破除了将民主简单等同于“一人一票”的迷思，也将其从高高在上的神龛请下，还原为其一个包含竞争性选举、公民自由、法治精神和权利保障在内的复合型“工具箱”。我们回顾了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重温了西班牙、韩国、东欧

等地激动人心的转型故事，试图理解上世纪末那股席卷全球的乐观情绪究竟从何而来。然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那些经典的民主化理论——无论是强调“富裕了就会民主”的现代化理论，还是聚焦于“精英谈判桌”的转型范式——在解释为何一些富裕国家并非民主（如海湾石油国），以及为何“精英主导的和平转型”模式在今天越来越难以复制时，都已显露出其解释力的不足。旧有的理论框架，如同磨损的地图，已难以精确导航我们在 21 世纪民主实践的新大陆上所遭遇的复杂地貌。

随后，本书的核心篇章引领我们深入探索了这片“新大陆”上民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构成了我们时代民主研究的前沿阵地。

在第二章《民主的“慢性病”：当民主不再是“猝死”，而是“缓慢退化”》中，我们聚焦了一种比传统军事政变更为隐蔽、也更具迷惑性的威胁——“民主倒退”或“民主侵蚀”。我们剖析了这种“慢性病”与民主“猝死”的本质不同，揭示了其操盘手——往往是民选上台的领导人——是如何打着“合法”的旗号，通过攻击“裁判员”（控制司法与选举机构）、压制“对手”（噤声媒体与反对派）、重划“游戏规则”（修改宪法与选举法）等一系列精心编排的“剧本”，一步步蛀空民主的制度根基。匈牙利的欧尔班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等案例，如同一面面镜子，清晰映照出这条通往“选举式威权主义”的隐秘路径，让我们警醒，民主的消亡，有时并非暴风骤雨，而是温水煮蛙。

紧接着，第三章《愤怒的政治：民粹主义为何席卷全球？》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喧嚣而复杂的场域。我们澄清了

8.5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自我更新 183

民粹主义并非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而更像是一种将社会简化为“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二元对立的政治动员“套路”。我们深入探究了滋生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被遗忘者）、文化根源（身份焦虑与价值观冲突）以及政治根源（传统政党失灵与精英信任危机）。从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到巴西的博索纳罗，从欧洲风起云涌的右翼民粹到拉丁美洲和亚洲形形色色的“人民代言人”，这些案例展现了民粹主义如何利用民众的愤怒和不满，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并对自由民主的规范（如少数权利、权力制衡、法治精神）构成侵蚀，加剧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

进入第四章《数字时代的双刃剑：从“解放的技术”到“监控的利器”》，我们审视了曾被寄予厚望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如何从“阿拉伯之春”时期的“民主助推器”，异化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算法推荐制造的“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加剧了政治极化，使得社会共识的达成愈发困难；“假新闻”和有组织的“认知作战”如病毒般侵蚀着舆论场的健康，毒化了公共讨论；更令人警惕的是，一些威权国家正娴熟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面部识别等新兴技术，构建起前所未有的“数字威权主义”监控体系，不仅用于巩固对内统治，甚至开始向外输出其技术与模式。这把剑，一面曾闪耀着赋权与解放的光芒，另一面则潜藏着隔绝、操纵乃至压迫的阴影。

而在第五章《威权的“反击战”：当独裁者们开始“学习”》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冷战后一度被认为不堪一击的威权政体。我们发现，它们非但没有如预期般消亡，反而展现出惊人的“威权主义学习”能力与“威权韧性”。它

们不再是过去那种僵化、脆弱的“纸老虎”，而是学会了如何更精巧、更隐蔽地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模仿民主形式、输出经济绩效、精细化社会控制、利用数字技术等）来维持稳定、巩固权力。我们特别剖析了“中国模式”的复杂性——其耀眼的经济成就与高度集权的政治控制并存，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何在，其内在的矛盾与不可持续性又是什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威权国家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它们共享镇压经验、监控技术和宣传策略，试图形成一个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和民主价值观的“威权国际”网络。

当这些新大陆的挑战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一种深切的忧虑甚至悲观的情绪，或许会油然而生。民主的“慢性病”难以察觉却持续恶化，民粹主义的怒火四处延烧，数字技术反噬其初衷，威权主义则在悄然进化并伺机反扑。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不禁要问：民主的未来，是否真的黯淡无光？我们手中的“旧地图”已然失效，那么，新的航线又在何方？

本书的第三部分，正是尝试在重重迷雾中，与读者一同**《寻找新的航线——民主的未来在何方？》**。我们相信，即便挑战严峻，民主制度本身及其所孕育的公民社会，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在第六章《民主的“免疫系统”：公民社会与制度的韧性》中，我们聚焦于全球各地那些为捍卫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看到了“黑暗中的光芒”。从白俄罗斯民众在冰封下不屈的呐喊，到波兰法官们为捍卫司法独立而进行的“法袍下的坚守”，再到台湾公民科技社群用代码构筑对抗虚假信息

8.5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自我更新 185

的“数字长城”，这些鲜活的案例展现了普通的公民、有组织的公民社会是如何在逆境中爆发出惊人的抵抗力、适应性和创造力，成为抵御民主侵蚀的第一道关键防线。同时，我们也审视了民主制度内部那些扮演着“刹车”和“安全气囊”角色的制度防线——如独立的司法系统如何成为法槌下的最后守护者，自由的媒体如何发挥“第四权力”的警觉目光，强大的地方政府如何在基层构筑民主的“毛细血管”与“防火墙”。这些分析指向一个核心观点：民主的真正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它能够容纳和回应批评与反抗的能力之中。批评是“体检报告”，反抗是“免疫应答”，而对多元声音的容纳，则是其力量的源泉。

随后，在**第七章《重塑我们的民主：21 世纪的制度创新》**中，我们进一步超越了对现有制度的修补，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可能帮助我们克服当前困境、重塑民主活力的制度创新理念和实践探索。我们意识到，仅仅依靠周期性的选举，已不足以应对 21 世纪的复杂挑战。因此，我们介绍了“协商民主”的理念与实践，例如爱尔兰通过“公民大会”这一创新机制，成功处理了堕胎等极具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展现了普通公民在理性审议和深度参与下达成共识的潜力。我们也探讨了“数字民主”的积极面向，思考如何利用技术来促进更广泛的公民参与、更透明的政策讨论、更便捷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任其加剧社会分裂和强化国家监控。此外，我们还关注到“地方民主的复兴”这一趋势，分析了为何将更多的权力、资源和决策空间下放到社区和城市，鼓励地方层面的治理创新和公民自治，可能是破解国家层面政治僵局、增强民主韧性的一条重要出路。这些前沿的探索，如同

在迷雾中闪烁的灯塔，为我们指明了民主未来演进的多种可能性。

现在，当这趟漫长的思想之旅即将抵达终点，当我们手中的“新地图”逐渐清晰，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回答最初提出的那个核心问题：我们真的应该对民主的未来感到绝望吗？

本书的答案是：不。但这种“不绝望”，并非源于盲目的乐观或对某种历史必然性的轻信，而是基于对民主本质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人类能动性的坚定信念。

民主，的确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旧的地图已经失效，新的挑战层出不穷。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民主天堂降临”的幻觉，早已在上世纪末的喧嚣中归于沉寂；而当前日益流行的“民主体制崩溃”的幻觉，也同样失之于简单化和宿命论。民主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和复杂的现实运作中，既非注定高歌猛进、一路坦途的神话，也非必然走向衰败、无可救药的悲剧。它更像我们反复强调的，是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多样，但需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具体国情不断维护、修缮、甚至进行结构性改造的“工具箱”。它的生命力，恰恰蕴藏在其内在的、永恒的紧张关系、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以及对外部挑战保持开放并作出回应的动态能力之中。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真实而严峻的：民主的“慢性病”正在侵蚀其肌体，民粹主义的“高烧”仍未退去，数字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而威权主义的“反击战”也变得更加精明和强韧。这些都使得民主的前路布满了荆棘与险滩。然而，也正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民主的韧性得以展现，其自我更新的潜力得以激发。

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在于我们需要将目光从对抽象制度的宏大叙事，回归到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个人身上。因为，民主的未来并非由某个遥不可及的历史规律或少数政治精英所单方面决定，而是由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公民的认知水平、价值选择与实际行动共同塑造。

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意味着“知情”的重要性。在这个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的时代，尤其是在虚假信息和认知作战日益猖獗的今天，保持清醒的头脑，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媒介素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需要学会辨别信息的来源，警惕算法的偏见，不轻易被情绪化的言论所裹挟，努力去理解复杂议题的不同侧面。只有拥有了相对真实和全面的认知，我们才能做出负责任的判断和选择，才能有效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中，而不是沦为被操纵的“沉默的大多数”或“愤怒的群氓”。

其次，它意味着“理性”的价值。民粹主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民众的负面情绪——恐惧、愤怒、怨恨。而民主的健康运作，则依赖于理性的对话、建设性的辩论和对不同意见的尊重。我们需要努力克服人性中固有的偏见和部落主义倾向，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即使那些声音令我们感到不适。我们需要在公共讨论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寻求共识，也尊重分歧。这并非易事，尤其是在一个日益极化的世界里，但这是维系民主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条件。

再次，它意味着“参与”的责任。民主不仅仅是每隔几年投一次票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实践过程，

需要公民的广泛而深入的参与。这种参与可以有多种形式：它可以是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区活动，加入公民团体，向民意代表表达诉求；它可以是支持独立的媒体，监督政府的行为，揭露不公和腐败；它也可以是参与到各种民主创新的实验中，如协商会议、参与式预算、数字议政平台等。每一个微小的行动，当汇聚起来时，就能形成改变的巨大力量。正是无数公民的积极参与，构成了民主“免疫系统”中最活跃的细胞，也是推动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进步的根本动力。

因此，当我们说民主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积极的、行动主义的民主观。我们必须放弃那种认为民主一旦建立便可“一劳永逸”、坐享其成的幻想。民主不是一座建好后便可高枕无忧的殿堂，而更像是一艘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航行的船，它需要每一代人持续地维护、校准方向，甚至在遭遇风浪时进行必要的修补和改造。

这场马拉松 没有终点线，因为人类对更美好、更公正、更自由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追求永无止境。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其独特的挑战，民主制度也必须随之不断演化和适应。我们或许无法预知这场马拉松下一程的具体赛道会是怎样，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放弃奔跑，就意味着放弃希望。

希望，恰恰在于过程本身。在于我们每一次为了捍卫一项权利而发出的声音，每一次为了促进一项改革而付出的努力，每一次为了弥合一道裂痕而进行的沟通，每一次为了守护一份真相而进行的求索。这些过程本身，就是民主价值的体现，就是民主生命力的彰显。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

8.5 核心观点：民主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自我更新 189

即使进步缓慢曲折，但只要我们坚持参与，坚持思考，坚持行动，民主的火种就不会熄灭。

在本书的开篇，我们提到了两种需要打破的幻觉：一是上世纪末“民主天堂降临”的过度乐观，二是当前“民主体制崩溃”的过度悲观。走过这趟思想的旅程，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摆脱这两种极端情绪的困扰，以一种更加成熟、更加审慎、也更加积极的心态来看待民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民主的确面临困境，但它远未“死亡”。它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考验和转型。挑战是真实的，但机遇也同样存在。威权主义或许在某些方面显得“高效”和“稳定”，但它以牺牲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为代价，其内在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终将暴露。而民主，尽管步履蹒跚，尽管充满缺陷，但它所蕴含的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多元化的包容、对权力滥用的警惕以及自我纠错和更新的潜力，依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具韧性和最符合人性的治理模式。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告别那些曾经或正在困扰我们的幻觉，拿起这张凝聚了当代比较政治学智慧的“新地图”，更清醒地审视和勘探民主脚下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更勇敢地面对前方那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十字路口。这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探索，更是一场关乎我们共同未来的思想之旅。

民主的未来，并非遥不可及的彼岸，它就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选择与行动之中。这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以智慧、以勇气、以韧性，继续跑下去。

附录 A 推荐阅读

以下书目和文章可以帮助您更深入地了解本书探讨的议题。我们选择的都是相对通俗易懂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希望能为您的探索之旅提供进一步的指引。

1.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本书是理解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普遍乐观情绪的经典之作，提出了自由民主可能构成“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论断。阅读本书有助于理解本书引言中所提及的“第一种幻觉”。

2. 塞缪尔·P·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 亨廷顿在这本著作中系统分析了 20 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转型，即“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它

是理解本书第一章所回顾的民主化历史背景的重要参考。

3. 史蒂文·列维茨基 (Steven Levitsky) 与丹尼尔·齐布拉特 (Daniel Ziblatt): 《民主是如何死的》(How Democracies Die)

- 这本书深刻剖析了当代民主国家是如何通过看似合法的手段被逐步侵蚀的, 与本书第二章讨论的“民主的慢性病”和“民主倒退”高度相关, 提供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案例。

4. 卡斯·穆德 (Cas Mudde) 与克里斯托瓦尔·罗维拉·卡尔特瓦塞尔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民粹主义: 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 本书的作者之一卡斯·穆德是研究民粹主义的权威学者。这本小册子清晰扼要地解释了什么是民粹主义, 它的核心特征、不同类型及其与民主的关系, 是理解本书第三章的绝佳入门读物。

5. 伊莱·帕里泽 (Eli Pariser): 《过滤气泡: 互联网正在隐藏什么》(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 本书揭示了互联网个性化算法如何将我们困在“过滤气泡”或“信息茧房”中, 加剧政治极化。它为理解本书第四章关于数字时代挑战的部分提供了生动的注解。

6. 谢尔盖·古里耶夫 (Sergey Guriev) 与丹尼尔·特雷斯曼 (Daniel Treisman): 《自旋独裁者: 21 世纪暴政的面貌变迁》 (Spin Dictators: The Changing Face of Tyranny in the 21st Century)

- 这本书探讨了现代威权领导人如何运用更精巧的手段 (如信息操纵和模仿民主形式) 来维持统治, 而不是仅仅依靠过去的暴力压制。这与本书第五章讨论的“威权主义学习”和“威权韧性”主题紧密相连。

7. 詹姆斯·S·费什金 (James S. Fishkin): 《当人民说话: 协商民主与公共咨询》 (When the People Spea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 本书是协商民主领域的经典著作, 介绍了通过高质量的公民审议来改善民主决策的理论与实践。它为理解本书第七章探讨的“协商民主”和“公民大会”等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附录 B 名词解释

按 照拼音首字母排序

参与式预算 (Cānyù shì Yùsuàn -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

一种地方民主创新形式，允许社区居民直接参与决定一部分公共预算资金如何使用。居民可以提交项目提案，并通过讨论和投票来做出决策。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Dì Sān Bō Mínhuà Làngcháo - Third Wave)

由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概念，指从 1974 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开始，席卷南欧、拉美、亚洲部分地区及东欧的全球性民主转型浪潮，大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法治 (Fǎzhì - Rule of Law) 指法律至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接受法律的约束。独立的司法系统是法治的关键保障，确保法律得到公正执行，防止权力滥用。

非自由民主 (Fēi Zìyóu Mínhǔ - Illiberal Democracy)

指一种政体，它可能保留了定期的选举等民主形式，但

在实践中却系统性地限制公民自由、削弱权力制衡、压制反对声音，其核心治理逻辑与自由民主的规范（如保护少数权利、尊重法治）相悖。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常被视为此类典型。

负责任的数字公民 (Fùzérèn de Shùzì Gōngmín - Responsible Digital Citizen)

指在数字时代，公民应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辨别信息真伪，负责任地参与网络互动，保护个人数据，并尊重他人权利的网络使用者。

公民社会 (Gōngmín Shèhuì - Civil Society)

指介于国家（政府）和市场（企业）之间的社会领域，由各种非政府组织、社群团体、独立媒体、学术机构以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个人所构成。它是民主制度中监督权力、表达诉求、促进公民参与的重要力量。

过滤气泡 (Guòlǜ Qìpào - Filter Bubble) / 信息茧房 (Xìnxī Jiǎnfáng)

指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由于个性化算法的推荐，用户往往只接触到符合其既有观点和偏好的信息，而不同意见隔绝，如同被包裹在无形的气泡或蚕茧中，容易导致视野狭隘和认知固化。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欧盟于 2018 年实施的一项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法规，旨在赋予个人对其数据更大的控制权，并对企业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施加严格义务。对全球数据保护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g0v 零时政府 (g0v Língshí Zhèngfǔ - g0v / gov-zero)

台湾的一个著名公民科技社群，致力于通过开放数据、开源代码等方式，开发数字工具，以提升政府透明度，促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对抗虚假信息。

竞争性选举 (Jìngzhēng xìng Xuǎnjǔ - Competitive Elections)

民主制度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指选举必须存在真实的政治选择（至少两个不同政党或候选人竞争），竞争过程相对公平，且选举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执政者有输掉选举的可能。

竞争性威权主义 (Jìngzhēng xìng Wēiquán Zhǔyì - Competitive

一种混合型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威权统治者会保留选举、议会、法院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并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竞争，但通过操纵规则、控制资源、压制对手等方式，确保自己始终掌握实质权力，使得民主程序很大程度上沦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

历史的终结 (Lìshǐ de Zhōngjié - End of History) 由弗

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著名论断，认为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已抵达终点，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它可能构成“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第四权力 (Dì Sì Quánlì - Fourth Estate) 指独立于行政、

立法、司法三权之外的新闻媒体。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媒体通过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揭露真相等功能，对公权力构成制约，保障公民知情权。

民主 (Mínzhǔ - Democracy) 本书将其理解为一个复合

型的“工具箱”，而不仅仅是“一人一票”。其核心要

素通常包括具有实质意义的竞争性选举、对公民自由（如言论、集会、新闻自由）的保障、法治精神的贯彻以及对个体和少数群体权利的有效维护。

民主倒退 (Mínzhǔ Dàotùi - Democratic Backsliding) / 民主侵蚀

指一个国家民主质量逐步下降、民主规范与制度被系统性削弱的过程。其特点是过程往往循序渐进，操盘手通常是民选上台的领导人，他们打着“合法”旗号，通过攻击司法独立、压制媒体与反对派、修改宪法与选举法等手段，逐步蛀空民主的制度根基。

民粹主义 (Míncuì Zhǔyì - Populism) 一种政治动员策

略和话语风格，其核心是将社会简化为“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这两个道德上尖锐对立的同质化阵营，并声称只有特定的领袖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意志”，挑战现有政治秩序。它本身意识形态色彩“稀薄”，可以与左翼或右翼等不同意识形态结合。

《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 (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

美国 1996 年《通信规范法》中的一条款，通常被解释为赋予互联网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用户发布的内容享有法律豁免权，即平台一般不对用户生成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这一条款对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内容审核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威权韧性 (Wēiquán Rèn xìng -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指威权政体在面对内外巨大压力（如经济危机、社会抗议、国际制裁等）时，能够有效调适自身策略、吸收冲击、化解危机，并最终维持其核心统治结构和权

力垄断的能力。这种韧性并非来自僵硬，而在于其动态的适应和策略调整能力。

威权主义学习 (Wēiquán Zhǔyì Xuéxí - Authoritarian Learning)

指威权政体有意识地通过观察、分析、模仿其他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其他威权国家）的治理手段、政策工具、法律框架、宣传技巧等，并结合自身国情进行选择性和创新的过程，以提升其治理能力和政权生存几率。

协商民主 (Xiéshāng Mínhǔ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一种旨在通过创造特定的公共审议空间和流程，让公民有机会在获取充分信息、听取不同视角的基础上，进行高质量的公共讨论，从而形成更具公共理性的判断和集体意志，以补充和深化传统代议制民主的民主形式。爱尔兰的“公民大会”是其著名实践。

现代化理论 (Xiàndàihuà Lílùn - Modernization Theory)

一种解释民主起源的经典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一个国家越是富裕，经济越是发展（通常伴随着教育普及、中产阶级壮大、公民社会发育等），就越有可能建立并维持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

虚假信息 (Xūjiǎ Xìnxī - Disinformation) / 认知作战 (Rènzhī Zuàn)

虚假信息 (Disinformation) 指故意制造和传播的、旨在欺骗或误导他人的不真实信息。**认知作战 (Cognitive Warfare)** 则指有组织、有策略地利用虚假信息、宣传、心理操纵等手段，影响目标群体或国家的

认知、态度和行为，以达到特定的政治、军事或战略目的。

选举式威权主义 (Xuǎnjǔ shì Wēiquán Zhǔyì -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见“竞争性威权主义”。

转型范式 (Zhuǎnxíng Fànshì - Transition Paradigm / Transitional Paradigm) 一种研究民主转型的理论视角，侧重于分析从威权统治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具体政治过程，特别是政治精英（包括威权统治集团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以及反对派精英）之间的互动、谈判、妥协和策略选择。

自由民主 (Zìyóu Mínhǔ - Liberal Democracy) 一种民主政体，它不仅强调通过竞争性选举实现多数统治，更重视通过宪法和法治来保障个体自由（如言论、信仰、集会自由）、保护少数群体权利、并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数字威权主义 (Shùzì Wēiquán Zhǔyì -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指威权国家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网络审查、社会信用体系等）来监控公民、审查信息、操纵舆论、压制反对派，从而维持和强化其统治的现象。